雲南地區青花瓷器的變遷—
兼談其與江西景德鎮和越南青花瓷的關連

施靜菲*

【摘要】本文旨在探討雲南地區青花瓷的變遷，並論及其與江西景德鎮和越南青花瓷的關連。筆者將以批判性的角度檢視目前已發表的考古調查資料，從雲南高溫瓷器的燒造—青瓷—的觀察開始探討。再結合到青花瓷的發展，經由與江西景德鎮青花瓷器風格演變的比對，以及景德鎮工匠於洪武年間(1368-1398)至雲南地區開窯之紀錄，修正過去將雲南青花瓷的出現視為元代的看法，並結合紀年資料以釐清雲南青花瓷的發展階段及演變軌跡，提出雲南青花瓷始燒於明初洪武時期，經歷三個階段延續至少到明晚期。

此外，本文也會在釐清雲南與越南青花瓷變遷的基礎上，討論雲南與越南兩地青花瓷在風格、裝燒工藝及原料使用上的共通性，並提示在江西景德鎮青花瓷生產的主流影響外，兩地窯址間可能也有一定的來往關係；雖然今日政治疆界的劃分將兩地截然分開，但在地理上它們十分相近，且雲南重要的青花瓷產地玉溪窯及建水窯，與越南主要青花窯址群同屬於紅河流域。希望藉由雲南青花與越南青花關係的探討，提供江西景德青花瓷主流影響外另一個面向的思考。

關鍵詞：雲南、越南、景德鎮、青花瓷

雲南位於現代中國疆域的西南邊境，與東南亞大陸部的越南、寮國、泰國、緬甸等國交界，境內山險水急，大小壩子相互隔絕，與外界的往來交通較為困難，對於中原地區來說，一向被視為邊陲地區。在文化上也是如此，雖與中原的主流文化時有接觸，但始自古滇文化、南詔大理國，此地區便自成一文化發展區域，到明代以後，漢人大量移入，雲南地區與內地關係才益形密切。然當地文化為地理阻隔而產生的邊陲性格卻沒有完全消失，相對於中國內地，仍顯示出其邊陲的獨立性。

在這樣一個「中心－邊陲」概念中的所謂邊陲地區，生產了被認為是「元代」的青花瓷，不免吸引研究者的目光。雲南青花瓷從1955年在雲南西部的火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助理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葬墓調查報告中首度被報導後，①經過雲南學者如葛季芳與馬文斗等人多年來發表的報告及論述；2007年11月在昆明舉行以雲南青花瓷主題的中國古陶瓷研討會，可說是五十年來考古發現及研究總結的呈現。②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大多數有關雲南青花瓷的研究仍然在強調景德鎮青花瓷的影響或是雲南陶瓷生產與消費的內向性。

如果僅以這樣的概念出發，雲南青花瓷不過是景德鎮主流青花瓷發展下的一個受影響的邊陲支流，這個支流的主體性被嚴重忽略。而強調其地方性的製作工藝、原料、風格，及本地內向性的消費脈絡，只是更突顯其特殊的邊陲性格。但事實上，有一些現象鼓勵我們似乎應當更客觀地重新評估雲南青花瓷的生產。

首先，從陸續發現的窯址出土情況看來，雲南青花瓷的出現是在稍早建立的青瓷產業下發展的：③其中固然有來自景德鎮的強烈影響，但卻是以已經建立的高溫施釉陶瓷（青瓷）生產機制來製作青花瓷，吸收景德鎮傳入的青花瓷紋飾、裝飾佈局及器形。在這樣的情況下，雲南地區青瓷生產之建立相當值得關注，因為它是雲南地區高溫施釉陶瓷生產系統的起源。再者，相對於籠統地歸納雲南青花受到景德鎮的影響，重新釐清雲南地區青花瓷與景德鎮間的具體關係、不同階段的變遷發展，在討論雲南青花的課題上，應該是當務之急。第二，雲南重要的青花瓷產地（尤其是玉溪窯及建水窯），與鄰近的越南北部所生產青花瓷之間，有許多令人訝異的共通點。除了過去大家看到外觀上器形紋

① 在鄧川地區發現一件青花玉壺春瓶，調查報告見孫太初，〈雲南西部的火葬墓〉，《考古通訊》1955年4期，頁30。不過當時由於僅出土一件，產地又不明，故並未引起注意。1960年代以後青花瓷及生產青花瓷的窯址陸續在雲南各地被發掘，始確認雲南生產青花瓷的事實。葛季芳，〈雲南玉溪發現古瓷窯址〉，《考古》1962年2期，頁85。

② 該研討會論文收集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③ 對雲南地區的陶瓷發展史來說，高溫的施釉瓷器在元代晚期開始創燒青瓷之後才展開，而就在雲南青瓷開始燒造不久後，隨即就燒造出青花瓷器。對過去幾乎沒有燒造高溫瓷器傳統的雲南瓷窯業而言可說是極大的躍進，因為生產青花瓷必需要具備釉下彩繪的技術及懂得使用鈷料，但是當時雲南地區瓷窯業才剛剛起步，就以青釉器加上當地的鈷料彩繪，生產了青花瓷，在技術上來說是很大的躍進。

臺灣公家學術期刊資料庫

飾風格的相近之外，作為窯業根本的裝燒工藝，也有許多巧合。更直接的是，最新的資料揭示了越南青花瓷在雲南地區的出土，以及雲南青花瓷在越南的發現，這些現象都顯示，如何看待雲南青花瓷的生產似乎還有值得進一步推敲的空間。因此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將在釐清雲南青花瓷發展脈絡的基礎上，透過風格、裝燒工藝及鈷料的使用等方面來探討雲南與越南兩地青花生產互動往來的具體關係。希望藉由雲南青花與越南青花關係的探討，提供景德鎮主流影響論述模式之外，另一個可能的思考方向－區域性陶瓷產業互動。

一、雲南青花瓷的窯址

至目前為止，雲南燒造青花瓷的窯址已發表的共有四處，即玉溪、建水、祿豐以及大理。④雲南青花窯址分布大致圍繞著兩個中心（圖1），一為洱海地區，大理州的鳳儀、祥雲、彌渡皆在洱海附近；一為滇池四周，祿豐、玉溪與建水都離滇池不遠。這二處自古就是雲南地區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而其中建水窯所處的位置較偏向滇南，建水除了是重要的青花窯址外，古稱步頭（步頭道即指南紹到安南的通道），所在區域為通往安南的水陸碼頭，交通要道的樞紐。⑤

雲南青花瓷窯之間共通性頗多，表現出同屬一發展區域的特色。產品除了褐釉、鐵繪及少見的藍釉作品外，主要燒造品種為青瓷及青花瓷。目前發掘的窯址遺存中，器形大多是碗、盤等小型生活器皿；瓶、罐等大型作品僅零星發現。青瓷釉色青中帶黃，胎色多呈灰白色，顯示當時窯爐的還原氣氛不易控制；釉料是由胎泥加石灰和草木灰配成的鈣質釉，與景德鎮青花瓷以硅鋁含量

④ 各地青花瓷窯發掘簡報及相關文章請見附表。據報導華寧窯為專燒釉陶的窯址，在華寧窯窯址下層只發現青瓷器的殘片堆積，尚未見到青花瓷的蹤跡，但由雲南其它地區的瓷窯窯址都是青瓷與青花兼燒的例子來推斷，華寧窯應該很有可能也燒造青花瓷，只是尚未被發掘。葛季芳，〈景德鎮瓷器在雲南及其影響〉，《景德鎮陶瓷》第59期（1992），頁39。至於永勝窯青花瓷，因年代較晚，且發展脈絡不同於這四處青花瓷窯，因此在本文中不納入討論。馬文斗，《玉溪窯》（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頁108-113。

⑤ 蔣高辰，《建水古城的歷史記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12-1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較高的釉果為釉料不同。⑥雲南青花瓷窯就地取材的傾向很強，各窯皆位於鄰近原料之處。根據調查，永勝、曲靖、建水、玉溪、玉門、華寧等地都蘊藏有適合燒瓷的瓷土與長石。⑦鈷礦分布也相當廣泛，主要分布於滇中、滇南、滇東地區。⑧玉溪、建水等窯址的青花鈷料經過化驗後得知，皆來自當地的土礦，含有較多的錳，氧化鐵也較高，故青花呈深藍顏色。⑨

雲南地區目前已發現的青花瓷窯爐結構皆為龍窯，在玉溪、建水、鳳儀及祿豐的窯址都發現了殘存的龍窯遺跡。這些龍窯都是利用自然地勢，依斜坡而建造，以木柴為燃料，與中國南方地區盛行的龍窯系統相同；然相較於鄰近屬於混合型區域的四川地區，有許多窯址吸收南北兩地的各式燒窯技術，⑩雲南地區瓷窯單純是屬於南方流行的龍窯系統之涵蓋範圍。雖然窯頂多遭受破壞，但從報告的描述可推斷此地的窯爐為一般的平焰式龍窯。以玉溪殘存的一號窯為例，殘長28.2公尺，窯寬1.6公尺，傾斜度為12度，窯牆用耐火泥和土坏砌成。⑪

雲南地區瓷窯的裝燒方式亦不成熟，碗盤類器物大多是在最下層的器底以墊圈支燒，然後往上堆疊，以支釘間隔重合疊燒（圖2），所以經常在碗盤內底心留下支釘的燒造痕跡（圖3）。而一些大型的器物也用支釘墊燒，如圖4，我

---

⑥ 陳堯成、郭演儀、趙光林，〈玉溪、建水窯青花瓷器研究〉，《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論文集 1》（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頁166-167。

⑦ 調查資料來自袁見齊，《雲南礦產志》和劉荊舟，《雲南地質與礦產》，轉引自葛季芳，〈雲南古代青花料和青花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頁18。

⑧ 有關雲南鈷料的分布詳況請參見馮先銘，〈青花磁器の起源に關する諸問題〉，《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東京：小學館，1981），頁268-269；葛季芳，〈雲南古代青花料和青花瓷器〉，頁18。

⑨ 陳堯成、郭演儀、趙光林，〈玉溪、建水窯青花瓷器研究〉，頁167。Chen Yaochen, Guo Yanyi and Chen Hong,"Sources of Cobalt Pigment Used on Yua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ares",*Oriental Art*, vol. XL no.1 (Spring 1994)化驗中也指出玉溪青花早期所用的色料與含鈷量甚低的鈷土礦原礦較接近，而晚期所用的色料與含鈷量較高的鈷土礦原礦或經揀煉的鈷土礦較接近，說明玉溪窯晚期的青花對鈷土礦曾進行過挑選或揀煉。

⑩ 參見熊海堂，《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12及圖3-9-1，中國窯爐系統分布圖。

⑪ 蘇伏濤，〈雲南玉溪元末明初龍窯的發掘〉，《考古》1987年8期，頁7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從黏結在器底的支釘，推測這類大型作品有可能是放在碗盤之類坏件上疊燒。另外據學者觀察指出，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雲南青花罐，在罐口口沿有六個支燒痕，故推測在罐口上疊燒有其它器物。⑫至於雲南地區瓷窯是否使用匣缽，及使用何種匣缽，先前由於資料不足，導致報告者說法不一。⑬玉溪窯後來的勘查報告發表有窯址採集的筒狀匣缽（圖5），或許可以提供我們參考，但同時也應意識到匣缽的使用並不普遍。⑭

雖然雲南地區所發現的窯爐及裝燒方式展現很多共通性，從目前所見到的資料來看，玉溪與建水窯的時代或許要早於祿豐與大理兩個地區的瓷窯，後者可能到明代中期以後才開始燒造青花瓷，這個問題未來值得特別注意。此外，建水和玉溪兩窯的作品，應該是目前雲南所見青花瓷中品質較高的，且有許多共通的器形及圖案，除了青瓷及青花外，還燒造褐釉器，兩窯在地理上也很接近，或許可視為同一窯系區域。兩窯僅在某些地方有些微之差別，例如從表面上看，玉溪窯的釉面都開裂，而建水窯則釉面開片不明顯。玉溪窯青花裝飾多以簡單率性的筆觸畫出，相當地流暢還帶有點粗獷之風，魚藻紋的畫法簡潔流利，最能代表玉溪窯的風格特色（圖6、7、8）；除了與玉溪窯類似的流暢風格作品外，⑮建水窯有些作品青花紋飾繪製稍為工整，佈局也較為繁複（圖2、3、9）。⑯大理鳳儀窯址燒製的作品，紋飾及用筆都較為粗獷肆意，相當具有當地特色（圖10）；祿豐地區燒造品種仍以青瓷及青花瓷為主，另外還燒造鐵繪，其中羅川窯也燒青花瓷（圖11），但青瓷器較多，白龍井窯則多青花器（圖12），兩窯所生產的作品，裝飾紋樣簡單，不見繁複的佈局和紋

---

⑫ 汪慶正編，《青花釉裏紅》（香港：上海博物館、兩木出版社，1987），圖41。

⑬ 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7），頁12-14。

⑭ 雲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紅塔區文物管理研究所，〈玉溪窯綜合勘查報告〉，《考古》2001年12期，頁60-70。不過馬文斗在其發表的《玉溪窯》專書中，認為這些筒形窯具是陶製缸形墊臺，馬文斗，《玉溪窯》。

⑮ 陳麗瓊、董小陳，〈建水瓷窯調查與探討〉，《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頁93-94。

⑯ 陳堯成、郭演儀、趙光林，〈玉溪、建水窯青花瓷器研究〉，頁162。另在此要特別感謝鴻禧美術館，慷慨出示所藏之玉溪窯及建水窯破片，讓筆者可以詳細比對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飾，有上化妝土為其特點。

雲南所產著名的「珠明料」（或稱「珠密料」），據文獻的記載，從明末清初開始為景德鎮地區青花瓷窯大量採用。⑰不過由目前雲南窯址及墓葬、遺址出土的青花瓷來看，實際上雲南地區鈷礦的開採及使用要比文獻的記載要早得多，出土物或許正好可以補充文獻之不足。而四川地區青花鈷料的最早來源，可能也是來自雲南，當地人稱這種雲南的青花鈷料為石墨。⑱

正德年間亦有經由雲南得到外國回青的記載，⑲明王世懋所著的《窺天外乘》，文中提到：「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璫鎮雲南，得之，以煉石為偽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用之果佳，嗣是闔鎮用之，內府亦有輸積，而青價稍稍賤矣」。雲南地區為中國之回回人第二大聚居地，回回人是否在元以前就進入雲南地區雖仍有爭論，但可確定的是，元代及明代初期回回人移入雲南，是今日回回人在雲南聚居的主要來源。在元朝統治雲南時，隨著統治力量的深入雲南，大量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移入，其中包括很多來自中亞的穆斯林。從憲宗之後經歷中統、至元，一直到延祐約七十年的時間中，大批的回回人陸續被派遣進入雲南，征伐、屯墾或從事軍器製造。⑳而對元初雲南地區的開發有重要貢獻的首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即為回回

---

⑰ 關於雲南珠明料、碗花礦的文獻記載不少，多為清代以後的記載，細節可參考葛季芳，〈雲南古代青花料和青花瓷器〉，頁17-18。

⑱ 唐昌朴，〈涼山州古陶瓷窯址考察記略〉，《四川古陶瓷研究》2（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頁198。在過去，四川地區燒造的青花瓷因為無確切紀年資料年代不清楚，但最近因為四川宋代華鎣安丙墓中幾件青花碗的發現，使得宋青花的問題重新開啟了未來討論的可能。感謝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謝明良提示此重要資料。詳細考古報告見於四川考古研究所、廣安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市文物管理所，《華鎣安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⑲ 原文出自王世懋，《窺天外乘》，收入明沈節甫輯，《紀錄彙編》（北京：中華全國圖書文獻微縮複製中心，1994）。本引文見頁2236 。此段記載或許可與明王宗沐的《江西省大志》陶書回青條中的說法相連結。「陶用回青本外國貢也，嘉靖中遇燒」（王宗沐著，陸萬垓增補，《江西省大志》，收在《中國地方志叢書》第779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頁832。

⑳ 楊樹鈞主編，《雲南回族史》（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9），頁15-16；姚繼德、李榮昆、張佐著，《雲南伊斯蘭教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頁62-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㉑依據史料及現今留存清真寺的創建時代進行考察，證明在昆明、大理和臨安（今建水）等地，從元代開始就確定有回回人聚集。㉒明代持續有穆斯林進入雲南地區，根據學者的調查，在明初時即有西域回回內附明政府並落籍雲南的記載，例如：「塔西沙，西域回回，洪武三年（1370）內附，授雲南左衛副千戶，遂占籍雲南，後以塔為姓」；「亦速，西域回回，洪武三年（1370）內附，授雲南左衛副千戶，遂家焉，世代為官，至今為回回望姓」。㉓又當時征伐雲南的大將沐英及藍玉等，都據傳信仰伊斯蘭教，在明初進入雲南時帶領了一批回回人進入雲南，㉔而洪武皇帝的故鄉安徽鳳陽及後來建為首都的南京，亦是江南回族的聚居地之一。

因此曾有學者想指涉元朝在對雲南統治時，隨著元朝軍政活動而來到雲南的回回人，有可能帶來了尋找鈷礦的技術。㉕另外也有學者提到，中國的掐絲琺瑯技術起源與伊斯蘭世界有關，而傳入的管道可能是經由雲南而傳入中國，並連繫到元代回回人的進入雲南。㉖由此讓我們也不禁聯想到，景德鎮元代青花瓷所使用的進口鈷料或開採鈷礦的技術，是否也是透過雲南地區的中亞回回人傳入。許多文獻提到元代雲南的穆斯林，經由西南絲綢之路前往天方參加的

㉑《元史》卷125，賽典赤傳：「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菴伯爾之裔」。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3063。

㉒ 回回人在元代因為軍事及政治的關係大量入滇的現象，由史料及昆明地區元代清真寺的留存等等線索來看，是無庸置疑的，而近來有學者對於元代以前的雲南回族問題也開始關心，文章參見馬興東，〈元代以前有關雲南回族族源問題的進一步探討〉，《雲南社會科學》1990年2期，頁6-53。

㉓ 此記載出於《雲南左衛選簿》，現存北京明清檔案館，轉引自楊樹鈞主編，《雲南回族史》，頁56。

㉔《雲南左衛選簿》，頁56；轉引自姚繼德等，《雲南伊斯蘭教史》，頁76-81。

㉕ 楊大申，〈關於祿豐縣元墓出土青花瓶的一點看法〉，《考古》1982年4期，頁416。

㉖ 相關的論述可參見翁宇雯，《明代官窯的伊斯蘭裝飾要素》，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22-27。Helmut Brinker and Albert Lutz, trans. from the German by Susanna Swoboda,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London: Asia Society Galleries; New York: In Association with Bamboo Publishing Ltd., 1989), pp.37-45; 楊伯達，〈論景泰藍的起源〉，《故宮博物院院刊》1974年4期，頁23；張臨生，〈我國明朝早期的掐絲琺瑯工藝〉，《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15（1986），頁278-281。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朝聖活動；㉗而元代航海家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天堂〉條中，也曾經記載雲南穆斯林前往麥加朝覲使用的路徑，㉘這些證據顯示當時存在有經由雲南通往伊斯蘭國家的管道。雲南與伊斯蘭世界的直接連絡，的確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但是前述這些有關工藝技術傳遞的大膽推測雖然有趣，也存在有可能性，具體的論證卻相當困難。伊斯蘭藝術中掐絲琺瑯其實不多見，中國掐絲琺瑯技術來源是否來自他處？又如何經由雲南傳入內地？因為雲南本地資料的匱乏，上述問題不得其解。又究竟回回人在元代及明初進入雲南與雲南青花瓷鈷料的使用，或是雲南青花的始燒與之是否有直接的相關？這些疑問都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資料才能進一步探索。

二、墓葬及生活遺址出土的青花瓷

除了窯址所發掘的青花瓷外，墓葬和其它遺址也出土不少的青花瓷，且多為完整之器，裝飾和造型都比窯址出土品來得豐富。因此在考察雲南地區青花瓷時，窯址以外的出土品亦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其中，雲南青花瓷往往整批出土於火葬墓群為其重要特徵，這在中國其它地區很少見。不過我們必須記得，若說窯址是反應整個生產狀況，那火葬墓則是雲南青花瓷的許多用途之一，且出土的作品應該被視為經過挑選的特定品類，例如數量很多的大罐及玉壺春瓶。

（一）火葬墓出土的青花瓷

1950年代之後火葬墓的發現報告陸續被報導，伴隨火葬墓出土了為數不少的火葬罐和陪葬品。而其中除了少數有正式的發掘報告之外，大多數都只是調查的簡報而已，所以對於掌握實際的出土情況，伴隨的出土物以及墓葬的年代判斷等等問題，在研究上造成不小的阻礙。

㉗ 姚繼德，〈雲南穆斯林朝覲小史〉，《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3期，頁64-69。
㉘（元）汪大淵，蘇繼廎校釋，《島夷誌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52-3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截至目前為止，根據已發表的報告及當地學者所做的調查得知，雲南火葬墓的範圍分布得相當廣泛，以昆明為中心，東到曲靖，西至楚雄、大理、保山、思茅、西雙版納，北抵麗江地州，南至建水、蒙自都發現有火葬墓。㉙而很多地區的火葬墓都伴隨出土青花瓷器，其中僅祿豐黑井公社石龍鎮後山的火葬墓群，就出土了約二百件的青花瓷器；㉚蒙自瓦渣地墓地、大理大豐樂墓地等火葬墓群也出土數量眾多的雲南青花、青釉及褐釉器；㉛若再加上許多出土地不明的市面流通作品，數量可謂驚人。

火葬墓所出土的青花瓷器，種類除了窯址常見的碗、盤外，還包括有大罐、玉壺春瓶、葫蘆瓶、觚形瓶，三耳小壺等等（圖13、14、15、16），不過還是以罐和玉壺春瓶為主。過去由於窯址發掘及報告未臻全面，對於墓葬出土作品的窯屬有許多爭議，將雲南地區瓷窯視為一整個瓷業區域或許是較務實的作法。㉜不過以目前已經發表的資料來看，或許我們已經可以掌握大多數出土品的窯屬，例如祿豐火葬墓出土的魚藻紋玉壺春瓶（圖14）為玉溪窯之作品應該沒有疑問。又以建水窯的燒造規模及條件來看，建水窯似乎是目前所發現的窯址中可能燒造祿豐火葬墓青花罐的窯址之一；同時我們也相信未來還會陸續發現燒造這些青花罐的其他窯址。㉝另外，大理大豐樂墓地與大理下關苗圃山

㉙ 葛季芳，〈雲南古代青花料和青花瓷器〉，頁19。另外四川會理地區也曾發現所謂“土青花”的陪葬品（黃承宗，〈西昌出土陶瓷及陶窯綜述〉，《四川古陶瓷研究》2（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頁200），筆者認為這些“土青花”中有一部分極可能是雲南生產的青花瓷碗，例如頁207圖五：1瓷碗底部圈足壁寬及挖足淺的特徵，很像是雲南青花瓷的做法，此地在元代時亦屬於雲南行省之管轄，距離昆明也不遠，如果說出現玉溪窯生產的青花瓷也不令人驚訝。參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頁18。

㉚ 葛季芳，〈祿豐火葬墓及其青花器〉，《文物》1984年8期，頁85-90。

㉛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館，《大理大豐樂》（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2）；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蒙自州文物管理所，〈蒙自瓦渣地墓地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6），頁235-268。

㉜ 有關祿豐火葬墓出土玉壺春瓶窯屬不同看法的爭論，請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頁21。

㉝ 經報導一件帶款的青花罐，「在籍XX（紋紉）人臨安衛孫千戶所江百戶軍丁衛夫家下」（朱雲生，〈雲南建水古窯產品的新發現〉，《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頁70，圖3-1）。從內容來判斷，應該是建水地區明代的作品，若此罐可證實為建水窯的作品，對於解決部分火葬墓青花罐的窯屬應有幫助。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墓地出土的多數青花罐（圖17、18、19），與大理鳳儀窯址出土的標本風格相似（圖10），應該是該窯所製作，㉞然其中少數作品，例如HZM26（發掘報告圖—三：1）出土的一件青花玉壺春瓶及HZM21（發掘報告圖—三：10）出土的青花碗則與玉溪、建水窯風格較相近，可能由這些地區輸入大理。

雲南地區出土的這些火葬墓相當有特色，大部分都具有共同的特徵。這類火葬墓大多沒有封土堆，有時伴出墓誌或墓幢，火葬方式是將遺體焚化後，在骨上貼金箔書咒於其上，或是以金粉或朱砂直接書寫經咒，然後放於陶瓷罐中安葬於地下。隨葬品不多，常見陶俑（有時直接貼塑在陶罐上）或銅俑、銅鏡、海貝等（圖20）。除了我們現在討論的青花火葬罐外，素燒陶罐、綠釉或黃釉陶罐及青瓷罐皆曾被用來作為火葬罐，不論是貼塑陶俑或蓮瓣裝飾，都表現出當地葬俗的特色（圖21）。正德《雲南志》卷五楚雄府風俗條：「鎮南州僰（白）人，……人死則置於中堂，請阿拶哩（吒力）僧誦咒之，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貼以金箔，書梵咒其上，以磁瓶盛而瘞之」，㉟志書中所描述的葬俗與上述火葬墓系統一致，這些採用同樣火葬習俗的當地民族（或民族們）顯然有著相同的宗教信仰。

從文獻上來看，在雲南地區火葬的習俗，從南詔時期當地的統治者烏蠻族便已盛行火葬。㊱大理國時期，原依漢法為墓的白族也盛行火葬，㊲例如大理喜州宏圭山所發現元亨十一年（1195）的趙女娘墓幢，以及楚雄出土仁壽四年

㉞ 段進明，〈鳳儀獅崗大理窯調查探勘報告〉，《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頁154。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大理市博物館，〈大理下關苗圃山墓地窯址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6），頁202-234。

㉟ 周景鳳，《正德雲南志》上冊，收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70卷（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251-252。

㊱ 樊綽的《蠻書》卷八風俗篇：「西爨及白蠻死後三日內埋殯，依漢法為墓，稍富室廣栽杉松。蒙舍及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其餘灰燼，掩以土壤，唯收兩耳。南詔家則儲以金瓶，又重以銀為函盛之，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其餘家或銅瓶、銀瓶，盛耳藏之也」。樊綽，《蠻書》，頁38，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9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124。

㊲ 據推測乃由於信奉佛教而改行火葬。請參見詹承緒、張旭，《白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頁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38）高生福墓志，都是白族火葬的證據。大理國時期的火葬墓未見正式的報告，有許多墓幢留存，㊳而屬同一系統的四川西南地區就出土有許多大理國時期的火葬墓，可得知在大理國時期，此地火葬盛行之情況。㊴

雲南地區有許多原住民族都是實行火葬，如雲南原住民族人數最多的彝族崇拜火，認為它們生為火族，死後應入火門，實行火葬，靈魂進火門才能找到祖宗；㊵而黔西北的古水西彝族也採用火葬，但是它們火化後灰燼不收，㊶與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阿吒力教火葬墓不同。以白族為主所信仰的阿吒力教，人死火化後要請阿吒力僧作法書咒，且所發現的火葬墓碑通常是一面書寫漢文，一面書寫梵文的陀羅尼神咒，可見以白族為主所信仰的阿吒力教，與雲南地區目前所發掘的火葬墓關係最密切。㊷

㊳ 大理喜州宏圭山發現元亨十一年（1195）的趙女娘墓幢，楚雄出土仁壽四年（1238）高生福墓誌，詳見李家瑞，〈滇西白族火葬墓概況〉，《文物》1960年6期，頁52，及汪寧生，《雲南考古》（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152-155。騰衝出土天開十七年（1221）的史梅風墓幢，詳見呂蘊琪，〈騰衝火葬墓及重要遺物〉，《雲南文物》23（1988），頁20。

㊴ 而且此一系統的火葬墓分佈區域還可以擴大到目前屬四川省境內的西南地區，這一整個大區域在葬俗上非常接近，所用的葬具也很類似，應該都是屬於同一系統；相對於雲南地區早期火葬墓資料的缺乏，西昌地區眾多的早期火葬墓可以作為考察早期火葬形式及葬具的重要資料。參見劉世旭，〈四川西昌市郊小山火葬墓群試掘記〉，《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頁47-52。黃承宗，〈四川西昌三坡火葬墓調查記〉，《考古》1983年3期，頁282-283。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西昌發現古代火葬墓〉，《考古》1984年9期，頁857-858。王從禮，〈四川西昌楊家山火葬墓群〉，《文物資料叢刊》10（1986），頁151-154。劉世旭，〈四川西昌楊家山火葬墓群〉，《文物資料叢刊》10（1987），頁2311-2314。

㊵ 普璋開，〈滇南彝族葬俗及其改革〉，《雲南社會科學》1990年3期，頁63-66。

㊶ 鐘德宏，〈黔西北古水西彝族的葬制—火葬〉，《貴州文史叢刊》1990年3期，頁131。

㊷ 學者在論及密教阿吒力時提到，白族曾居住過的區域都留下了密教阿吒力的遺跡。昆明滇池區域、玉溪、楚雄、保山、騰衝、麗江、四川的西昌地區、貴州的畢節地區等都發現白族的火葬墓群，而其顯著的標誌為梵文的經咒、經幢，火葬罐內的骨殖用梵文硃書經咒等。詳見張錫錄，〈古代大理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吒力〉，《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頁209。另外有學者認為滇中澄江小官庄火葬墓群雖然也呈現密教阿吒力系統，但其族屬為彝族，可能是羅伽部彝族部落受到密教阿吒力影響的結果。蘇佛濤，〈大理國羅伽部火葬墓陶瓷考〉，《中國古陶瓷研究》第8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73-80。

期刊資料庫

（二）土葬墓出土青花瓷

火葬墓外的一些土葬墓也發現青花瓷，其中許多都伴隨有墓誌或買地券出土，年代較為清楚。例如雲南大理蒼山玉局峰的一座明代石室墓，出土有一青花小碗及小瓷罐（圖22），青花小碗的內底心有支燒痕四個，為雲南地區青花瓷的燒造特徵，而兩件器物的風格也相當簡略，與玉溪、祿豐窯址所出之標本相合（圖8、12）。[43]此墓為夫妻合葬墓，根據墓中段竹垣妻李氏的墓誌有嘉靖十二年（1533）之紀年，顯示此墓所出土的器物大約為嘉靖年間所燒造。景洪曼閣渡口一號墓出土一件青花魚藻紋玉壺春瓶，應該為雲南地區窯址所燒造。[44]另外，歷經1995及1997年兩次發掘的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葬群（據推測可能為入滇漢族軍民的土葬墓），共清理墓葬56座，出土陪葬品中包括百餘件瓷器，其中除了雲南本地生產的青釉及青花瓷外，還有來自景德鎮及紅河下游現今越南地區生產的青花瓷器（圖23）（下面論及外來陶瓷時會有較詳細的介紹）；玉溪小矣資墓葬群（據推測可能亦為入滇漢族軍民的土葬墓），則共清理出墓葬40多座，出土青瓷、青花瓷及醬褐釉瓷約81件。[45]

（三）建水城北遺址出土的青花瓷

1989年建水城北的北正街改拓工地時，在下水道溝道中距地表50公分處，發現約40到50公分厚的含瓷片層，出土了眾多的瓷器破片，據調查報告指出，所採集的瓷片中有青釉和青花，器種包括了碗、盤、碟、杯、罐、盆、瓶、爐等，青釉有素面及印劃花；青花紋飾有蕉葉、菊花、魚紋、纏枝花卉及「元」

---

[43] 大理市博物館，〈雲南大理市蒼山玉局峰發現一座明代石室墓〉，《考古》1991年6期，頁528-532。

[44] 羅振廷，〈雲南景洪曼閣渡口古墓葬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92年1期，頁157-161。

[45]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箇舊市博物館，〈箇舊王林寨墓地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6），頁159-192；玉溪小矣資墓葬報告指出，還有來自景德鎮明晚期青花碗一件及龍泉窯系明代青瓷碗一件。陳泰敏、王國輝，〈玉溪小矣資墓葬出土民窯瓷器〉，《雲南文物》2002年2期，頁528-532。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字、「福」字等（圖24）。㊻其中大部份的碗、盤破片皆可在建水窯窯址找到類似的作品，例如（圖24-10）繪有樓閣雲氣的青花碗與建水窯址出土的青花碗（圖2）在器形及裝飾風格都極為相似。此遺址所出土的陶瓷在品種上（青釉、青花）或胎釉作風上皆相似於建水窯，因此可判斷大多是建水窯的作品，至於是否還參雜有其它地區的作品，有待進一步確認。含瓷片層中未見清楚的層位關係，所含的瓷片時代混雜，且沒有發現可判斷年代的確實依據，目前只知道其延續的時間很長，因為在含瓷片層中還雜有清代的瓷片及細陶煙斗。

（四）雲南元明時期出土的外來及外來風格陶瓷

在大理國時期，宋朝境內所產的白瓷、青白瓷就曾在雲南地區出現。㊼元代之時，當時南方流行的瓷器仍然可在雲南地區的考古發現中看到，例如雲南嵩明縣華家村木高墓（圖25）及劍川中科山都出土有龍泉窯青瓷罐。㊽目前已報導雲南省境內的出土資料中，雖還未見到景德鎮元代青花瓷，但從許多雲南青花瓷上看到景德鎮元青花的強烈影響來看，可推測景德鎮元青花無疑到過雲南地區。例如祿豐所出土的青花蓮池紋玉壺春瓶，與江西上饒市出土的景德鎮青花玉壺春瓶，不論在佈局或紋飾母題方面都十分接近，㊾國立臺灣大學藝術

㊻ 張建農，〈建水城北古瓷片及器物的情況調查〉，《雲南文物》25期（1989），頁14-18。

㊼ 在大理崇聖三塔的發掘中，在塔頂發現青白瓷塑作品三件，青白瓷獅器蓋一、灰白釉瓷盒一、瓜棱腹小口瓶一（報告未說明釉色，依照附圖判斷應為白瓷或青白瓷），出土情況及圖片請參見雲南考古工作隊，〈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與清理〉，《考古學報》1981年2期，頁253和258，圖版拾捌之6及圖八之1-2。另外在四川西昌地區發掘的南詔大理國遺址調查中，發現大批白瓷質的碗和盤殘件。未見有考古報告之發表，資料引自黃承宗，〈從文物考古材料看前蜀、後蜀與南詔、大理的經濟文化關係〉，《前後蜀的歷史與文化－前後蜀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21。

㊽ 劍川中科山出土龍泉窯青瓷資訊及圖片承蒙葛季芳提供，在此表示感謝，圖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圖53。劍川中科山出土的龍泉窯蓋罐也證實了龍泉窯確實曾經過雲南地區，器蓋的造型和器身上的牡丹花紋與日本勝連城出土的青瓷罐蓋破片相當接近，勝連城遺址的時代上限大約在十四世紀中葉。

㊾ 陳國順、謝昕，〈上饒市出土兩件元代青花玉壺春瓶〉，《江西文物》1990年2期，頁116-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研究所資料室也收藏有一件類似的雲南青花玉壺春瓶（圖26A、B）。明代時，南方瓷窯作品在雲南的出土更是屢見不鮮，不論是墓葬或是窖藏都可看見，且出土量很大，例如據報導騰衝縣窖藏在一缸內就裝有一百多件來自景德鎮的瓷器，包含青花瓷、白瓷等。[50]至於景洪曼閣渡口江岸地表所採集到的青花雲龍紋碗，報告者則據其胎釉特徵，推測為景德鎮十六世紀的的作品。[51]前述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葬群也出土景德鎮十五世紀後半的青花瓷，例圖23中圖版一一之2、8。可見景德鎮瓷器至遲在元代就曾到過雲南地區，而景德鎮瓷器在雲南地區的流通到了明代更加熱絡。

最近陸續發掘的考古遺址揭露了更多外來陶瓷的存在，然外來陶瓷運銷到雲南的相關問題尚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例如大理大豐樂墓地就出土有非常近似湖南衡山窯的彩繪陶瓶，[52]在深色素胎上用白泥塗繪花紋，此陶瓶的發現不但對我們了解雲南與其他地區的往來有所助益，更提醒我們應該注意，可能有更多鄰近地區生產的作品曾經傳入雲南，只是它們尚未被辨識出來。又如前述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土葬墓群，除了景德鎮青花瓷外（例如M6出土的纏枝花卉碗及麒麟紋盤，圖23右上角及右下角），[53]還發現了數件十五世紀後半的越南青花碗（圖27A）。其中還有一類內青花書福字、外刻劃格紋上褐釉的碗類（圖27B），在越南北部紅河流域Chu Dau窯址有發現（圖27C），[54]學者提到這種品類在越南以外地區很少出現。[55]

---

[50] 葛季芳，〈景德鎮瓷器在雲南及其影響〉，頁39。

[51] 羅振廷，〈雲南景洪曼閣渡口古墓葬清理簡報〉，頁157-161，圖三之3。

[52]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館，《大理大豐樂》，圖三六之3。

[53] 例如M6出土的白釉青花碗及青花盤，就明顯是景德鎮十五世紀晚期的作品。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箇舊市博物館，〈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6），圖三八、三七及六九。另越南青花瓷則見同報告圖三一、三二、三三、六七、六八。

[54] Nguyen Dinh Nha, *Chu Dau Ceramic of Vietnam* (Museum of H'ai Hung province, 1993), pl. A1. Bui Minh Tri and Kerry Nguyen-Long,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Hanoi: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p.209, pl.79.

[55] Allison I. Diem,"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in the Philippines: Late 14th -16th Centuries,"Larry Gotuaco, Rita C. Tan and Allison I. Diem eds.,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Bookmark, 1997), p.18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葛季芳提到雲南發現特殊的青瓷鳥形執壺（圖28A），[56]形式與泰國北部製作的同類壺接近（圖28B），因為雲南的瓷窯也有燒造青瓷的傳統，必須進一步檢視胎釉特徵才能確認此器之可能產地；祿豐碧城出土褐釉騎馬人物壺（圖29），和柬埔寨高棉陶瓷器形相近，[57]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雲南本地燒造的可能性，因為本地生產的褐釉器以及牽馬黑陶俑也曾出現在墓葬遺址中。[58]這些外來及外來風格陶瓷在雲南的出土，讓我們警覺到，雲南與其他地區的往來，除了內地之外，由於地處與東南亞大陸部交界區域，鄰近區域間頻繁的商貿及文化交流亦不能忽略。

三、雲南青花的出現與編年

對於雲南青花瓷出現的時點以及延續時代，目前學界仍未有共識。學者對雲南地區窯址生產青花器的時代看法不太一致，大多認為元代或明初即開始燒造，主要的定年依據多屬個人主觀對於風格的判斷，鮮少有具體的論證。[59]近來有學者試圖從墓葬形式、地層關係及器物形式組合變化，並結合共伴出土物品，提出較為客觀的斷代依據，認為雲南青花瓷的生產應該延續至明代晚期。

---

[56] 葛季芳，〈元代雲南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1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162-171。感謝謝明良教授教示此資料。

[57] 徐惠萍，〈祿豐碧城出土一批陶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頁127-132，圖5。比對町田市立博物館，《クメールの焼きもの》（町田市：町田市立博物館，1995），圖100。

[58] 牽馬陶俑見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大理市博物館，〈大理下關苗圃山墓地窯址發掘報告〉，頁220，圖一四一，7l；褐釉器之出土可見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蒙自州文物管理所，〈蒙自瓦渣地墓地發掘報告〉，圖版一四。另瀘西縣羊格黑明清哨所遺址發現許多褐釉器，附近並有主燒褐釉器的古窯址，詳見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瀘西縣文物管理所，〈瀘西縣羊格黑明清哨所遺址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6），頁269-276。

[59] 有關雲南青花瓷始燒時代之各種討論，詳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頁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⑹但對於整個雲南青花瓷的起始與延續時代、不同階段的發展仍然十分模糊，下面筆者將以風格發展的比對為基礎，配合可靠的紀年或可推測年代資料，來釐清雲南青花瓷的出現、演變及延續時代，作為下一階段深入研究的基礎。

窯址中並未發現可作為判斷年代的出土物，從玉溪窯和建水窯的地層疊壓關係，雖可得知青瓷早於青花器生產，但所能確定的也只是相對年代。雲南窯址出土的青花瓷何時開始生產？生產可持續到何時？而青花瓷風格又如何演變等問題，都很難從窯址報告中找到解答。

火葬墓出土青花瓷的時代判別，並不比窯址的定年容易。因為火葬墓通常是一整個墓群，疊壓關係複雜，延續時間又長，而且出土情況常是破壞嚴重。目前據報告指出，從同出的墓誌可推測時代的最早紀年物有兩組：兩件青釉印花盤，共伴出土墓誌的時代為至正二十六年（1366）；另一件為青花獅子滾繡球紋罐，共伴的墓誌紀年為北元宣光九年（1379）。⑹然此兩例祿豐火葬墓群中出土的作品，墓誌與出土物的伴出情形並未被詳細報導，是否能確認它們在未經擾亂的情況下共出亦不得而知。⑹

（一）雲南青瓷的燒造

青瓷是雲南燒造高溫瓷器的先聲，因此若欲探討雲南瓷業的發展，就必須從青瓷開始考察。從雲南青瓷的某些器形及裝飾手法初步來看，雲南地區的青瓷曾經學習龍泉窯的風格，前面也提及元代龍泉窯蓋罐在雲南的出土。玉溪窯出土青瓷印劃花紋碗的內壁劃有纏枝牡丹紋（圖30A），佈局及所刻畫的牡丹紋都接近於元末或明代的龍泉窯青瓷（圖30B）。⑹在器形方面，青瓷折沿印花

⑹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館，《大理大豐樂》；楊帆，〈雲南青花瓷器的創燒年代及相關問題〉，《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頁17-18。

⑹ 葛季芳、李永衡，〈雲南玉溪古窯遺址調查〉，頁286；葛季芳，〈祿豐火葬墓及其青花器〉，頁90。

⑹ 故在引用這兩組紀年作品時，我們必須宜採取保留的態度。且在出土報告當中，並未明白指出確實的紀年作品為圖版中的那兩件，甚或可能未刊出，令人無法得知這兩件紀年作品的風格。

⑹ John Ayers and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 I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pl.517; 朱伯謙主編，《龍泉窯青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圖2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盤（圖31），在龍泉窯的元末明初的作品也經常見到。⑭

雖然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看到雲南地區青瓷外在的風格來源受到龍泉窯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在裝燒方式和燒造技術方面，雲南與龍泉窯卻有所差別。龍泉窯宋元時期的窯爐為典型的平焰式龍窯，在窯的兩側設有窯門，窯牆以廢匣缽和耐火磚砌成；明時期的窯爐為分室龍窯，在龍窯中用牆將窯分成多室，使窯內的火焰由平焰變成倒焰式。⑮這與雲南地區的龍窯大不相同，雲南地區的龍窯窯牆是以土坏所築成，不像中國大部份地區常有利用廢匣缽和耐火磚來砌築窯牆的情形。雲南地區或許曾使用筒形匣缽，但並不普遍，器物以泥點支釘與墊圈墊燒疊燒；龍泉窯則是用其著名的M型匣缽裝燒，一匣一件或兩件，器物與匣缽、器物與器物間以墊餅或墊圈墊燒。⑯

依照筆者目前的調查發現，湖南與廣西地區宋元時期的青瓷窯在裝燒方式和燒造技術上，與雲南地區青瓷窯的關係最為密切。湖南汨羅、岳陽、衡山、長沙等地的宋元窯址，以生產印劃花青瓷及衡山窯類型的釉下粉彩為主，窯室為龍窯類型，流行以支釘疊燒，裝入筒形匣缽內，在碗盤底心留有支燒痕。岳陽鹿角窯的青瓷印花碗作品與雲南的青瓷常見的印花作品類似；而岳陽鹿角窯出土的青瓷罐與雲南窯址出土的少數罐類器形也很相似，⑰而這種器形在其它地區又不常見，可見兩者之間的關係非比尋常。廣西地區宋元時期的青瓷窯，亦是以龍窯燒造，支釘疊燒，在碗盤底心留有支燒痕，有的窯以直筒形匣缽裝燒，有的窯則不用匣缽；永福窯的報告者指出，「每件之間用四到五顆泥質支

---

⑭ John Ayers and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1, pl.417

⑮ 朱伯謙，〈龍泉大窯古瓷窯遺址發掘報告〉，《龍泉青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45-47。

⑯ 參見熊海堂，《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頁192-195，圖5-4 -17。

⑰ 周世榮、張中一、盛定國，〈湖南古窯址調查之一—青瓷〉，《考古》1984年10期，頁915-926。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黃綱正，〈長沙銅官窯頭沖宋代瓷窯調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246-250。湖南省博物館劉茂，〈湘江中下游地區三處古窯址調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251-265。參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圖17-11、2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釘間隔，最下一件，器底以用墊餅支托」。[68]

此外，湖南與廣西地區的元代瓷窯原本就存在有許多共同點，它們不僅地理位置相鄰，在當時的行政區分上也同屬於湖廣行省。廣西嚴關窯與永福窯和湖南湘江流域的一些青瓷窯在器形、印劃花紋和支釘泥點疊燒等方面皆極為類似，而它們所共有的特色與雲南地區的瓷窯幾乎相合。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曾經提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月，增兵鎮守金齒國。以其地民戶剛狠，舊嘗以漢軍、新附軍三千人戍守，今再調探馬赤、蒙古軍二千人，令藥喇海率赴之」，[69]又卷一百，兵志三，「梁千戶翼軍屯：世祖至元三十年，梁王遣使詣雲南行省言，以漢軍一千人置立屯田。三十一年（1294），發三百人備鎮夙巡邏，止存七百人，於烏蒙屯田，後遷於新興州（今玉溪），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雙。」，[70]由此看來，如果說隨著軍屯進入雲南的湖廣地區工匠在玉溪地區開窯，也不無可能。且在元代所開辟的新驛道中，以湖廣道（由中慶經普安到黃平道）最為重要，開通後，對雲南此後與內地往來起了很大的作用。[71]這些都讓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湖廣地區的燒瓷技術與雲南地區窯業交流的方便及可能性，我們前面也提過衡山窯類型的彩繪陶瓶在大理地區的發現，未來在雲南出土的陶瓷中，可能會有更多湖廣地區的陶瓷被辨識出來。由此，我們推測，雲南燒造青瓷的起源可能是由元代入雲南的湖廣人，帶來技術在此開窯燒造，建水的窯址中有一名曰湖廣窯的窯區，可能也就是由此而來。[72]在奠立燒造瓷器的基礎之後，雲南地區陶工可能基於市場的考慮，模仿了當時行銷各地的龍泉窯青瓷之造型及風格。

要處理青瓷的始燒時代及編年亦是個困難的問題，由窯址的堆積來看，位

---

[68]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永福窯田嶺宋代窯址發掘簡報〉，《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207。李鏵，〈廣西興安縣嚴關宋代窯址調查〉，《考古》1991年8期，頁764-766。

[69]（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2543。

[70]（明）宋濂等撰，《元史》，頁2577。

[71] 方鐵，〈元代雲南驛傳的特點及作用試探〉，《思想戰線》1988年1期，頁65。

[72] 從葛季芳到當地的調查也可輔證這樣的推測。葛氏對當地人的訪問指出，當地的群眾無不說是湖、廣人到此建窯燒造。參見同氏，〈景德鎮瓷器在雲南及其影響〉，頁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最下層的青瓷，僅為零星的小堆，推測其剛開始的生產規模也相當有限。前述祿豐火葬墓出土兩件青釉印花盤，據傳伴出有至正二十六年（1366）的墓誌，但共伴關係不明，無法作為可靠之紀年證據。然大理出土青瓷火葬罐（圖21B），以及大理出土多層塔形青瓷火葬罐，[73]由風格及相關的考古脈絡來看，或許可視為雲南早期青瓷的代表，年代不會晚於十四世紀晚期。昆明一處明代永樂年間的夫婦合葬墓出土兩件青瓷碗，雖然未見圖版，但據報告的描述，其中一件內底有印花及4個支釘痕，極可能是雲南當地所產，墓主潘得卒於永樂元年（1403），其妻傅氏卒於永樂八年（1410），可以將此青瓷碗視為1410年之前的產品；又如大理發現的一座明代正統十年（1445）紀年火葬墓，伴隨出土有一件青釉瓷罐及青瓷碗。[74]箇舊王林寨小滿坡M6花口青瓷盤與十五世紀後期的越南青花碗一同出土，推定生產時代也應相當。[75]我們目前只能大膽判斷雲南青瓷的燒造至遲在十四世紀晚期開始，而從晚期紀年或可推定紀年墓葬來推測，青瓷的生產至少可以延續到十五世紀晚期。有關雲南青瓷生產及時代的問題，有待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景德鎮陶工之移入

在雲南的青花瓷上，我們可輕易地看出來自景德鎮青花瓷的強烈影響，雲南火葬墓中經常出土的青花瓷廣口罐與玉壺春瓶，也是景德鎮元青花瓷常見的器種。紋飾方面例如前面提到的玉壺春瓶上所繪的蓮池紋飾及佈局非常接近景德鎮青花瓷（圖26）；又如獅子滾繡球、飛鳳紋、魚藻紋，或其它一般常見裝飾在器腹的纏枝花紋，以及經常作為邊飾的蕉葉紋、回紋（圖13－17）等。而雲南青花大罐及玉壺春瓶多層佈局的裝飾概念，也極可能與景德鎮青花瓷有關。

---

[73] 此青瓷火葬罐之圖片為葛季芳女士提供，請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頁35，圖77。省文物工作隊，〈昆明陰山明墓發掘報告〉，《雲南文物》11期（1982.6），頁31-33。

[74] 段綏，〈大理發現一座明代火葬墓〉，《雲南文物》34期（1992.12），頁9-11、25。

[75]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箇舊市博物館，〈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圖四三。越南青花碗編年參考西村昌也、西野範子，〈ヴェトナム施釉陶器の技術・形態的視点からの分類と編年－10世紀から20世紀の碗皿を中心に〉，《上智アジア學》第23號（2005），頁80-121。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是模仿後再轉化的有趣表現，例如青花花卉人物罐器肩上、作為開光地紋的菱格形紋（圖32、33A），與景德鎮青花瓷同類紋飾應該有所連繫，例如與景德鎮十五世紀青花大罐錦地開光紋飾相對照（圖34）。只是在雲南青花中，這些紋飾的形式不但產生變化，且被彈性的運用在不同的裝飾部位上。

雖說作品的流通可能是景德鎮影響雲南青花的途徑，然而在所有可能的管道中，不可否認地，工匠的移動是最為直接的方式。在葛季芳尋訪雲南地區窯址作調查時，於玉溪東南面七十公里的華寧窯址附近發現《重建慈雲寺功德碑》，[76]對此問題提供了關鍵性的證據。碑上記載：「大明洪武年間，有車姓者由江西錦（景）德鎮來滇，辦陶廠于此為生活之計，繼則汪氏、張氏、彭氏、高氏，以及范、劉、柯、楊諸姓，因親及親，因友及友，接踵而至……」。另外，在葛氏的調查中還提到，建水窯群中洪家窯的後人談其家史時，說到其祖籍江西，祖先因隨軍來到建水碗窯鄉務農兼燒窯的歷史。[77]這種可證明陶工移動的文獻史料相當難得，可為陶瓷產業技術及風格傳遞作強而有力的背書，上述的珍貴資料證實了景德鎮人曾經到雲南地區燒造瓷器，而且在此地落戶並傳承燒瓷的技術。我們因此可以在這個基礎之上，依據對景德鎮及雲南青花器形及風格的具體觀察，來看雲南青花瓷的發展序列，再藉由陸續出現的紀年或可推定年代資料，為雲南青花瓷編年與分期。不過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雲南青花瓷窯是在先前的青瓷窯基礎上發展，除了外觀的器形及裝飾外，在基本的窯爐建造及裝燒方式上則是延續先前建立的青瓷窯傳統，目前未見有景德鎮燒瓷窯爐及裝燒方式之影響。

（三）雲南青花瓷發展的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明早期（洪武到宣德：約1380到1440）

在這個基礎之上，依據對器形及風格的具體觀察，我們可以找出在器形及

[76] 葛季芳，〈景德鎮瓷器在雲南及其影響〉，頁39。
[77] 葛季芳，〈景德鎮瓷器在雲南及其影響〉，頁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個裝飾圖案、佈局，還保留了最接近景德鎮元代『至正型』青花的幾件作品。祿豐石龍黑井火葬墓出土的兩件青花人物花卉紋蓋罐（圖32、 33A）可視為一組仿自景德鎮「祖型」的「原型」作品，⑱因其器形、裝飾圖案及分層佈局，都還保留了相當清楚來自景德鎮青花瓷的型式，而這些仿自景德鎮的最早型式作品，在之後還可看到持續的發展。這兩件作品的器形比例與景德鎮『至正型』元青花罐極為類似（圖35），短頸、廣口、溜肩及鼓腹，腹部最大徑要大於器身的高度，下底部收縮，至足跟稍稍向外撇，給觀者一種穩重的感覺，而像這樣的荷葉瓜蒂紐蓋罐在雲南地區也常見。在裝飾方面，乍看之下與器形給我們的印象相同，都是模仿自景德鎮『至正型』樣式，不論是纏枝牡丹、蕃蓮、雲肩、蕉葉紋、回紋、變形蓮瓣紋等等，都讓人有非常熟悉的感覺。但是仔細一看，卻更接近於所謂『洪武樣式』。⑲例如這兩件雲南青花作品肩上

⑱「祖型」及「原型」來自日本學界研究工藝史時所使用的概念，「祖型」通常指的是被模仿的對象，而「原型」則是指模仿的最早形式，亦即最接近「祖型」的形式（相對於其後之連續發展而言），類似的作法經常被日本學者使用在處理日本陶瓷對中國輸往日本貿易瓷的模仿上。在處理雲南青花瓷時我們也可借用這種「祖型」及「原型」的概念，在雲南青花瓷對景德鎮的模仿中，所模仿的景德鎮青花瓷可稱為「祖型」，以器形及紋飾作為判別的標準，找出雲南青花瓷模仿景德鎮的最早型式，則可稱為「原型」。然而「祖型」與「原型」的概念運用在雲南青花瓷對景德鎮的模仿上並不像日本學者在討論貿易瓷一樣可找出一特定型式的作品，因為雲南青花瓷所學習的對象在器形及紋飾上都有時代混雜的情形，這樣的特殊情況在本文中將會討論。

⑲ J. A. Pope在所謂的『至正型』風格的一群十四世紀作品和十五世紀初年以宣德（1425－1435）帶款器為依據的一群永樂宣德時期的十五世紀初年作品，兩群作品之間，提出介於中間風格的『洪武樣式』，即一批同時具有兩者特徵的過渡時期作品，來填補元末明初的空白。而近年來由於考古資料的日益增多，引起一些研究者更進一步來探討洪武時期的樣式（有關洪武樣式研究的討論，詳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頁42，註35）。簡單來說，所謂『洪武樣式』的特徵，其實就是指與『至正型』相比較之下的一些變化，例如青料的顏色較淡，且往往無法表現出漸層的效果，以致於圖樣較為平面；器底經常燒出火石紅痕跡。紋飾方面比較明顯的是，變形蓮瓣紋互相借用邊界，不像『至正型』的變形蓮瓣紋一個個各自獨立；回紋一正一反為一單位，而『至正型』的回紋則一個個分開，單獨成為一個單位等等特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蕉葉紋，[80]以粗的線條仔細地描畫出蕉葉的輪廓，很類似景德鎮『至正型』元青花蕉葉紋，但元青花蕉葉紋之中莖填色，雲南青花蕉葉紋卻在中心空出葉莖，整個表現則更接近於『洪武樣式』的蕉葉紋（景德鎮蕉葉紋演變請參見圖36）。[81]兩罐在器腹部分皆飾有人物垂釣圖，與最近公佈的一件青花碗內裝飾一致，它們或許與景德鎮十五世紀民窯流行的人物圖裝飾有關，罐肩上經常是有錦地開光的佈局也近似（圖34）。在最近有關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紋的研究中指出，這樣的人物垂釣圖應該是描繪東漢嚴（子陵）垂釣的故事，版畫及明初的剔紅漆器也有類似圖樣。[82]

常飾於雲南青花罐下底部、或玉壺春瓶頸腹之間和下底部的變形蓮瓣也是判斷製作時代的一個要素，我們可在『至正型』元青花找到類似的表現，但是兩瓣之間輪廓線相連、互相借用邊線的形態僅見於『洪武樣式』，為『至正型』所不見（圖37）。而變形蓮瓣內的圖案也從原來景德鎮的如意雲紋，變化成多個連續的漩渦紋。雲南這兩件作品器肩上開光輪廓的畫法則與『至正型』相同，在兩條細線當中夾有粗線共三條線，典型『洪武樣式』的雲肩輪廓通常只有兩條，即外邊的細線與內邊的粗線或是皆為細線（圖37）。[83]

既然這兩件最接近景德鎮『至正型』的雲南青花作品上，已經出現洪武時期的裝飾因子，雲南青花瓷開始燒造的時間上限必定要在洪武之後，而不可能早於洪武，這一點也與前述景德鎮人在洪武年間到華寧地區開辦陶廠的記載可互相印證。過去的學者僅看到『至正型』的影響而沒發現或忽略『洪武樣式』，就逕自將其定為元代晚期之看法，應該予以修正；另外雖然有一些圖錄將雲南

---

[80] 雲南青花瓷尤其是火葬罐在已發表的圖版中大部份都有加蓋，但有些蓋上之裝飾與器身整體不符，考慮火葬墓的出土破壞嚴重，又筆者懷疑有些罐蓋被當地報告者重複使用。所以筆者在運用這些材料時會特別注意，罐蓋可用來當作整體情況之呈現，而無法對判斷年代作依據。

[81] 雖然在元青花中也有蕉葉中莖空白的例子，但極為少數，幾乎都是中莖填色。實例可見出光美術館，《中國陶磁》（東京：出光美術館，1987），圖139。

[82] 謝玉珍，〈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紋的意涵〉，《故宮學術季刊》25卷1期（2007），頁104-105。

[83] 在少數洪武樣式的作品上，我們也看到有開光是在兩條細線當中夾有粗線的做法，可能為洪武早期的過渡型作品。圖版可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75，圖5-2。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青花瓷作品視為洪武時期或明早期，但很少述明原由，[84]亦未顯示雲南青花瓷本身存在的風格演變問題。

依據裝飾風格及器形的排比，與前述兩件作品共同可視為第一期的作品（圖13、38－41），[85]除了可以看到從「原型」兩件作品的密切關係外，彼此之間的表現也相當有一致性，例如纏枝牡丹的畫法雖然較「原型」稍有簡化，但是花朵本身仍然有層次變化，花瓣還是可見有層層相疊的表現。

雲南青花瓷此時期最明顯的特徵，是變形蓮瓣紋內容的變化。常見的變形蓮瓣形式有三種：內置漩渦紋（圖32、33）、以藍地白形式描繪如意雲紋（圖38）以及另一種較少見的單朵花瓣紋（圖39）。前面二種變形蓮瓣形式的各自演變相當具有時代特色，在後來可清楚見到畫法的演變。雲南青花罐頸上所飾的波浪紋也很有意思（圖13、38），在景德鎮『至正型』元青花的大罐頸上也常飾有此類的波浪紋（圖42），但是兩者的表現有所差異。雲南地區的波浪紋簡化許多，雖仍保有波浪的曲線動態，但由於簡化及重複地整齊排列，若不問其來源，乍看之下很難立即看出其來源可能與景德鎮青花瓷的波浪紋有關。

從雲南青花瓷的第一期作品來看，不論是器形、裝飾母題或構圖，在模仿景德鎮時，都有時代混雜、交錯的現象。主要的器形及紋飾母題紋飾多仿自『至正型』，而副紋飾多與『洪武樣式』有密切連繫，甚至參雜有永宣時期的紋飾。這種混雜的現象是雲南地區青花瓷學習模仿的一個特點，故而在判斷時代時，必須小心進行風格的比對。在雲南地區青花瓷的「原型」上我們不僅看到『至正型』的影響，還清楚看到『洪武樣式』的出現，故其時代必不能早於洪武時期。另外建水碗窯村出土破片（圖41），可見到邊飾回紋的連續表現，當在景德鎮永樂、宣德時期以後出現（圖36）。[86]又在祿豐出土青花罐

[84] 例如周麗麗在《青花釉裏紅》一書中對圖41雲南青花罐所撰述的說明（參見汪慶正編，《青花釉裏紅》，頁237）。中澤富士雄則舉最常被論及的玉溪窯青花玉壺春瓶為例，認為其蓮瓣紋樣具有明代特徵，因此認為應該是明代所生產。中澤富士雄、長谷川祥子編著，《元明の青花》（東京：平凡社，1995），頁137。

[85] 圖版請見長谷部樂爾、藤岡了一編，《世界陶磁全集》14．明代篇（東京：小學館，1976），圖154。

[86] 我們前面提過景德鎮『至正型』的回紋是一個個分開的，前一階段的青花人物花卉紋罐也是如此，而『洪武樣式』多是一正一反的形式，到了十五世紀以後才見有連續不斷的回紋。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的器肩上部，飾有一種小變形蓮瓣，蓮瓣內藍色底上留有白色的空白或花樣（圖38）。這樣的小變形蓮瓣，於永樂、宣德青花瓷上的裝飾母題中可以找到類似的例子，[87]因此筆者推測，此類青花器的年代上限應在洪武晚期，而整個第一階段可延續發展到十五世紀前期。

（2）第二階段：明中期（正統到正德：約1440到1500）

第二階段（圖14－16、44－49)是由第一階段演變而來，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雲南青花瓷自身的風格變化，例如變形蓮瓣內的裝飾延續前一階段的幾種形式變化而來，除形式較為簡略外並無新的發展（圖43）；例如圖44、45、46等大罐作品的變形蓮瓣紋，也可與第一期的作品相連接。而前述青花觚形瓶頸部的小型變形蓮瓣則較第一期變得肥厚，在蓮瓣外緣加了好幾層輪廓線（圖16）。

獅子滾繡球的描繪較為抽象，繡球也更加簡化（圖44）；類似的獅子滾繡球紋飾在前述提到的王林寨小滿坡土葬墓中也有出現（M30），並且伴出屬於十五世紀後半的越南青花瓷。蒙自瓦渣地墓地出土青花觚形瓶器腹上的飛鳳紋大致上以沒骨的方式畫出（圖16），比起景德鎮元青花細細勾勒出的飛鳳紋有所差別，不過在羽翼接近身體的部分，仍看到以勾勒方式畫出相連結的圈圈來表現翅膀的肌理。更晚期的飛鳳紋就已經看不到這樣的情形了，而是以沒骨的線條來描繪出整個造型（圖16、46、49），這樣的形式較接近十五世紀後期的景德鎮民窯作品（圖50）。在青花罐的器肩上也經常可見魚藻紋的裝飾（圖45），魚藻紋在雲南地區非常地流行，可說是雲南青花瓷的重要特徵，火葬墓出土的玉壺春瓶腹部及大罐的肩部，都經常飾有魚藻紋，而飾有魚藻紋的碗盤破片更是佔窯址的大部分。數量眾多的魚藻紋玉壺春瓶在火葬墓及土葬墓群中經常出現，在箇舊王林寨小滿波墓地中，魚藻紋玉壺春瓶（M25）伴出十五世紀後半的越南青花瓷碗；[88]蒙自瓦渣地墓地出土多件魚藻紋盤（圖

[87] 圖版可參見長谷部樂爾、藤岡了一編，《世界陶磁全集》14．明代，圖26。

[88]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箇舊市博物館，〈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圖一九及六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1），其中M24的魚藻紋盤亦與屬於本期風格的青花大罐一同出土，[89]使我們可以更肯定它們的編年。而這幾件魚紋盤上的蕉葉紋，也讓我們看到時代風格的演變：從較早仔細描繪輪廓，以曲線來表現（圖32、33），到簡化的直線或弧線（圖51），整個蕉葉輪廓各邊的比例相當一等腰三角形。

祿豐出土的青花飛鳳牡丹紋罐，肩上的牡丹花花瓣之展開與前一階段幾乎一樣（圖46），但層次變少，像是展開的五瓣或四瓣花。前述大理發現的正統十年（1445）紀年火葬墓，伴隨出土的青瓷罐與八塔台墓地C278出土的青瓷罐相類，因此C278同出的青花盤應當也屬於此時期。[90]其他同屬於此時期的紋飾風格，還可見玉溪窯址出土的青花盤（圖7、8）。圖7－2左下盤心飾有佛杵紋飾，與景泰四年墓（1453）出土的景德鎮青花盤盤心的同類紋飾較接近（圖52）；而雲南青花花卉紋碗，底心飾月華紋，旁有四樹石花草叢圍繞（圖53A），也與十五世紀中期的景德鎮民窯風格相近（圖53B）。窯址及墓葬所出的一些青花碗殘片上裝飾有樓閣雲氣圖案（圖8），[91]即日本學者所謂的雲堂手，它們與景德鎮明代中期民窯青花碗圖案相當類似。[92]因此此一階段大約從1430年代延續到1500年左右，除了自身風格的演變之外，仍然不時有來自景德鎮的影響。

（3）第三階段：明晚期（嘉靖到萬曆：約1500到1600）

此一階段的風格基本上是第二階段的簡化，變形蓮瓣由前一期變化而來，例如（圖54）青花罐器下部的變形蓮瓣就可連接第二期青花小罐上的同類紋飾；而圖55青花罐器下部的變形蓮瓣則是由第二期的同類紋飾變化而來（圖43）。此

[89]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蒙自州文物管理所，〈蒙自瓦渣地墓地發掘報告〉，圖二二之IAa罐。

[90]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與橫大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圖一一四。

[91] 箇舊王林寨小滿坡M18出土有同類飾有雲氣紋碗，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箇舊市博物館，〈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圖四三。

[92] John Ayers and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vol.1, pl.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第三期的青花罐有拉高的趨勢，器形普遍變得瘦長，與第二期可互相連接。

在這些屬第三期的青花瓷上（圖54－57），我們看到更加簡化的牡丹纏枝花紋、獅子滾繡球，及變形蓮瓣之抽象變形，這些都可看出是由前一期風格演變而來的。牡丹纏枝花紋的愈加簡化，以圓圈圈的形式來表現，若不知其演變過程，就完全看不出是牡丹花了，而像是隨意畫出的小花。獅子滾繡球紋飾也是相同的情形，相當接近抽象的意味，若不比對前一階段的形式，很難認出是簡化後的獅子滾繡球紋。

大理大豐樂出土一件青花罐（該件青花罐無附圖，報告者指稱與圖二—3同為Bb型罐，參見圖17）伴隨有弘治通寶銅錢，顯示這類青花罐的製作時代不會早於弘治年間（1488－1505）。[93]這類作品從風格及器型來判斷，應該是大理地區窯址的產品，富有當地的特色，其器腹花卉紋平面化的展開形式，與此期的作品風格相符，年代應該也相當。另外瀘西和尚塔火葬墓群中一件青花罐，也伴出有弘治通寶銅錢（圖57A），器肩簡化的獅子滾繡球紋及器身下半部的變形蓮瓣，亦與前述之此期風格相呼應。

騰衝出土的花卉紋碗（圖58）的碗心裝飾亦延續第二期的發展而來（圖53），類似的碗形可見大理蒼山嘉靖時期墓出土的青花碗（圖21），且兩件作品器外壁的裝飾也很接近。[94]而同墓所出的青花小罐（圖22），器形小且僅用非常簡化的圈圈來裝飾，又如一件有類似裝飾的高罐作品（圖59）。王林寨小滿坡M54及M42出土的玉壺春瓶也裝飾抽象的幾何圖案（圖60）；在這些作品上，有趨向追求幾何圖形的趣味，形成雲南地區青花瓷有別於其它地區的特色。雲南青花的典型寬圈足在這些作品上都很明顯，而且高領小罐也成為此時期流行的器形，同屬於此時期的鐵繪或青釉作品也常常可以見到同樣的器形。

---

[93]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大理市博物館，《大理大豐樂》，頁39，Bb型瓷罐。另同類外壁圖案的青花碗在玉溪窯窯址（圖8A右上）及瀘西和尚塔火葬墓都有出土。參見楊帆等，〈雲南瀘西縣和尚塔火葬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12期，頁69，圖一七之4。

[94] 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M52也出土類似的青花碗，碗外壁的裝飾也十分相近，見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箇舊市博物館，〈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頁176，圖四四；同樣的碗可見雲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紅塔區文物管理研究所，〈玉溪窯綜合勘查報告〉，圖2-4。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95]此一階段屬於大理地區的玉壺春瓶器形厚重（圖61），裝飾也比前一階段簡略，有時更是用簡單且隨意的幾筆所畫成。由上面幾件作品中可看出，製作的粗糙不僅表現在紋飾的解體與簡化，上釉也經常不及底。我們由以上的討論可推測，此階段的延續時代從弘治時期一直到明代後期，尤其是幾何風格強的作品，或許均已在嘉靖時代以後了。

前面的編年及分期，大多依賴墓葬出土的青花火葬罐及玉壺春瓶，因為器形及紋飾演變較容易區分。窯址出土的大量青花碗、盤類等生活用品，則因為可判別資訊不足或有偏頗而較少論及。又目前的分期純粹就風格演變來分析，尚未考慮到其歷史背景及文化脈絡的細緻變化，這些是未來需要再努力的地方。

經過上面的風格比對，筆者將目前被認為生產於元代的雲南青花瓷重新給予定位。雖然仍不排除雲南地區以後可能會出現有早於元代的作品，但經由這一群已出土青花瓷年代的確認，讓我們至少瞭解，雲南青花瓷的開始大量生產及受到景德鎮深刻影響的時代不可能早於洪武時期；亦即目前已發表的雲南青花瓷中未有可早至元代的作品，而其興盛時期可從明代早期一直延續到明代晚期。在第一期我們看到最明顯來自景德鎮的影響，之後雖然不時也有來自明代景德鎮各時期的影響，但是有其地區自身風格發展的演變，同時也表現出當地的特色。例如早期釉陶罐貼塑人物紋在青花瓷罐上的延續，除了常見的纏枝花卉紋外，魚藻紋、獅子滾繡球、飛鳳紋特別流行，到第三期後半幾乎成為抽象幾何圖形的變化，以及高領小罐及魚耳罐等這種其它地區較少見的器形，似乎更能表現雲南青花瓷的特色。

而雲南的青花瓷生產一直延續到明代中後期，不僅自前述對雲南青花瓷編年中可證實，從文獻的資料也可推知。明萬歷年間所修的《雲南志》「賦稅」中有課窯一條，說明當時的瓷窯還不在少數，才會被課以賦稅；劉文徵的《滇志》（天啟年間）卷之三地理志，臨安府（今建水為其府治所在）「物貨」條提到瓦器（文後附註萬歷《志》卷二《物產》作「瓷器」），[96]而建水窯的主要產品就是青花瓷。這些資料都可作為雲南地區至少到明代萬曆年間，都還生

[95]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大理市博物館，《大理大豐樂》，HZM222也出土有類似的青釉高領小罐（圖162、圖163、圖164）。

[96]（明）劉文徵著，古永繼點校本，《滇志》（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頁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產青花瓷的輔證。在建水窯所在地附近發現一康熙四十一年（1702）所建的碑記『奉本府清軍府明文碑』，碑文載：「……查得碗窯鄉名雖一窯，內分上下燒造器皿，兩不相同。上窯燒造者，缸盆瓶瓮，下窯燒造者，碗碟鐘盤，各燒各物，各□各□，閏銀二兩一錢四分伍厘起解。布政司庫上下各半，歷來舊例，原無紊亂，除額納國稅外，別無科收。只有上司過往取用什物，著上窯燒造者，上窯照辦；著下窯燒造者，下窯照辦，取物應物理之當然……」。[97]此碑文除了述明建水窯內不同窯口有所分工外，還顯示至少到清代早期，瓷窯仍有運作，但此時燒製作品之樣貌則不得而知。

四、雲南青花瓷的區域特色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掌握了雲南地區青花瓷的發展狀況，以及在裝飾風格及器形上與景德鎮青花瓷的密切關係；此外，我們也從工匠的移動以及商品的流通，看到景德鎮與雲南青花瓷的連繫。然而，雖然雲南青花瓷受到景德鎮強烈的影響，但卻也因為其本地的材料及製作方式，以及陶工在模仿裝飾和器形上的選擇和融通變化，表現出雲南青花瓷特殊的區域特色。

雲南地區高溫施釉瓷器的始燒時代遠遲於中國內地，明代初年在青瓷的基礎上燒造青花瓷，當時的窯業還處於初生階段。其燒造青花瓷的窯爐不同於景德鎮的倒焰式圓窯，仍沿用其先前燒造青瓷時所用的龍窯，且並不是像福建地區先進的分室龍窯，而是連窯門都還未出現的原始龍窯。由於胎土及釉料各方面的條件都不良，胎土雜質多，常夾有砂粒，釉層很薄，非常容易脫釉；瓶罐等器拉坏痕跡清楚可見；以支釘疊燒在內底心留下難看的支燒痕；[98]修足時圓心常捉不準以致寬窄不一等等（圖7B）。當時的雲南地區，除了擁有鈷礦的資源此一優勢條件外，其它的燒瓷條件都未臻成熟，但它似乎很快接受燒造青花瓷的技術並且大量生產。而相對的，在其它燒瓷條件更佳的地區，卻沒有在明代早期就生產青花瓷。例如江西樂平和吉州地區、以及華南沿海地區的青花瓷

[97] 碑記轉引自葛季芳，〈雲南建水窯的調查與分析〉，《考古》1987年1期，頁69。

[98] 雖然其他地區也有澀圈疊燒而在內底心留下澀圈或製作粗率的情形，但其燒造粗略的原因有時候並非技術上達不到，而是為求量產而重量不重質的結果。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窯，都是在十六世紀受到市場擴張的刺激，才開始燒造青花瓷。[99]這樣的情形實在無法僅以雲南地區擁有豐富的鈷礦資源來解釋，相對的，當地消費者對青花瓷的特殊喜好可能是更關鍵的原因。雲南青花瓷內向性的市場取向以當地的消費為主，我們可以想見生產者所考慮的，是符合當地人的需求及喜好。

在分析過雲南青花瓷的風格變遷之後，我們看到雖然來自景德鎮的強烈影響，但不同時期的景德鎮青花瓷風格特徵出現在同一件器物上，以及將移植自景德鎮的母題加以重組、結構關係的解體和紋飾變形等現象，反而可說是雲南青花最突出的特色。例如『至正型』與『洪武樣式』、甚至永宣時期的作風相互混雜，模仿景德鎮裝飾分層的佈局，而又加以變化，常常將景德鎮器腹裝飾主紋飾之處分隔成兩部分，佈局更加繁複肩（圖32、33A）。

又飛鳳紋及獅子滾繡球紋經常出現在大罐的肩部，相對於景德鎮青花，這兩類紋飾在雲南青花上的使用相當突出。此外雲南青花瓷中魚藻紋很多，除了一件青花魚藻紋罐的佈局與景德鎮極相近外，其餘都表現出雲南特有的裝飾特色：不僅魚紋的細節與景德鎮大不同，魚藻紋大量出現在盤心、玉壺春瓶腹部以及大罐的肩部，這些佈局方式都是景德鎮青花瓷看不到的。而且火葬墓中發現的特殊魚耳罐及魚形水滴也未見於其它地區，[100]魚紋這個母題在雲南似乎有特殊的地位，這樣的選擇可能與洱海民族的魚崇拜有關。在《南詔中興二年圖卷》與張勝溫的《大理國梵像卷》都可見到洱海圖中置有魚與海螺，從圖上之題記可得知，魚與海螺是洱海的海神；據考證成書可能在元代的白文史籍《白古通記》提到：「點蒼山腳插入洱河，其最深長者，惟城東一支與喜州一支。南支之神，其形金魚戴金線；北支之神，其形玉螺。二物見則為祥」。[101]可

---

[99] 這些青花瓷窯的創燒可視為景德鎮青花窯系生產擴張之連鎖效應，詳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頁63-71。而樂平地區早在開始燒造青花瓷前，就曾在宣德時期提供鈷料給景德鎮使用，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宣德地層中發現一個白瓷盤，有釉下鈷藍書寫「樂一號」及「樂三號」字樣，認為是當時用作試燒青花色調的。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6），頁57。感謝謝明良教授教示此資料。

[100]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雲南陶瓷》圖72及圖79；葛季芳，〈祿豐火葬墓及其青花瓷器〉，頁88，圖一二。

[101] 張錫祿，〈白族對於魚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雲南社會科學》1982年6期，頁79-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見這種對魚的崇拜仍然遺存，且被視為一種吉祥物。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對魚的仰賴可想是很深的。而且在洱海周圍許多村莊的白族婦女一直到文革以前都盛行以「魚尾帽」為頭飾，[102]魚為民間造型藝術的主題之一，魚耳環、魚形的銀飾品等都是當地常見的。[103]另外，根據學者調查，喜洲地區白族火葬習俗，習慣在葬坑內埋一風水罐，內放幾條小活魚或銀製小魚，罐頂蓋紅布再纏上五色線。[104]可見當地的原住民族在接受外來物質文化時，傳統的社會文化仍扮有積極的角色。

在一些作品上，飾有類似光芒狀的紋飾，像圖32的罐蓋、窯址或火葬墓出土的蕉葉紋盤（圖8A-9、8B-6)，都是以圓心為中心向外發散呈光芒狀，許多火葬墓上的墓碑或墓幢也可見，[105]甚至在西昌地區火葬墓中陪葬的陶碗上也見有此種紋飾的彩繪。[106]它們與銅鼓鼓面上光芒狀圖案在構圖上很類似，而且都位於顯眼而重要的（高高在上）部位。許多學者都認為銅鼓的象徵圖案，有層次依序地代表著宇宙的系統，[107]最上面代表超自然與宇宙權力，而往下才是人間的活動。另外有學者提到，彝族傳統文化普遍採用類似的光芒紋飾（被稱為八角形紋），在各種器物上都常見，例如銀器上或火葬罐內的八角形紋金屬片等。這種圖案的意義不明，但可能是一種神秘的象徵圖案。[108]在雲南青花瓷上，我們又看到類似的光芒形式出現在器蓋或盤心，或許可視為新興材質及裝飾技法與此地存在已久的裝飾母題之結合。與本地原有裝飾母題結合最明顯的

---

[102] 張錫祿，〈白族對於魚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頁81。

[103] 任兆磊，〈從造型藝術看大理地區佛教信仰的特點〉，《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頁426。

[104] 參見詹承緒、張旭，《白族》，頁103。

[105] 光芒狀的紋飾常常被認為與太陽崇拜有關，而出現在火葬墓幢的被認為是密教曼荼羅，最近甚至有人將此類紋飾與古代的織機連上關係，請參見王梓，〈八角星紋與史前織機〉，《中國文化》2（1990），頁84-94。不過筆者認為它還是與某種信仰有關，而且其與王氏所舉出的大部份八角星紋的形式不同。

[106] 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圖171。

[107] 卡爾．L．赫特勒，〈滇文化、銅鼓在東南亞島嶼及其在東南亞史前史中的意義〉，《南方民族考古》第2輯（1989），頁33-40。

[108] 陳久金、盧央、劉堯漢，《彝族天文學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312-3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例子，非貼塑人物青花罐不可。在論述本地火葬習俗時便曾提到，青花出現前的火葬罐多用貼塑裝飾，有一類貼塑人物或十二生肖動物的作品，在青花出現後，將原有的貼塑裝飾與新出現的青花裝飾結合，形成雲南青花中極富當地特色的貼塑人物青花罐（圖4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雲南省本身及前面提到四川省的會理縣（元明時期屬雲南行省）之外，到目前為止雲南青花瓷在中國其它省分並未發現，可見其銷售的範圍以雲南地區本身為主。從消費的觀點來考察，明初雲南青花瓷器在雲南的生產，與明代初年進入雲南地區的大批內地移民應當也有密切的關係。[109]在建水城址北邊發現大量的青瓷及青花瓷器或許就是很好的例子，建水是滇南的重鎮，也是明代屯軍的重要據點，在此駐紮屯田的軍士及軍眷當不在少數。依據學者的統計，洪武十五年置於臨安府治（建水）東的臨安衛屯軍、舍丁及軍餘的人數共為23,333人。[110]雍正時期的《臨安府志》卷七也提到：「臨安，元以前皆夷類也，自明以衛軍實其地，衣冠文物、風俗大類中州」，[111]可見有為數不少的內地人移民至此，故這裡所生產及生活遺址所出土的青花瓷器，很可能有一大部分是為因應這些新移民之日常生活用器需求。

由此可推知，明初之時大量漢人的進入對雲南窯業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研究中曾提到過，雲南青花瓷的學者大多過份強調雲南生產的瓷器與火葬墓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以致於忽略漢人在當時大量進入雲南地區，與當地瓷器生產之間的可能連繫。當時大量進入雲南的漢人已經成為雲南多民族文化的一員，他們移入雲南的時間與雲南青花瓷出現的時間相當，而在技術及風格的傳遞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兩者之間的相應關係不應被忽視。

---

[109] 雲南地區為眾多民族所組成，生活器具可能因民族、因地區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是總括說來，竹木器是當地原住民族原來主要的生活器具，金銀器則為上層階級及富人所使用。參見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頁82-83。相較於其鄰近的四川省在宋代時出土數量龐大且品質高之內地青白瓷及青瓷，雲南地區同時期出土的內地陶瓷真是微不足道，雖說大理國此時期在政治上處於獨立狀況，但其與宋朝的貿易往來仍十分密切，若欲購內地生產之瓷器應非難事，因此在當時瓷器並未被當地人視為一般生活用具的一個重要選擇。

[110] 羅運治，〈明代沐氏經略雲南〉，《淡江學報》20期（1989），頁120。

[111] 轉引自秦樹才，〈明代軍屯與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昆明師專學報：哲社版》，引自《複印報刊資料》明清史，1990年1期，頁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明初之時，大量的移民入滇，主要是戍軍與屯田民，與明太祖的政策有關。「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後，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閭右之民以居之，復有宦遊商賈入籍，大多南人較多，故俗亦類江南」，⑫也由此時開始，漢族人口逐漸佔居多數，從而成為雲南地區的重要民族。

元代蒙古人征服雲南後，初進行軍事管制，後來將雲南納入中央的統治，設立行中書省，為總制地方的政治機構，其意義與漢之邊郡、唐之邊州不同。但由於雲南各地發展不均，雖設立路、府、州、縣，而政權的實質並不相同。除少數地區設派有流官外，例中慶路，其它地區仍設土官，且所設之軍民屯多簽發為當地的爨僰人。《元史》兵志屯田條論及中慶路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置立中慶民屯，于所屬州縣內拘刷漏籍人戶，得四千一百九十七戶，官給田一萬七千二十二雙，自備己業田二千六百二雙。二十七年，始立軍屯，用爨僰軍七百有九戶，官給田二百三十四雙，自備己業田二千六百一雙」。⑬據記載，從至元二十一年到至大四年的27年當中，蒙元王朝增調到雲南的到鎮戍軍隊，大概只有八千人。⑭

而明代在雲南的軍屯除了軍士外，還包括軍士的家眷，即所謂的軍余，舍丁等。⑮《明史》中的〈兵志〉「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其軍皆世籍」。根據方國瑜的統計，明代先後在雲南設立二十衛、三御十八所，計一百三十三個千所，總計外來軍人共約十四萬八千多人，⑯再加上家眷（以一戶四口計），就有六十三萬多人，他們大多數後來定居雲南。⑰另外，有學者以一戶三人計算，即四十八萬多人。不過一般說來一戶三人的計算方式似乎太少，以一戶四口為基準較為合理，故當時就軍屯人口來說就已有六十三萬多人。

---

⑫《光緒楚雄縣志》轉引自牛鴻賓，〈明代雲南經濟發展研究述評〉，《雲南社會科學》1991年1期，頁90-94、28。

⑬（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0，頁2576。

⑭馬曜主編，《雲南簡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129。

⑮秦樹才，〈明代軍屯與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頁28。

⑯方國瑜主編，《雲南地方史講義》下冊（雲南廣播電視大學出版，內部刊物），頁40-41。

⑰方國瑜主編，《雲南地方史講義》下冊，頁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加上軍屯以外的實邊等政策和人口的自然流動，漢人進入雲南的數量更加地驚人。例如洪武十七年（1384），「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⑱洪武二十年（1387）又規定湖廣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雲南」等動作。又學者對明代人口移動的統計研究指出，整個明代人口移動的藍圖中，雲貴地區在有明一代戶口的激增是很驚人的。

而關於雲南的人口總數，《正德雲南志》記載當時口數為一百四十一萬九十四人。⑲方國瑜根據民戶、軍戶再加上舍丁、軍餘、貼戶的數字來估算，在晚明時期大約兩百多萬人；⑳李中清是從西南人口增加的大趨勢來看，認為若按比例增加人口數字，雲南十六世紀初期的人口可能超過兩百萬，㉑兩者所估計的數字差不多。從比例上來說，明代入滇的漢人總數，可能要超過原本居住當地的任何一個原住民族了。今日的雲南，總人口3,692,587人，其中漢人就佔了三分之二強（24,614,533人）。㉒

如此大量的漢人進入雲南地區，其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所需要的飲食用具應亦屬驚人，在當時一般的內地人民所習用的飲食器具，自然是普遍又實用的瓷器。從雲南地區明代出土的陶瓷來看，本地生產的陶瓷是要遠多於外來陶瓷。雲南雖然也出土有不少明代景德鎮的青花瓷器，但考慮瓷器由產地轉運至此邊陲地區所附加的成本，除了少數統治階級與富人能消費得起外，一般的人民—如隨軍而至此地屯田的士兵及其家眷—應該無法負擔。反之，在擁有製瓷原料的當地起窯燒造，似乎是較為理想的方法。而此點在我們前面提到華寧及建水窯址時，一些有關窯址開窯的碑刻或傳說也可看出，景德鎮人到雲南，為生計而在當地開窯燒造瓷器。而同是青花窯址的祿豐、玉溪，也是明代雲南屯田的所在地，㉓故若說雲南瓷器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供應移入當地的漢人所燒造，應該是不難想像的，前文中提到的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及玉溪小矣資漢人土葬墓

⑱（明）諸葛元聲，《滇史》卷10，引自馬曜主編，《雲南簡史》，頁183。

⑲周景鳳，《正德雲南志》上冊，頁51。

⑳方國瑜主編，《雲南地方史講義》下冊，頁132。

㉑李中清，《清史論叢》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59。

㉒此數據為中國大陸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參見雲南省人口普查辦公室編，《雲南省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昆明：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頁474。

㉓周景鳳，《正德雲南志》上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卷70，頁126、2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群，就是最好的實例。而前述景德鎮人於洪武年間在雲南地區開窯，極可能就是為因應此時的大量需求而開窯燒造瓷器。

五、越南青花瓷生產

過去學者在討論雲南青花瓷的對外互動時，只注意到景德鎮對雲南青花瓷的影響，卻對雲南青花瓷與其它鄰近地區瓷窯的交流關係很少提及。早期有些學者曾經推測過雲南青花瓷與越南青花瓷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124]由於雲南與越南在地理上很接近，會產生這樣的聯想並不足為奇，但是當時學者們的許多論點，推測的成分要大於具體的連結。後來此議題的研究，逐漸加入許多風格及歷史背景的聯繫。例如中澤富士雄提到雲南青花瓷在胎土粗、色灰及紋樣的描寫上，與越南青花瓷有相近之處；[125]筆者於1997年完成的雲南青花碩士論文中有一章節，專門討論兩地青花瓷生產的關係及兩地歷史上之交通往來；[126]Regina Krahl在1999年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舉辦的研討會中，提到越南與雲南青花瓷窯可能存在的關係。[127]而前述以雲南青花瓷為主題的中國古陶瓷研討會中，也有三篇論文提及雲南與越南青花瓷之間的關係，然其觀點大多以中國陶

---

[124] Roxanna Brown在其東南亞陶瓷通論書中就曾提到越南使用的鈷料或許來自雲南的鈷礦，Roxanna Brown, *The Ceramics of Southeast Asia: Their Dating and Identification* (Kuala Lumpur, 1977; rev. e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謝明良曾在翻譯馮先銘，〈關於青花瓷器起源的幾個問題〉一文的譯序中推測雲南與越南青花瓷可能有關。馮先銘著，謝明良譯，〈關於青花瓷器起源的幾個問題〉，《雄獅美術》148期（1984），頁117。劉良佑在論述雲南青花瓷時也曾經提到雲南青花瓷的製瓷技術向東南經紅河河谷傳入越南北部，不過作者對此推論並未有具體說明。請參見劉良佑，〈元末明初的雲南青花瓷〉，《典藏藝術》14期（1993），頁168。另外張浦生曾經提及雲南青花瓷在洪武時期受到來自景德鎮技術的影響，有很大的發展，並對鄰近越南燒製青花瓷產生推進的作用。但是張氏並未針對此觀點作任何的論證和說明。張浦生，《青花瓷器鑒定》（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頁157。

[125] 中澤富士雄、長谷川祥子，《元明の青花》，頁137。

[126] 施靜菲，《雲南青花瓷研究》，頁56-62。

[127] Regina Krahl, presented in the Study Day of *Prestigious Pots: Yuan Porcelain,* b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June 22, 1999.另一位英國收藏家也曾發表相關的介紹性文章, Cytil Beecher,"Yunnan Underglaze Blue Ceramics,"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63(1998-1999), pp.121-127.

臺灣古籍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瓷為中心出發，認為雲南青花對越南產生過影響，但對於兩地青花瓷互動的方式及時點並未有具體的論證。[128]

現在由於兩地考古資料的陸續發表，尤其是雲南火葬墓中發現有越南輸入的青花瓷（圖23-1），而越南昇龍城（Thanh Long citadel）遺址中發現雲南建水窯青花碗破片（圖62），[129]以及越南陶瓷研究近年來的長足進展與窯址資料的公佈，使得這個議題有了進一步論述的空間。[130]本文想從區域性陶瓷產業發展的觀點切入，先分別簡介兩地青花瓷的生產背景及使用脈絡，再分析彼此的共通特點，最後探討兩地之間往來的交通及歷史，來釐清自外於景德鎮主流影響的區域性陶瓷產業交流的問題。

（一）越南青花瓷十四到十六世紀的發展

（1）第一期：1370－1430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越南青花瓷的生產至遲在十四世紀晚期開始，[131]早期的風格亦受到景德鎮青花瓷的強烈影響，大致可分為兩類：簡單型及繁複型。簡單型指繪有簡略菊花紋、卷草紋的碗、盤等器（圖63）；繁複型則指接近景德鎮元青花『至正型』的作品（圖64），包括大罐、玉壺春瓶、大盤、大碗

---

[128] 見該專輯（《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中：陸明華，〈雲南青花瓷燒造問題初探〉，頁34-38；張東，〈對雲南早期青花和建水窯相關問題〉，頁78-79；陸鵬亮，〈兩“南”之器，他山之石，14、15世紀雲南、越南與景德鎮青花瓷比較研究〉，頁390-397。

[129] 此破片與雲南大理州大理市蒼山出土的青花碗很相近，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卷16．甘肅、青海、宇夏、新疆、雲南、貴州、西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208。

[130] 施靜菲，〈異軍突起的越南青花瓷—兼介故宮新藏品〉，《故宮文物月刊》308期（2008.11），頁60-75。

[131] 關於越南青花起源的討論近來因為考古的新發現而引發不同的意見，例如越南青花的出現是否一定與景德鎮元代青花瓷有關？還是由當地的鐵繪發展而來，再受到景德鎮外銷青花瓷的影響？被認為是十四世紀後半才出現的越南青花瓷，卻有著與十四世紀早期就出現的越南鐵繪幾乎一模一樣的器型及紋飾；越南鐵繪與廣東海康窯鐵繪，甚至雷州半島鐵繪的可能關係也被提出來討論。相關討論的研究回顧，請見施靜菲，〈異軍突起的越南青花瓷—兼介故宮新藏品〉，頁62-63。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等。從最近的考古發現及研究中我們可推定，它們的生產時代約從十四世紀晚期延續到十五世紀初期。簡單型的作品在西村昌也的碗形編年中，屬於十四世紀後半，而在幾艘被認為是十四世紀晚期到十五世紀初期的沉船（Rang Kien及Song Doc）中，簡單型的碗盤與中國的龍泉窯青瓷一同出土。[132]日本德川家族收藏的青花龍紋瓶（圖64），[133]可說是從裝飾風格來看最接近景德鎮至正型青花瓷的作品，尤其是如蛇般長頸龍紋的表現以及各自分開的門字型變形蓮瓣，而且未見有洪武因子，時代可以定在十四世紀晚期；相對於龍紋玉壺春瓶十分接近元青花器形，龍紋瓶的特殊器形則相當有越南當地特色。然從許多風格特徵來看，大多數的作品都應該算是十五世紀早期以後的風格，例如河內的越南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青花大罐（圖65A）及日本私人收藏的八稜罐（圖66A），它們繁複多層的裝飾風格，以及纏枝牡丹莖葉的翻轉姿態，看起來也相當接近至正型（圖65B、66B），但已經出現洪武因子，例如形式化的波浪紋，相連的門字型變形蓮瓣及一正一反的回紋。[134]因此這類越南青花的年代應當是在洪武時期以後，接近十五世紀初期所生產的作品。

（2）第二期：1430－1480

著名的太和八年銘（1450）青花纏枝花卉紋大瓶（圖67）以及日本沖繩群島首里城京の內出土的青花玉壺春瓶，也因為遺址的年代確定，成為判斷十五

---

[132] 西村昌也、西野範子，〈ヴェトナム施釉陶器の技術・形態的視点からの分類と編年－10世紀から20世紀の碗皿を中心に〉。Roxanna 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63.

[133] 其他的例子可見日本的藏品，《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町田市：町田市立博物館2001），圖18、19、21三件玉壺春瓶的器形，龍紋、蕉葉文及口沿的梅月紋，都是接近至正型風格，另外圖8應該也是至正風格，但是圖7則是洪武風格了。

[134] 印尼爪哇Trowulan及大宰府遺跡出土越南青花破片，雖然乍看之下也與元青花『至正型』十分相近，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的話，會發現這個遺址出土與至正型元青花相近的越南青花作品，也已經出現洪武因子，牡丹花輪廓與填色間有一邊明顯空白而非像元青花之漸層渲染方式，螺絲狀的蓮葉都是洪武時期的特徵。施靜菲，〈異軍突起的越南青花瓷—兼介故宮新藏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 期刊資料庫

世紀中後期風格的重要標準器（圖68）。[135]太和八年銘大瓶整體架構以及纏枝牡丹紋雖神似元青花，然往平面鋪陳的牡丹莖葉以及用極細緻筆觸繪製的紋飾，風格更接近十五世紀初期的明代青花瓷，器形或許參考了永樂、宣德時期的作品，但整體裝飾結構有較多的空白，門字形變形蓮瓣相連且兩兩夾雜一小尖瓣的作法也是景德鎮永宣時期之後才出現的。[136]不過強調以細筆線條表現紋飾輪廓及表面肌理的獨特作風，標示著此時期越南陶瓷產業的工藝成就。這種細緻的風格，讓我們不禁聯想到昇龍城遺址中出土的越南青花官窯類型，[137]龍鳳紋的表現與器形都與中國明代中期官窯作品相當接近，不過越南青花作品碗盤圈足明顯較高，這個特徵在下一個階段更為明顯。而可能為印尼市場特殊訂製的十五世紀越南青花瓷磚，在爪哇Trowulan遺址以及中爪哇的Demak等地發現，[138]這批瓷磚與前述昇龍城發現的官窯類型作品，對於討論青花的生產與消費有重要的意義，未來值得進一步注意。

（3）第三期：1480－1530

會安沉船的發現，也讓我們對越南青花瓷的發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出土約三十萬件驚人數量的越南外銷瓷也標示著越南陶瓷量產及出口的高峰（圖74），根據共伴出土的中國陶瓷，此沉船的年代被認為約在十五世紀晚期到十六世紀初期，[139]沉船中發現的陶瓷也使得我們對越南青花瓷風格發展的架

---

[135] 矢島律子，〈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について〉，《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町田市：町田市立博物館，2001），頁4-7；沖縄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首里城京の內展：貿易陶磁からみた大交易時代》（沖縄：沖縄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圖446。

[136] Regina Krahl認為明代早期的青花風格在越南十五世紀青花上面看不到，此時期為越南青花自主性格的表現，並引用Pope對太和八年銘瓶牡丹紋風格與元青花不同卻與中國十五世紀中期青花罐相似的看法，懷疑有沒有可能是越南反過來影響中國青花的風格，Krahl,"Vietnamese Blue-and-White and Related Wares," p.149.

[137] Kerry Nguyen-Long,"Ba Dinh Excavation: Th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Arts of Asia*, vol.37, no.4(2007), pp.114-122.

[138] 參見本文同刊同期（《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5期）坂井隆教授之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構越來越清楚。其中較為精緻的大盤及罐類，與前一時期的風格可相連接，然大量較粗略繪畫的碗盤，被認為可能是不同窯口的作品，後者或是因應外銷而大量生產的作品。[140]前面提到雲南墓葬中出土的越南青花碗也屬於這個時期（圖23：圖版一一1），與此類似的高圈足碗在會安沉船中也可見到。

但整體來看，這個時期較看不到來自景德鎮青花瓷的直接影響，或許是景德鎮青花瓷在十五世紀的外銷市場沉寂所致，一直到菲律賓外海發現的Lena Shoal沉船才又活絡了起來，出土了被認為是弘治時期景德鎮青花外銷瓷以及與會安沉船同類型的越南青花瓷。[141]對照此沉船出土的景德鎮青花與會安沉船的越南青花，我們明顯看到此時期兩地的青花瓷風格已經幾乎沒有什麼交集了，既沒有第一期越南青花亦步亦趨地緊緊追隨景德鎮元青花的競爭感，也沒有第二期在有景德鎮至正型的餘蔭下，摻入明前中期官窯樣式後，將器形稍作轉化並逐漸建立越南獨特的細緻風格，而第三期這樣的越南獨特風格穩定的自我發展，有細緻及粗略的兩種風格並行發展。會安類型的青花加彩作品也突顯出這樣的發展，筆者將它稱之為「越南式鬥彩」（圖69），青花、紅彩、綠彩與金彩皆作為線條來描繪紋飾本身或物體的表面肌理。[142]而不像景德鎮的鬥彩，是以青花描繪輪廓線後，再填入色彩。

在過了越南陶瓷外銷的高峰期之後，越南的青花瓷仍持續燒造，十六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的越南青花瓷有許多紀年的寺廟供器可作為標準器，[143]另外學者也注意到，這個時期越南青花又重新受到景德鎮外銷瓷的影響，甚至有來自

---

[139] 此艘沉船的報導首見菊池誠一的介紹，〈ベトナム・ホイアン沖の沈没船引き揚げ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8，頁131-148；Butterfields Auctioneers Corporation, *Treasures from the Hoi An Hoard: Important Vietnamese Ceramics from a Late 15th/16th Century Cargo* (San Francisco: Butterfields Auctioneers Corporation, 2000); Nguyen Dinh Chien,"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from the Cu Lao Cham Shipwreck."

[140] 矢島律子，〈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について〉，《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頁4-7。

[141] 參見Franck Goddio, Stacey Pierson and Monique Crick, *Sunken Treasure: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2000), pp.26-27.

[142] 施靜菲，〈異軍突起的越南青花瓷—兼介故宮新藏品〉。

[143] Bui Minh Tri and Kerry Nguyen-Long,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ls.298-3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漳州窯的影響，[144]風格相對較為粗獷。

六、區域間陶瓷產業交流問題

前面我們已經提及，越南青花瓷與雲南青花瓷之間存在一些驚人的相似點，雖然兩地的青花瓷燒造都曾經受到景德鎮影響，因此有許多兩者共通的現象可能都來自景德鎮，但是還有許多兩者所共有而景德鎮沒有或少見的風格特徵。故在此筆者將先整理出這些特點，再配合裝燒工藝及原料的使用以及相關的時代問題，來探討越南青花瓷與雲南青花所存在的可能關係。最新的考古發現中，十五世紀後半之越南青花瓷在雲南地區的出土（圖23），以及雲南地區建水窯十五世紀青花瓷作品在越南昇龍城遺址中出土（圖62A）。過去越南陶瓷從未在中國境內出土，雲南青花瓷亦從未被認為曾經銷售到雲南以外的地區，這些新發現令人訝異及興奮，因為它們使得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及區域性陶瓷產業交流問題更加耐人尋味。

兩者青花瓷出現的時間很接近，大約都在十四世紀晚期。雲南青花瓷的燒造時代如前所述，可以確定時代的最早作品大概不會早於洪武時期，相較之下，從目前的資料看來，越南可能還要稍微早一點，在十四世紀70年代左右即開始青花瓷的製作。

（一）共通的裝飾母題及佈局

被認為是越南最早的青花瓷的碗、盤，繪有簡略菊花紋、卷草紋，碗類或許與景德鎮簡單型元青花在器形及紋飾佈局上都相當接近，但更常見的敞口盤有平沿及花口兩種，雖然景德鎮也有類似的大盤，但越南青花敞口盤整體造形明顯仿自龍泉窯青瓷盤（圖63）。從中型尺寸及圈足與口徑的比例就可以看得出來，連盤壁模印的長條菊瓣紋都有似曾相似的感覺，由仿自龍泉窯青瓷盤加

[144] 森達也，〈16-17世紀のベトナム青花：倣中国青花を中心に〉，《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町田市：町田市立博物館，2001），頁8-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鐵繪或青花菊花紋，相當耐人尋味。而雲南青花也經常是由仿龍泉青瓷器型加上青花或鐵繪裝飾，亦有同類模印菊瓣紋青瓷盤加上青花的例子（圖70）。這種以仿龍泉盤形加上青花裝飾的作法，與雲南青花瓷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雲南更明顯將青花繪飾在青釉之下，只是雲南此類作品的時代在十五世紀後半，與前述越南青花盤相差約五十年的差距，這其中是否有時代判斷上的誤差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討。

仿自金屬器的八稜造形在景德鎮元青花中不算少見（圖66B），紋飾通常扣合八稜器形來佈局，越南青花八稜罐或許也與景德鎮元青花八稜造型及紋飾有一定的關係，[145]但整體之紋飾佈局及細節，卻與一件最近公佈的雲南青花罐更相似（圖71），這件雲南青花罐亦為八稜器形，紋飾佈局及整體感都有越南青花八稜罐的影子，在這兩件罐上的門字形變形蓮瓣紋則連細節都幾乎一模一樣。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這經常作為邊飾的門字形變形蓮瓣紋，在雲南青花的例子上我們看到清楚的時代風格演變（圖43），門字形內的紋樣從仿自景德鎮至正型的如意雲頭紋到越趨簡化的漩渦狀。越南青花瓷雖然不見如雲南青花瓷中這麼清楚的演變軌跡，但也可見到類似之變化，從接近至正型的如意紋紋演變到漩渦狀，甚至在某些作品上修長的門字形變形蓮瓣紋內，誇張地裝飾一長串的漩渦（圖67）。而景德鎮青花瓷本身的門字形變形蓮瓣紋到了明代即發展出相當不同的變化，元青花中雖有漩渦狀紋飾（圖26B），但並不多見，由此更可突顯出雲南與越南的緊密關係。

雲南青花瓷常見魚藻紋，主要裝飾在玉壺春瓶器腹及盤心，景德鎮則從未見以魚藻紋裝飾玉壺春瓶的例子，大多飾大盤之盤心或大罐之器身。大盤盤心裝飾魚藻紋在景德鎮、雲南及越南都可見，但相較之下，雲南及越南似乎更為相近（圖72），尤其是盤心雙魚與水藻的佈局搭配（圖73）。[146]在箇舊出土青花執壺上，我們見到纏枝番蓮紋（圖48），裝飾在器身的心形開光中，而同樣的

---

[145] 參見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青花八稜獸耳罐，圖見彭卿雲、劉煒副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1．陶瓷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5），圖548；又以網格紋為地的例子可見同書圖571〈青花麒麟紋大盤〉盤壁的地紋。

[146] 景德鎮大盤盤心裝飾雙魚魚藻紋的例子見湖南常德徵集魚紋盤，圖見彭卿雲、劉煒副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1．陶瓷卷，圖5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器形及裝飾佈局則巧合地出現在一件越南的青花執壺上（圖74）。此外還有蕉葉紋裝飾盤底心及罐蓋的光芒狀紋飾（圖32、51），這類與銅鼓相通的紋飾在景德鎮極少見，卻出現在同屬於銅鼓文化區的越南紅河流域之青花盤上。[147]

上述這些在景德鎮青花瓷上少見的特徵，在兩地青花瓷上如此相似的表現，絕不可能只是巧合，必然是陶工模仿了所見到的作品或兩邊的陶工有所交流而產生的結果。

（二）工藝技術方面的類似表現

比起外觀上的學習模仿，工藝技術上面的相似，更能顯示出具體互動交流的存在。我們前面介紹雲南青花瓷的工藝特點時曾經提到，雲南青花瓷燒造以墊圈支釘疊燒，故燒成後會在碗心留下數目不等的支燒痕跡，此與越南青花瓷中部分碗盤的支燒方式極為類似（圖63）。支釘疊燒不是只為雲南與越南所特有，以支釘疊燒在碗心留下支燒痕跡的情形在宋元時期的廣西、湖南的窯場也可看見。

有些雲南青瓷及青花瓷圈足底部上有所謂的護胎醬色汁（圖7B），[148]這種所謂的護胎汁或稱巧克力底在越南青花作品上是普遍的現象，有人推測或許受到有些元青花作品器底的橘紅色效果（胎中的鐵份）影響。[149]但其實這樣的巧克力底從青花之前的青瓷或更早的時期就已經出現，因此也有人推測或許源起於模仿龍泉窯器底部的火石紅效果。[150]

越南青花鈷料來源，依據地緣關係及鈷礦生產來看，可能也與雲南有很深

---

[147] Bui Minh Tri and Kerry Nguyen-Long,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 225, pl.162; p. 223, pl.151a.

[148] 北京故宮藏玉溪窯標本，陳麗瓊、董小陳，〈建水瓷窯調查與探討〉，頁92-93。

[149] Regina Krahl,"Vietnamese Blue-and-White and Related Wares,"p.148. 另她在該文的注釋4回顧過去有關巧克力底出現原因的各種說法。

[150] Peter Lam,"Vietnamese Celad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Wares of Southern China,"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 1997), p.130.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的淵源。Adrain M. Joseph 將越南青花的鈷料發色粗分為兩大類，一類發色較明亮；另一類較為灰暗。他並提到透過科學化驗得知，發色明亮的一類的鈷料是外國鈷料；而灰暗的一類是錳的成份很高，為當地所產的鈷料。[151]Brown則認為鈷料呈清晰藍色的是中東的鈷料；而常用沒骨繪花，鈷料發色呈藍黑色的是中國土產的鈷料，按照地緣關係來判斷，雲南是中國最接近越南的鈷礦產地。[152]John Guy也認為紅河為雲南和東京（Tonkin）之間提供了一自然的橋樑，使得越南易於獲得來自雲南的鈷料。[153]科學化驗亦指出，雲南青花瓷含有高錳，[154]不同於進口鈷料含有高鐵低錳的特性，[155]發色通常多呈藍黑色，與越南灰暗的一類青花發色很接近。故若推測雲南輸出鈷礦到越南是極有可能的，而且也表明了越南的青花瓷與雲南青花瓷有很深的淵源，尤其是前述越南青花中發色較為灰暗的那類作品。[156]

雖然我們很難單就這些觀察即推斷，雲南與越南青花瓷在工藝技術方面一定有具體的交流，但除了兩地青花瓷在風格及裝燒工藝顯示出許多共通性之外，還有許多相關的現象值得考慮。我們前面提過，湖廣地區宋元時期的青瓷與雲南青瓷有很深的淵源。工藝技術上，可見到湖廣地區裝燒及窯具傳統與越南青瓷窯的共通性，或甚至有著共同的源頭。而十三到十四世紀越南紅河流域窯址與廣西瓷窯之間的緊密關係、十世紀越南青瓷與廣東青瓷之間的相似性，

---

[151] A. M. Joseph,*Chinese and Annamese Ceramic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London: Hugh Moss Ltd., 1973), pp.136-137.

[152] R. M. Brown, *The Ceramics of South-East Asia:Their Dating and Identification*（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3] J. S. Guy, *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 Ninth to Sixteen Centuri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7.

[154] 陳堯成、郭演儀、趙光林，〈玉溪、建水窯青花瓷器研究〉，頁167。

[155] 陳堯成、郭演儀、張志剛，〈歷代青花瓷器和青花色料的研究〉，《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59。

[156] 因為提煉較不細緻，含鐵份的雜質較多造成灰黑色Regina Krahl,"Vietnamese Blue-and-White and Related War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甚至漢代越南青瓷窯與中國南方瓷窯原本可能就同屬於一個窯系。[157]在更早的時期，雲南與越南更都是銅鼓文化區的重要成員，[158]這些緊密相關的脈絡都令人無法忽視這其中可能的聯繫。未來這些觀察都值得結合其他器類，例如青瓷及褐釉、甚至綠釉及黃釉作品到鐵繪及青花之發展，一起全面探討（圖75）。而若從地緣的關係來看，將滇、越與湖廣地區的窯址一起探討，它們相互之間的密切交流情形，使得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這個區域的陶瓷產業之間的連動性。

七、雲南與越南兩地的交往與區域網絡

由前面的分析看來，雲南地區與越南似乎是存在緊密的連繫，雖然過去學者們注意到兩地在陶瓷風格外觀上的一些共通性，但是很少將這個觀察放入具體的脈絡中探討。究竟兩地的具體交流過程是如何的進行？雲南玉溪、建水位於紅河流域的上游，與當時越南北部紅河流域下游的青花瓷窯都是盛產青花的地區，也是紅河流域上重要的交通要道及城市，兩地之間頻繁的商品流通也應在預料之中。

雲南與越南兩地之交通往來自古以來就很頻繁，唐時就已有自大理經昆明、通海、建水入交趾達今河內的詳細記載，[159]唐代有自安南北上通往雲南的

---

[157] 有關越南青瓷、高溫綠釉瓷與廣西瓷窯的關係，參見Rosemary Scott,"Southern Chinese Provincial Kilns: Their Importance and Possible Influence on South East Asian Ceramics,"in Rosemary Scott and John Guy eds., *South East Asia and China: Art, Interaction and Commerce,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17* (London: Perciv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5),pp.187-204. Peter Lam 提到Huet collection中一批帶耳罐與廣州南漢時期墓葬出土的帶耳罐有相當類似的器形（Peter Lam,"Vietnamese Celad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Celadons of Southern China," pp.129-145）Olvo Janse在二十世紀初期發掘越南北部漢代的青瓷窯，參見Morimoto Asako,"Kilns of Northern Vietnam," in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 (Chicagio: 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 1997), pp.84-93.

[158] 卡爾・L・赫特勒，〈滇文化、銅鼓在東南亞島嶼及其在東南亞史前史中的意義〉第2輯（1989.2），頁33-40。

[159] 方鐵，〈元代雲南至中南半島北部的通道和驛站〉，《思想戰線》1987年3期，頁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步頭路」，「步頭路」的「步頭」在今雲南建水縣南部紅河岸邊的阿土，[160]從當時安南都護府駐地（今河內）循紅河水道乘船而上，中間經過另一個水陸碼頭「賈勇步」，繼續乘船北上到「步頭」登岸陸行，可繼續經通海城、安寧等地，到達戎州（四川宜賓）。[161]而唐代時還有另一條通道，稱為「通海城路」，全線為陸路，由今之通海縣城南下，經建水，箇舊北部、蒙自、屏邊、河口，再由河口沿紅河河岸陸行至越南。[162]

宋代大理通越南，仍沿唐時期的通海城路，藉此路線，大理國之商人可直接深入當時大越國的渭龍州（今宣光省沾化縣）進行貿易。[163]元朝時，元憲宗三年（1253）蒙古滅大理之後，忽必烈更是將雲南當成是北攻南宋，南取安南的重要根據地，曾三次發動對安南的戰爭（1257－1287）。憲宗三年（1253）兀良合臺攻伐安南國，繼之命雲南王忽必烈忽哥赤往鎮大理、鄯闡及交趾，後又設達魯花赤監臨於交趾，曾激起交趾的不滿。安南王光昺於至元十二年（1275）疏奏撤回達魯花赤。他在奏表中表示，如能撤回達魯花赤，則交趾今後將「二次發遣鋼領，一詣鄯闡納貢，一詣中原拜獻」。可見元初當時交趾與雲南的交通貿易並未中斷。[164]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在雲南建立行省，翌年設立了雲南到安南的驛道，及從鄯闡（昆明）經蒙自沿紅河到大羅城（今河內），成為元朝連繫安南的主要通道。[165]《元史》地理志中即記述：「建水州，在本路之南。近接交趾，為雲南邊極」。

而明朝永樂時期還曾經短暫地統治過安南（1406－1428），成祖在攻打安南時，雲南就是大軍齊聚的出發之地。[166]宣德時也仍有往征交趾的戰事，昆明出土的明代潘俊墓誌，就提到潘俊在宣德丁未秋往征交趾、兵駐臨安（建水）

---

[160] 建水在唐時為雲南南方極邊，鄰接交趾。

[161] 尤中，〈公元十三世紀以前雲南與中印半島各地的交往〉，《雲南社會科學》1982年5期，頁60。

[162] 尤中，〈公元十三世紀以前雲南與中印半島各地的交往〉，頁61。

[163] 尤中，〈公元十三世紀以前雲南與中印半島各地的交往〉，頁61。

[164] 王胞生，〈元代入滇的畏吾爾人〉，《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1期，頁33。

[165] 方鐵，〈元代雲南至中南半島北部的通道和驛站〉，頁76。

[166]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事，⑯臨安為明朝與安南邊界的重要軍事要地。⑱前面提到建水是雲南青花窯址的重要所在地，由建水順著紅河水道即可到達越南的河內，兩地之間可能存在的緊密聯繫應該也就不足為奇。

滇、越雙方的貿易情況也同樣熱絡，雲南地區遠在秦漢時期就形成以滇池和洱海為中心的兩個經濟區域，分別和越南及緬、印有貿易往來。⑲唐宋以來的胡商外舶可由交趾而來雲南進行貿易，信仰伊斯蘭教的商人則由交趾進入雲南。當我們看到滇、越地區的青花瓷器存在著許多的共同點時，兩地在技術上或風格上透過窯工的移動或商品的流通而有影響關係。越南青花瓷在雲南火葬墓的出土已經被證實，而雲南地區的鈷料曾經銷往越南也並非不可能；或許不應該說「銷往」，他們事實上可能就是同屬一個陶瓷產業區域。前面也提到，可能是來自泰國及柬埔寨陶瓷亦在雲南出土，雲南的青花瓷則在越南北部出土，可見主流商道外（海洋貿易），區域間密切的貿易聯繫（陸路貿易）也不能被忽略。

結論

本文檢視雲南青花瓷的考古資料及過去的相關研究，整理雲南青花瓷的發展以呈現其面貌，並以雲南青花瓷為中心發展出雲南青瓷及越南青花瓷交流的相關問題。這些討論為中國西南地區陶瓷史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視野，在景德鎮青花的主流影響之外，重新檢視雲南青花瓷被嚴重忽略的主體性；探討雲南青花瓷與越南青花瓷的具體連繫，將研究視野導向重視區域陶瓷產業互動的發展。

由目前的出土實物來看，雲南青花瓷最早期的作品雖與景德鎮元青花風格相類似，但其實融入了景德鎮洪武時期的因素，因此其生產時代也只能早到明

⑯ 李安民，〈昆明官渡金馬山出土明潘俊墓誌〉，《雲南文物》21（1987），頁9。

⑱ 明朝政府在此地區設置衛所兵屯，動作頻仍，一切皆為防禦安南作為考量。參見方國瑜主編，《雲南地方史講義》下冊，頁41-42。

⑲ 陳茜，〈雲南對外貿易的歷史概述〉，《雲南地方民族史論叢》（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4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而非元代。在經過對雲南青花瓷進行仔細地風格比對及配合紀年作品的分析後，我們發現整個明代才是雲南青花瓷生產的主要時期，且由其風格發展可看出雲南明代青花瓷三個階段的發展序列，整個生產的時間從明初延續到明代晚期。過去學者將雲南青花瓷籠統視為同一時期且將時代定為元代或元末明初的看法必須修正，而往後在提到青花瓷的發展時，應將雲南青花瓷已發表的重要資料納入討論，並認識到其風格的演變發展。

雲南青花瓷的時代釐清之後，可為過去研究中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例如雲南火葬墓的時代，若由所出土的青花瓷來看，至少可延續到明代晚期；又在某些墓葬中，釉陶與青花瓷組合使用，也可藉青花瓷的時代來幫助解決雲南地區釉陶生產的時代問題及發展演變。雲南所生產的青瓷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環，也許由於青花瓷的鋒芒太露，以致於青瓷很少被討論，但其實雲南的青瓷生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青瓷為雲南燒造高溫瓷器的開始，為隨後發展的青花瓷奠立重要的基礎。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雲南青瓷有很多作品模仿龍泉窯的風格，但其燒瓷技術和裝燒方式很可能是來自湖南、廣西地區宋元的青瓷窯，而許多文獻的證據也可支持這樣的看法，未來的研究可繼續朝此方向前進。

雲南青花瓷繼青瓷之後出現，即在當地繁盛發展。分佈於滇池附近、大理地區及滇南建水等地的青花瓷窯址，出土有青花瓷的墓葬及遺址遍佈雲南各地，都讓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青花瓷生產及消費的盛況。雲南青花瓷的燒造，表現出有別於其它地區的特殊模式：在與其它生產青花瓷的地區對照下，雲南地區自外於景德鎮在明中晚期生產擴張的連鎖效應，始燒青花瓷的時間早於景德鎮外的其它內地區域。以當地落後的技術在燒造青瓷的基礎上來仿燒青花瓷，對品質要求不高，所生產的產品供應當地市場的需求，可見雲南地區對此新興產品有特別的喜好。在模仿景德鎮青花瓷時，出現將前後時期風格混雜的特殊情形；模仿景德鎮之後亦自行轉化發展出自己的特色。雲南青花瓷在火葬墓中的使用、具當地傳統文化特色紋飾之運用、適用器形的選擇，都表現出當地特殊的需求。從技術傳入、模仿景德鎮、逐漸走出地方的風格，到後來又停止生產，雲南青花瓷的發展似乎是在中國陶瓷史上不被預期的情況下，於西南地區伸出的初芽，默默地開花結果卻又無聲無息地凋零。

雲南青花瓷與景德鎮以外地區的交流，是過去學者鮮少注意的。雲南特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地理位置和其在交通貿易上所扮演的角色，都是雲南對外瓷業交流的重要因素，而過去在討論雲南的交通貿易時，較少注意到與越南方面的交往關係。從前面的討論，我們了解到雲南青花、尤其是玉溪及建水窯與越南紅河流域窯址在各方面相近。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同樣在創燒時期受到景德鎮的強烈影響，雲南不像越南有景德鎮元青花簡單型一類的影響，而且兩地在發展上有各自不同的重點，雲南青花第一期作品少見與越南青花相近的作品，在創燒階段兩地似乎有各自發展的脈絡，直接的紋飾風格流通或借用，似乎在雲南青花的第二期階段十五世紀後半左右才趨向密切發展，未來可進一步關注兩地往來密切與否的時間點變化。然而整體窯業的技術系統，青瓷、褐釉、鐵繪與青花的發展脈絡，以及因為原料及裝燒工藝的近似，而產生出許多風格相近難以分辨的作品，湖南、兩廣、雲南及越南北部是否可以視為一整個區域陶瓷產業的模式，似乎都值得我們未來進一步思考。

本文對雲南與越南瓷業交流的嘗試，希望對今後有關此方面的研究起一點啟示的作用。藉由我們對兩地之間工藝技術及貿易往來的研究，可以喚起大家更加注意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在大家僅對景德鎮青花瓷的主流發展以及傳佈有興趣時，區域性的互動被嚴重忽略。我們是否應該擺脫中心邊陲的概念，並撇開現代政治疆域的分界，重新思考十五世紀紅河流域陶瓷產業的生產情況，或許應該將雲南與越南青花瓷窯視為使用類似的原料，有相近的工藝技術及窯爐，生產難以劃分的同類作品，同屬於紅河流域的瓷窯生產更為合理。

〈附記〉

本文為筆者以1997年完成之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雲南青花瓷研究》為基礎改寫而成，該論文之指導教授謝明良，是啟發我對雲南青花瓷及其與越南青花瓷關係的重要人物；在本文的改寫階段，又不斷提供具前瞻性的想法與珍貴的資料，在此特別獻上我最深的謝意。論文準備階段之許多基礎資料，來自梅韻秋學友之慷慨提供；雲南的葛季芳女士及四川的黃承宗先生兩位長輩無私地提供當地出土的一手資料，讓筆者得以彌補無法親臨現場的遺憾；論文口試時承蒙現任震旦博物館館長張臨生女士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副處長蔡玫芬女士之細心指正，筆者受益良

臺灣博碩士學位論文 期刊資料庫

多，在此表示感謝。又本文改寫之順利完成，要感謝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王淑津同學在各方面的協助、碩士生彭寶儀同學幫忙整理資料及校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碩士生金恩慶協助整理圖像資料及繪製地圖。另外，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仔細地詳讀本文，提供確切而具體的建議，讓本文之論述更加紮實。最後，還要感謝鴻禧美術館慷慨出示館藏雲南青花窯址標本，讓筆者可以仔細比對玉溪窯及建水窯作品的特徵。然倘若本文有任何錯誤，文責由本人自行負責。

（責任編輯：王淑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

雲南地區青花瓷窯參考文獻

窯址	所在地	燒造品種	報告出處
玉溪	玉溪市東面3公里的囡囡山	青瓷 青花瓷 醬釉黑彩器	1.葛季芳，〈雲南玉溪發現古瓷窯址〉，《考古》，1962年2期，頁85。 2.葛季芳、李永衡，〈雲南玉溪古窯遺址調查〉，《考古》，1980年3期，頁284-286。 3.蘇伏濤，〈雲南玉溪元末明初龍窯的發掘〉，《考古》，1987年8年，頁728-733。 4.蘇伏濤、王國輝，〈元末明初玉溪龍窯的窯具〉，《雲南文物》，33期（1992），頁572-574。 5.馬勇昌，〈玉溪古窯址的發現、研究及其存在問題〉，《雲南文物》，1998年1期，轉引自《中國考古集成》西南卷第26冊（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頁69-72。 6.雲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紅塔區文物管理研究所，〈玉溪窯綜合勘查報告〉，《考古》，2001年12期，頁60-70。
建水	建水縣城北1.5公里的碗窯村	青瓷 青花瓷	1.葛季芳，〈雲南建水窯的調查與分析〉，《考古》，1987年1期，頁69-74。 2.張建農，〈雲南建水縣碗窯村古窯址調查〉，《考古》，1991年8期，頁767-768。 3.陳麗瓊、董小陳，〈建水瓷窯調查與探討〉，《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頁87-101。 4.蘇伏濤，〈建水窯青花瓷器概述〉，《雲南文物》，1987年21期，頁11-14。 ＊另蘇伏濤氏1987年在《雲南文物》第21期還發表有〈建水窯青花瓷器概述〉一文，但其中所用的資料與其發表在《考古》1987年8期〈雲南玉溪元末明初龍窯的發掘〉的資料竟有許多重複，如〈建水〉圖一-6與〈玉溪〉的圖五-10；或〈建水〉圖二-15與〈玉溪〉的圖五-8，筆者在使用時以〈雲南玉溪元末明初龍窯的發掘〉一文為主，因其屬於較正式的報告。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祿豐	羅川窯位於祿豐西南53公里，白龍井窯位於祿豐東北65公里	青瓷 青花瓷 褐彩（鐵繪） 灰白釉器 仿鈞釉器	1.李康穎，〈雲南祿豐發現元明瓷窯〉，《考古》，1989年9期，頁816-821。 2.李康穎，〈祿豐發現兩處古代瓷窯〉，《雲南文物》，25期（1989），頁29-37。 3.葛季芳，〈雲南祿豐縣元代羅川窯和白龍窯〉，《考古》，1990年8期，頁762-764。
鳳儀	鳳儀獅崗村	青瓷 青花瓷	段進明，〈鳳儀獅崗大理窯調查探勘報告〉，《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頁147-170。
祥雲		青瓷 青花瓷	目前尚未有正式的報告，只見當地學者文章中提及。 1.葛季芳，〈雲南古代青花料和青花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頁19。 2.葛季芳，〈景德鎮瓷器在雲南及其影響〉，《景德鎮陶瓷》，2卷2期（1992），頁40。
彌渡		青瓷 青花瓷	同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明）王世懋

《窺天外乘》，收入明沈節甫輯，《紀錄彙編》，北京：中華全國圖書文獻微縮複製中心，1994。

（明）王宗沐著、陸萬垓增補

《江西省大志》，收在《中國地方志叢書》，第779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明）宋濂等撰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元）汪大淵、蘇繼廎校釋

《島夷誌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

（宋）李誡

《營造法式》，卷33，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5。

（明）周景鳳

《正德雲南志》，上冊，收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70卷，上海市：上海書店。

（清）張廷玉等

《明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明）劉文徵著，古永繼點校本

《滇志》，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

（明）諸葛元聲

《滇史》，卷10，引自馬曜主編，《雲南簡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

（唐）樊綽

《蠻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近人論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5 《雲南陶瓷》，京都：美乃美株式會社．

大理市博物館

1991 〈雲南大理市蒼山玉局峰發現一座明代石室墓〉，《考古》，1991年6期，頁528-532。

尤中

1982 〈公元十三世紀以前雲南與中印半島各地的交往〉，《雲南社會科學》，1982年5期，頁55-61。

牛鴻賓

1991 〈明代雲南經濟發展研究述評〉，《雲南社會科學》，1990年1期，頁90-94、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杼
1990 〈八角星紋與史前織機〉,《中國文化》, 2, 頁84-94。
王胞生
1991 〈元代入滇的畏吾爾人〉,《雲南民族學院學報》, 1991年1期, 頁28-33。
方國瑜主編
1983 《雲南地方史講義》, 下冊, 昆明:雲南廣播電視大學。
方鐵
1987 〈元代雲南至中南半島北部的通道和驛站〉,《思想戰線》, 1987年3期, 頁73-79。
1988 〈元代雲南驛傳的特點及作用試探〉,《思想戰線》, 1988年1期, 頁63-69。
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
1984 〈西昌發現古代火葬墓〉,《考古》, 1984年9期, 頁857-858。
卡爾・L・赫特勒
1989 〈滇文化、銅鼓在東南亞島嶼及其在東南亞史前史中的意義〉,《南方民族考古》, 第2輯, 頁33-40。
朱伯謙
1989 〈龍泉大窯古瓷窯遺址發掘報告〉,《龍泉青瓷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頁38-67。
1998 《龍泉窯青瓷》, 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朱雲生
2007 〈雲南建水古窯產品的新發現〉,《中國古陶瓷研究》, 第13輯, 頁66-73。
任兆磊
1991 〈從造型藝術看大理地區佛教信仰的特點〉,《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 高雄:佛光出版社, 頁415-436。
李中清
1980 《清史論叢》, 第5輯, 北京:中華書局。
李安民
1987 〈昆明官渡金馬山出土明潘俊墓誌〉,《雲南文物》, 21, 頁7-9。
李家瑞
1960 〈滇西白族火葬墓概況〉,《文物》, 1960年6期, 頁52-55。
李鏵
1991 〈廣西興安縣嚴關宋代窯址調查〉,《考古》, 1991年8期, 頁764-766。
汪慶正編
1987 《青花釉裏紅》, 香港:上海博物館、兩木出版社。
汪寧生
1980 《雲南考古》,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呂蘊琪
1988 〈騰衝火葬墓及重要遺物〉,《雲南文物》, 23期, 頁20-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世榮、張中一、盛定國
1984 〈湖南古窯址調查之一—青瓷〉,《考古》, 1984年10期，頁915-926。
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黃綱正
1982 〈長沙銅官窯頭沖宋代瓷窯調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46-250。
段進明
2007 〈鳳儀獅崗大理窯調查探勘報告〉,《中國古陶瓷研究》, 第13輯，頁147-165。
段綏
1992 〈大理發現一座明代火葬墓〉,《雲南文物》, 34期，頁9-10。
施靜菲
1997 《雲南青花瓷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008 〈異軍突起的越南青花瓷—兼介故宮新藏品〉,《故宮文物月刊》, 第308期，頁60-75。
省文物工作隊
1982 〈昆明陰山明墓發掘報告〉,《雲南文物》11期（1982.6）, 頁31-33。
姚繼德
1995 〈雲南穆斯林朝覲小史〉,《雲南民族學院學報》, 1995年3期，頁64-69。
姚繼德、李榮昆、張佐
2005 《雲南伊斯蘭教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馬文斗
2001 《玉溪窯》, 上海：文匯出版社。
馬興東
1990 〈元代以前有關雲南回族族源問題的進一步探討〉,《雲南社會科學》, 1990年2期，頁6-53。
馬曜
1983 《雲南簡史》,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孫太初
1955 〈雲南西部的火葬墓〉,《考古通訊》, 1955年4期，頁30。
袁見齊、朱熙人、郭令智
1940 《雲南礦產志略》,《雲南大學叢刊》, 1，昆明：雲南大學。
唐昌朴
1984 〈涼山州古陶瓷窯址考察記略〉,《四川古陶瓷研究》, 2，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頁194-198。
徐惠萍
2007 〈祿豐碧城出土一批陶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 第13輯，頁127-132。
秦樹才
1990 〈明代軍屯與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昆明師專學報：哲社版》, 引自《複印報刊資料》明清史，1990年1期，頁27-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
1987 〈四川西昌楊家山火葬墓群〉,《文物資料叢刊》, 10, 頁151-154。
陳久金、盧央、劉堯漢
1983 《彝族天文學史》,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陳泰敏、王國輝
2000 〈玉溪小矣資墓葬出土民窯瓷器〉,《雲南文物》2000年2期。轉引自《中國考古集成》, 西南卷第26冊, 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頁528-532。
陳茜
1986 〈雲南對外貿易的歷史概述〉,《雲南地方民族史論叢》,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頁434-467。
陳堯成、郭演儀、趙光林
1992 〈玉溪、建水窯青花瓷器研究〉,《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論文集1》,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頁162-170。
陳堯成、郭演儀、張志剛
1984 〈歷代青花瓷器和青花色料的研究〉,《中國古陶瓷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頁44-59。
陳麗瓊、董小陳
2007 〈建水瓷窯調查與探討〉,《中國古陶瓷研究》, 第13輯,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頁87-101。
翁宇雯
2008 〈明代官窯的伊斯蘭裝飾要素〉,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08 《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張柏主編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北京：科學出版社。
張建農
1989 〈建水城北古瓷片及器物的情況調查〉,《雲南文物》, 25期, 頁14-18。
張浦生
1995 《青花瓷器鑒定》,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張臨生
1986 〈我國明朝早期的掐絲琺瑯工藝〉,《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 第15卷, 頁265-306。
張錫錄
1982 〈白族對於魚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雲南社會科學》, 1982年6期, 頁79-82。
1991 〈古代大理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吒力〉,《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 高雄：佛光出版社, 頁171-214。
馮先銘
1981 〈青花磁器の起源に關する諸問題〉,《世界陶磁全集 13 遼・金・元》, 東京：小學館, 頁261-2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馮先銘著、謝明良譯
1983〈關於青花瓷器起源的幾個問題〉,《雄獅美術月刊》,148期,頁117-123。
雲南考古工作隊
1981〈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與清理〉,《考古學報》,1981年2期,頁245-267。
雲南省人口普查辦公室編
1992《雲南省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昆明:中國統計出版社。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曲靖八塔台與橫大路》,北京:科學出版社。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館
2002《大理大豐樂》,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蒙自州文物管理所
2006〈蒙自瓦渣地墓地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頁235-268。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大理市博物館
2006〈大理下關苗圃山墓地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社,頁202-235。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箇舊市博物館
2006〈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社,頁159-192。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議所、紅河州文物管理所、瀘西縣文物管理所
2006〈瀘西縣羊格黑明清哨所遺址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69-276。
黃承宗
1983〈四川西昌三坡火葬墓調查記〉,《考古》,1983年3期,頁282-283。
1984〈西昌出土陶瓷及陶窯綜述〉,《四川古陶瓷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頁199-210。
1993〈從文物考古材料看前蜀、後蜀與南詔、大理的經濟文化關係〉,《前後蜀的歷史與文化—前後蜀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頁18-23。
湖南省博物館劉茂
1985〈湘江中下游地區三處古窯址調查〉,《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51-265。
閔銳、劉旭、段進明
2007〈大理大豐樂墓地出土瓷器介紹〉,《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133-146
彭卿雲主編、劉煒副主編
1993《中國文物精華大全》,卷1・陶瓷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普璋開
1990〈滇南彝族葬俗及其改革〉,《雲南社會科學》,1990年3期,頁63-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葛季芳
1962 〈雲南玉溪發現古瓷窯址〉,《考古》, 1962年2期，頁85。
1984 〈祿豐火葬墓及其青花瓷器〉,《文物》, 1984年8期，頁85-90。
1987 〈雲南建水窯的調查與分析〉,《考古》, 1987年1期，頁69。
1990 〈雲南古代青花料和青花瓷器〉,《江西文物》, 1990年2期，頁17-19。
1992 〈景德鎮瓷器在雲南及其影響〉,《景德鎮陶瓷》, 第59期，頁37、39。
2005 〈元代雲南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 第11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162-171。
葛季芳、李永衡
1980 〈雲南玉溪古窯遺址〉,《考古》, 1980年3期，頁284-286。
楊大申
1982 〈關於祿豐縣元墓出土青花瓶的一點看法〉,《考古》, 1982年4期，頁414-416。
楊帆
2007 〈雲南青花瓷器的創燒年代及相關問題〉,《中國古陶瓷研究》, 第13輯，頁15-27。
楊帆、王河云、龔紹林
2001 〈玉溪窯綜合勘查報告〉,《文物》, 2001年4期，頁60-70。
楊帆、朱雲生、張聰、范冕、白成明、段汝剛、張曉繞
2001 〈雲南瀘西縣和尚塔火葬墓的清理〉,《考古》, 2001年12期，55-86。
楊伯達
1974 〈論景泰藍的起源〉,《故宮博物院院刊》, 1974年4期，頁16-24。
楊樹鈞主編
1989 《雲南回族史》, 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楊衛東
2007 〈建水青花與元青花紋飾對比初探〉,《中國古陶瓷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 第13輯，頁102-108。
詹承緒、張旭
1990 《白族》, 北京：民族出版社。
熊海堂
1995 《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劉世旭
1981 〈四川西昌市郊小山火葬墓群試掘記〉,《考古與文物》, 1981年1期，頁47-52。
劉良佑
1993 〈元末明初的雲南青花瓷〉,《典藏藝術》, 14期，頁164-169。
劉新園
1996 〈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 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頁9-49。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
1984 〈廣西永福窯田嶺宋代窯址發掘簡報〉,《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01-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蔣高辰
2001 《建水古城的歷史記憶》，北京：科學出版社。
謝玉珍
2007 〈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紋的意涵〉，《故宮學術季刊》，25卷1期，頁104-105。
羅振廷
1992 〈雲南景洪曼閣渡口古墓葬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92年1期，頁157-161。
羅運治
1989 〈 明代沐氏經略雲南〉，《淡江學報》，20期，頁105-131。
蘇伏濤
1987 〈雲南玉溪元末明初龍窯的發掘〉，《考古》，1987年8期，頁728-733。
2002 〈大理國羅伽部火葬墓陶瓷考〉，《中國古陶瓷研究》，第8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73-80。
鐘德宏
1990 〈黔西北古水西彝族的葬制—火葬〉，《貴州文史叢刊》，1990年3期，頁131。
中澤富士雄、長谷川祥子編著
1995 《元明の青花》，東京：平凡社。
出光美術館
1987 《中國陶磁》，東京：出光美術館。
矢島律子
2001 〈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について〉，《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頁4-7。
西村昌也、西野範子
2005 〈ヴェトナム施釉陶器の技術・形態的視点からの分類と編年－10世紀から20世紀の碗皿を中心に〉，《上智アジア學》，第23號，頁80-121。
西田宏子
1995 〈ベトナム古陶磁調查：1995年ラムドン省の遺跡と出土品を中心に〉，《陶說》，509，頁29-37。
町田市立博物館
2001 《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
町田市立博物館
1995 《クメールのきもの》，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
長谷部樂爾、藤岡了一編
1976 《世界陶磁全集》，14・明代，東京：小學館。
長谷部樂爾
1990 〈インドチナ半島の陶磁概說〉，《インドチナ半島の陶磁》，東京：琉璃書房，頁179-2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青柳洋治
1993 〈島嶼部東南アジア出土のベトナム陶磁器－十四世紀から十六世紀を中心〉，日本ベトナム研究者會議編《海シルクロドとベトナム》，東京：穂高書店。
澀谷區立松濤美術館
1988 《タイ・ベトナムの古陶磁》，東京：澀谷區立松濤美術館。
菊池誠一
1997 〈ベトナム・ホイアン沖の沈沒船引き揚げ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8，頁131-148。
森本朝子
1993 〈ベトナム貿易陶磁〉，《上智アジア學》，11號，頁47-74。
〈日本出土のベトナム陶磁とその產地〉，《東洋陶磁》，vol.23、24，1993、1994-95，頁45-64。
1995 〈ベトナム北部ハイフン省の古窯址をたずれて〉，《陶說》，509，頁38-47。
2002 〈ベトナム陶磁：日本における研究の成果と課題〉，《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頁284-291。
森村健一
1996 〈フィリピン・パンダナン島沖沈沒船引き揚げ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6，頁111-125。
森達也
2001 〈16－17世紀のベトナム青花：倣中国青花を中心に〉，《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頁8-10。
横田賢次郎
1991 〈大宰府出土のベトナム陶磁〉，《貿易陶磁研究》，11，頁101-110。
Ayers, John and Krahl, Regina
1981 *Oriental Ceramics: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vol.9,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86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vol.I.
Brinker, Helmut and Lutz, Albert, trans. from the German by Swoboda, Susanna
1989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London: Asia Society Galleries, New York: In association with Bamboo Publishing Ltd..
Brown, R. M.
1977 *The Ceramics of South-East Asia: Their Dating and Identific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Bui, Minh Tri and Long, Kerry Nguyen
2001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Hanoi: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utterfields Auctioneers Corporation

2000 *Treasures from the Hoi An Hoard: Important Vietnamese Ceramics from a Late 15th/16th Century Cargo,* San Francisco: Butterfields Auctioneers Corporation.

Chen, Yaochen, Guo, Yanyi and Chen, Hong

1994 "Sources of Cobalt Pigment Used on Yua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ares," *Oriental Art,* vol. XL no.1, Spring, pp.14-19.

Diem, Allison I.

1997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in the Philippines: Late 14th -16th Centuries," in Gutuaco, Larry, Tan, Rita C. and Diem, Allison I. eds.,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Bookmark, pp.183-206.

Goddio, Franck, Pierson, Stacey and Crick, Monique

2000 *Sunken Treasure: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Guy, John S.

1982 "Vietnamese Trade Ceramics," *Vietnamese Ceramic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8-35.

1986 *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 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seph, A. M.

1973 *Chinese and Annamese Ceramic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London: Hugh Moss Ltd..

Krahl, Regina

1997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and Related Wares," in Stevenson, John and Guy, John eds.,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pp.146-157.

Lam, Peter

1997 "Vietnamese Celad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Wares of Southern China," *Vietnamese Ceramcis: A Separate Tradition,*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 pp.128-145.

Long, Kerry Nguyen

2007 "Ba Dinh Excavation: Th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Arts of Asia,* vol.37, no.4, pp.114-122.

Museum of Hai Hung province, Bao Tang Tinh Hai Hung

1993 *Chu Dau Ceramics of Vietnam,* Museum of Hai Hung province.

Nguyen, Dinh Chien

2008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from the Cu Lao Cham Shipwreck," *Viet Nam from Myth to Modernity,* Singapor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pp.29-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idho, Abu

1982 “Notes on the Wall Tiles of the Mosque at Demak,” *Vietnamese Ceramic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6-37.

Tang, Ba Hoanh

1997 “15th -16th Century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 Production Centers,” Gotuaco, Larry, Tan, Rita C. and Diem Allison I. eds.,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 Bookmark, pp.209-219.

Van Orsay de Flines, E. W.

1972 *Guide to the Ceramic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Pusat Jakarta,* Jakarta: Museum Pusat Djakarta (first edition in Dutch, 1949).

Young, Carol M., Dupoizat, Marie-France and Lane, Elizabath W. eds.

1982 *Vietnamese Ceramics,*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Willet, William

1982 “Bridg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mal Relationships in Vietnamese Ceramics of the 11th-16th Centuries,” *Vietnamese Ceramic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紅河流域區域地圖（金恩慶協助繪製）
圖2　《雲南陶磁》，圖82
圖3　《雲南陶磁》，圖91
圖4　《雲南陶磁》，圖85
圖5　〈玉溪窯綜合勘查報告〉，頁67，圖一八
圖6　《雲南陶磁》，圖92
圖7A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施靜菲攝
圖7B 鴻禧美術館藏，施靜菲攝
圖8A 〈玉溪窯綜合勘查報告〉，頁61，圖二
圖8B 〈玉溪窯綜合勘查報告〉，頁61，圖四
圖9　《雲南陶磁》，圖90
圖10 〈鳳儀獅崗大理窯調查探勘報告〉，頁152，圖七
圖11 〈雲南祿豐發現元明瓷窯〉，頁820，圖六
圖12 〈雲南祿豐發現元明瓷窯〉，頁818，圖四
圖13 《玉溪窯》，圖2-50
圖14 《近年來發見の窯址出土中國陶磁展》，圖319
圖15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6冊，圖187
圖16 《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圖版一四
圖17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6冊，圖200
圖18 〈大理大豐樂墓地出土瓷器介紹〉，頁140，圖三
圖19 〈大理下關苗圃山墓地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圖一二
圖20 《大理大豐樂》，彩版四及二八
圖21A《大理大豐樂》，彩版九
圖21B《雲南陶磁》，圖56
圖22 〈雲南大理市蒼山玉局峰發現一座明代石室墓〉，頁529，圖二
圖23 《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圖版一〇及一一
圖24 〈建水城北古瓷片及器物的情況調查〉，頁16
圖25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6冊，圖186
圖26A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彭寶儀、司愛嫣攝
圖26B《江西文物》，1990年2期，封底圖3
圖27A〈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頁182，圖六八
圖27B *Chu Dau Ceramics of Vietnam*, 圖A15
圖28A〈元代雲南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1輯，頁169，圖二
圖28B《タイ・ベトナムの古陶磁》，圖72
圖29 《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彩圖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0A《雲南陶磁》，圖83
圖30B《龍泉窯青瓷》，圖260
圖31 《雲南陶磁》，圖89
圖32 《雲南陶瓷》，圖78
圖33A〈祿豐火葬墓及其青花瓷器〉，圖版肆之1
圖33B《玉溪窯》，圖4-42
圖34 《世界陶瓷全集》，14．明，圖35
圖35 《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圖554
圖36 《元明の青花》，頁110
圖37 《雲南青花瓷研究》，104-105
圖38 《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圖553
圖39 《玉溪窯》，圖4-3
圖40 《玉溪窯》，圖2-40
圖41 《雲南陶瓷》，圖107
圖42 《雲南青花瓷研究》，117
圖43 《雲南青花瓷研究》，139
圖44 《玉溪窯》，圖2-57
圖45 《雲南陶磁》，圖70
圖46A《雲南陶磁》，圖75
圖46B《玉溪窯》，圖4-40
圖47 《雲南陶磁》，圖66
圖48 〈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頁172，圖三〇
圖49 《玉溪窯》，圖2-52
圖50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圖648
圖51 〈蒙自瓦渣地墓地發掘報告〉，頁252，圖二五
圖52 《景德鎮民間青花磁器》，圖28
圖53A《大理大豐樂》，HZM577
圖53B《江西文物》，1990年2期，圖版參-8
圖54A《雲南陶磁》，圖60
圖54B《玉溪窯》，圖4-102
圖55 《雲南陶磁》，圖77
圖56 《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圖版一五
圖57A〈雲南瀘西縣和尚塔火葬墓的清理〉，頁68，圖一六之9
圖57B〈雲南瀘西縣和尚塔火葬墓的清理〉，頁68，圖一六之1、2、4、5
圖58 《雲南陶磁》，圖99
圖59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彭寶儀、司愛嫵攝
圖60 《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圖版一〇之1、2
圖61 《大理大豐樂》，圖七九之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2A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106, fig.4
圖62B《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6冊，圖208
圖63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250
圖64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262, pl.36
圖65A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267
圖65B《青花釉裡紅》，圖10
圖66A《ベトナム青花：大越の至上の華》，頁22，圖12
圖66B《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圖543
圖67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pl.637
圖68　《首里城京の內展:貿易陶磁からみた大交易時代》，圖446
圖69　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圖70　《雲南陶磁》，圖84
圖71　《玉溪窯》，圖2-32
圖72A〈建水青花與元青花紋飾對比初探〉，《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3輯，頁105，圖五
圖72B《玉溪窯》，圖2-49
圖73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270
圖74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334
圖75A《雲南陶磁》，圖81
圖75B *Vietnamese Blue-and-White Ceramics*, p.2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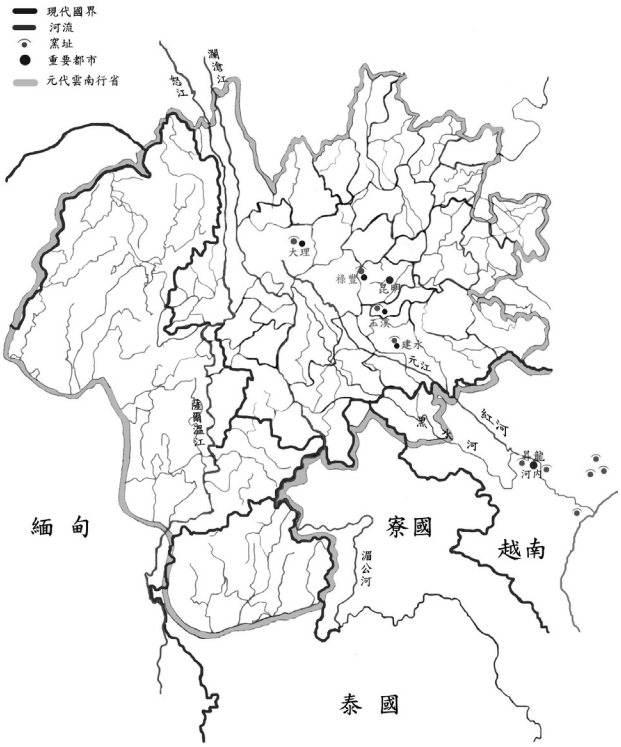


圖1　中國雲南與東南亞國家交界圖



圖2　支釘間隔重合疊燒
建水窯址出土　雲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 建水窯出土青花瓷破片 雲南省博物館藏



圖4 雲南青花瓶頸及瓶座殘片 雲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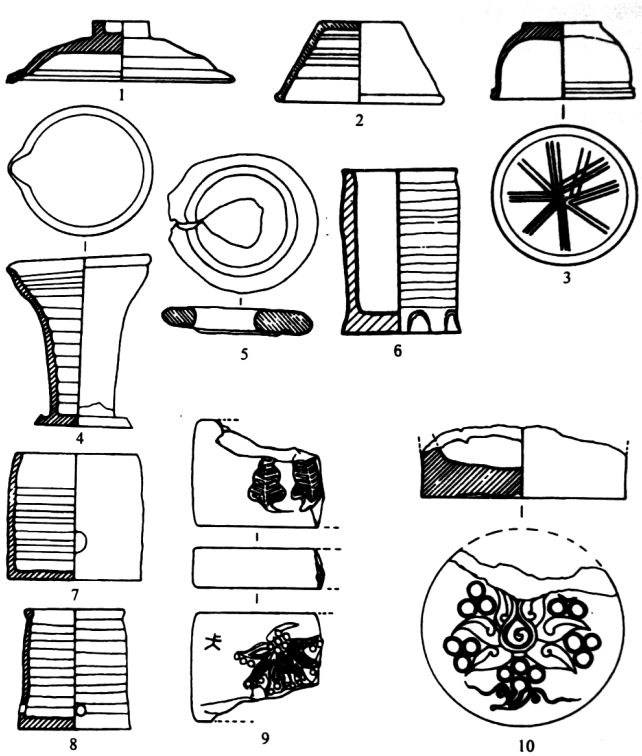


圖5　玉溪窯窯具：匣缽（7及8）



圖6　玉溪窯青花魚藻文破片　雲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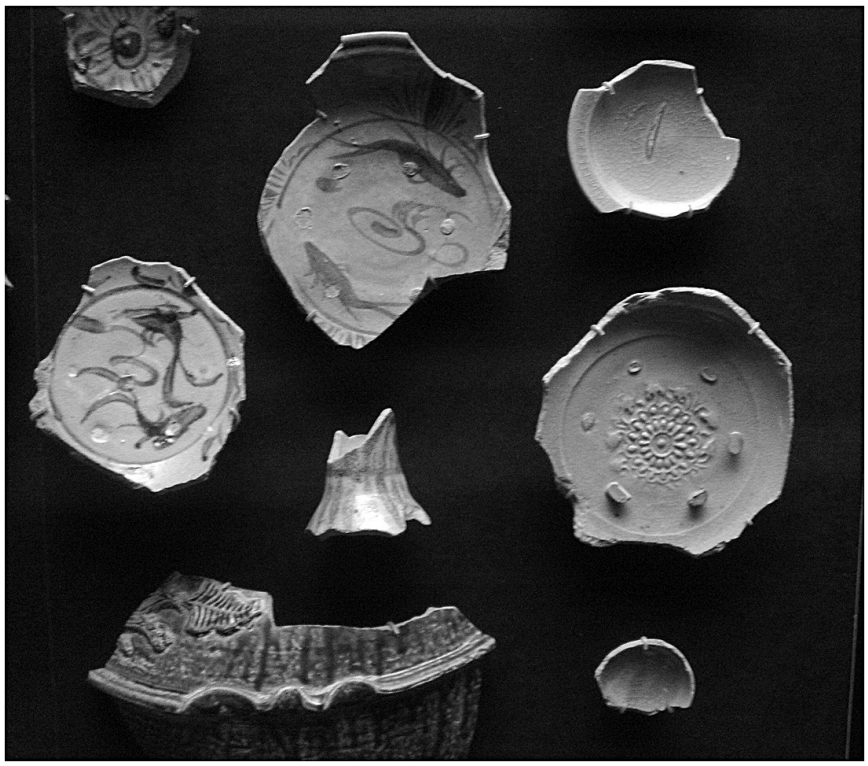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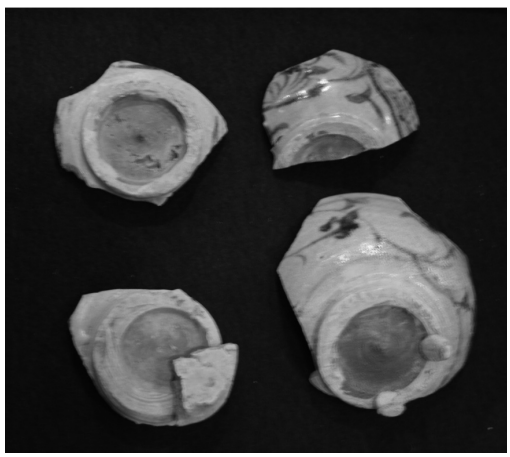


圖7A 玉溪窯標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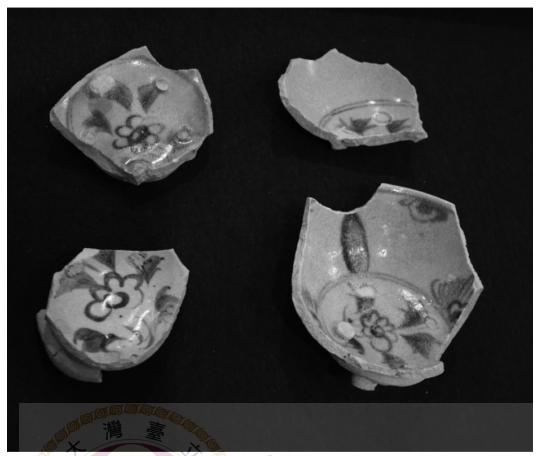


圖7B 玉溪窯標本 鴻禧美術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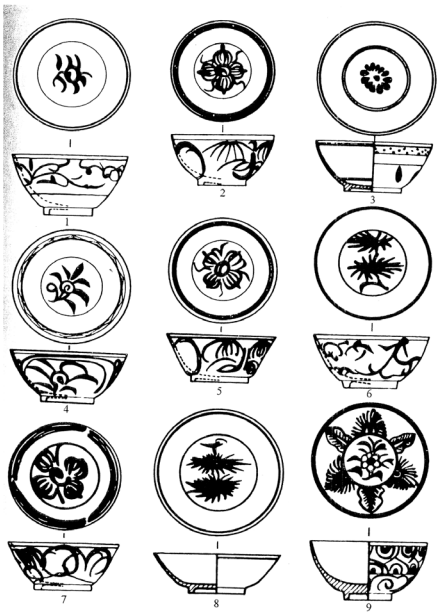


圖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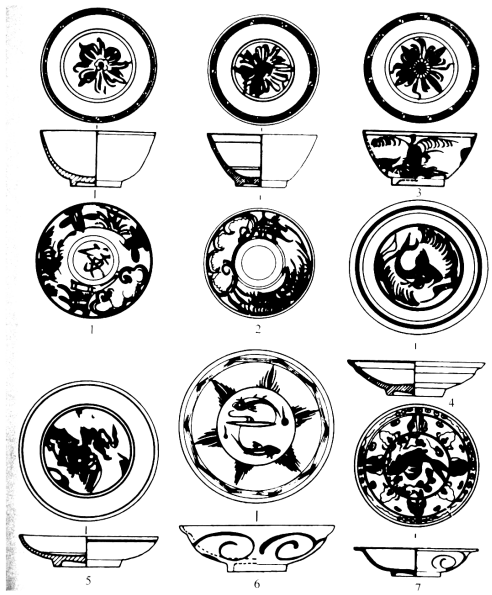


圖8B

玉溪窯窯址出土青花瓷標本



圖9　建水窯青花魚藻紋及花鳥紋破片　雲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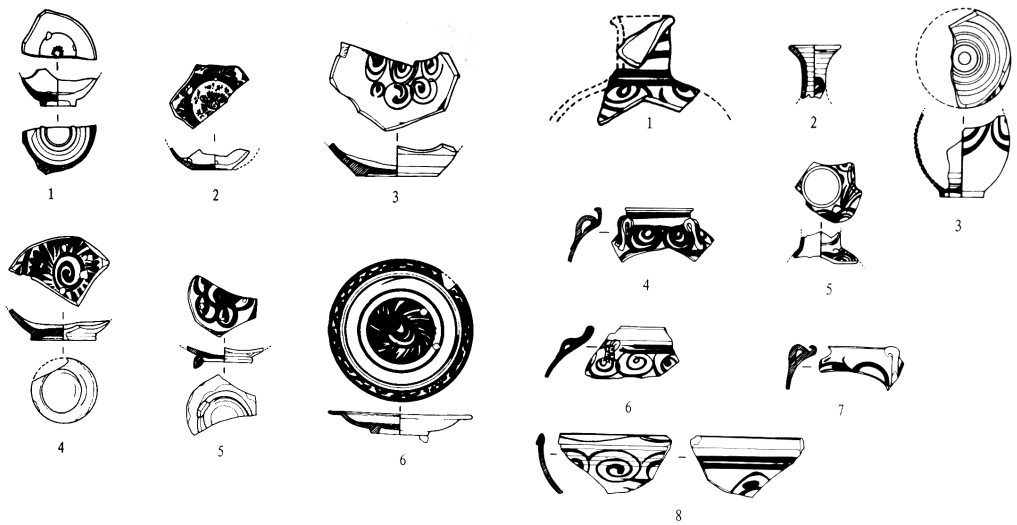


圖10 大理鳳儀窯址出土青花破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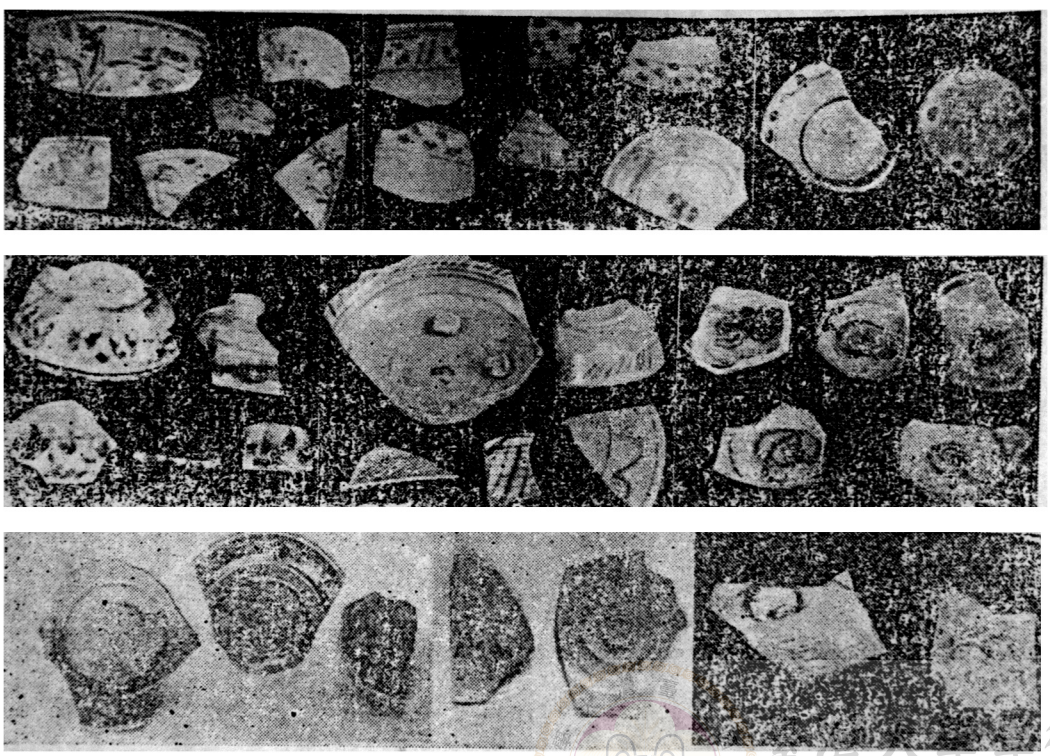


圖11 祿豐羅川窯窯址出土標本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學院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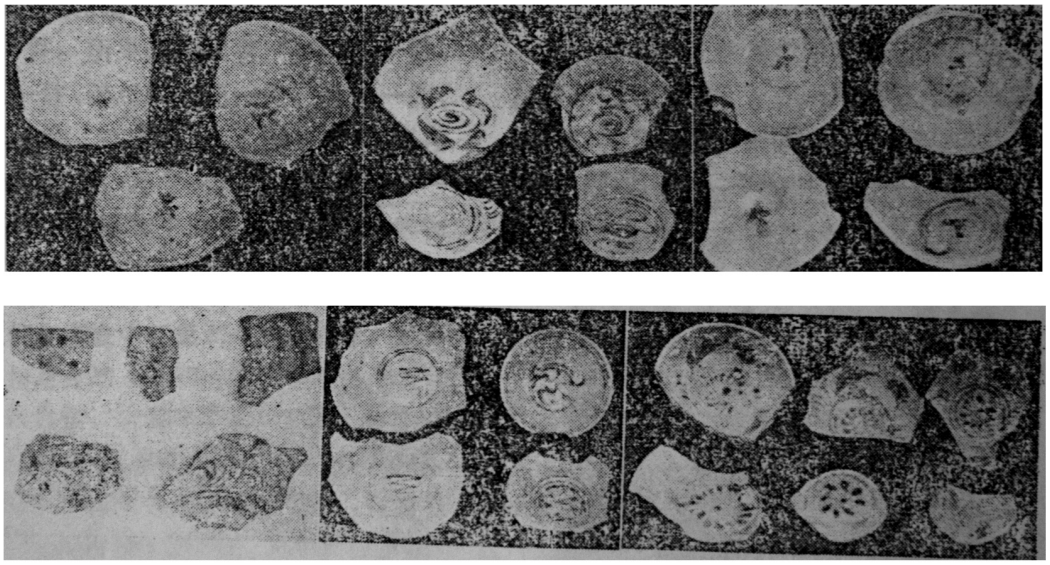


圖12　祿豐白龍井窯窯址出土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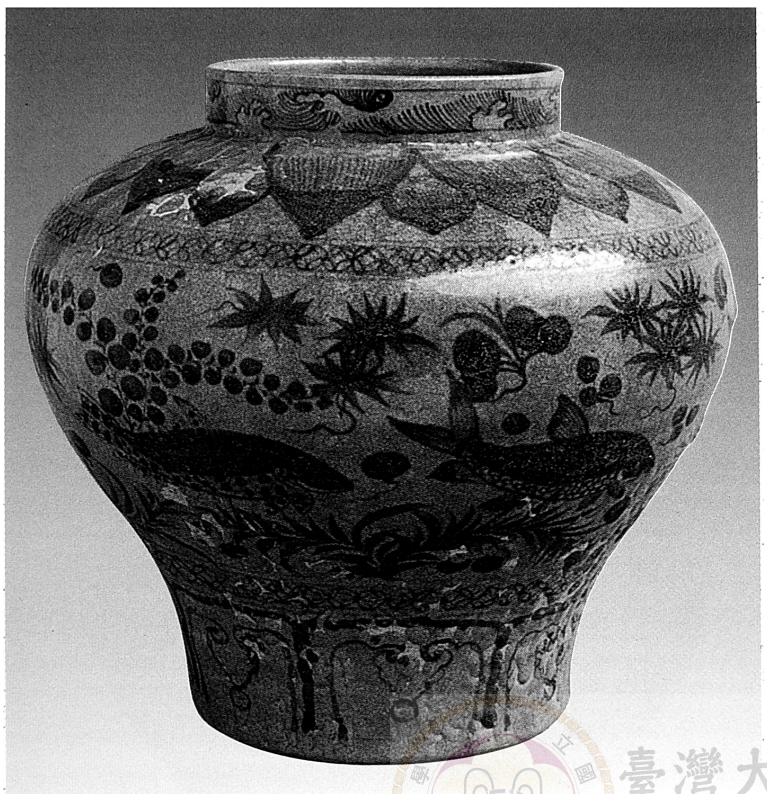


圖13　雲南青花魚藻紋大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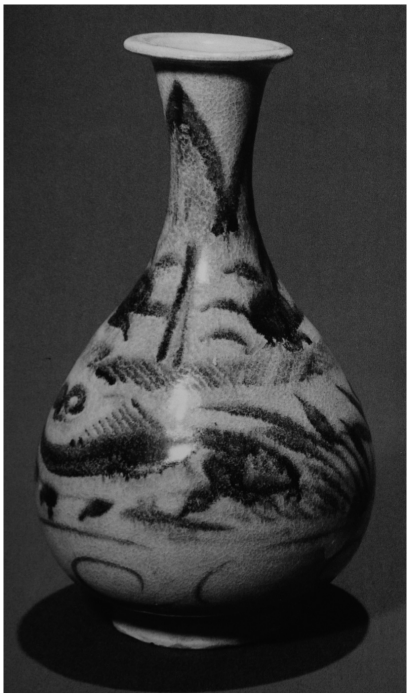


圖14 玉溪窯青花玉壺春瓶
祿豐火葬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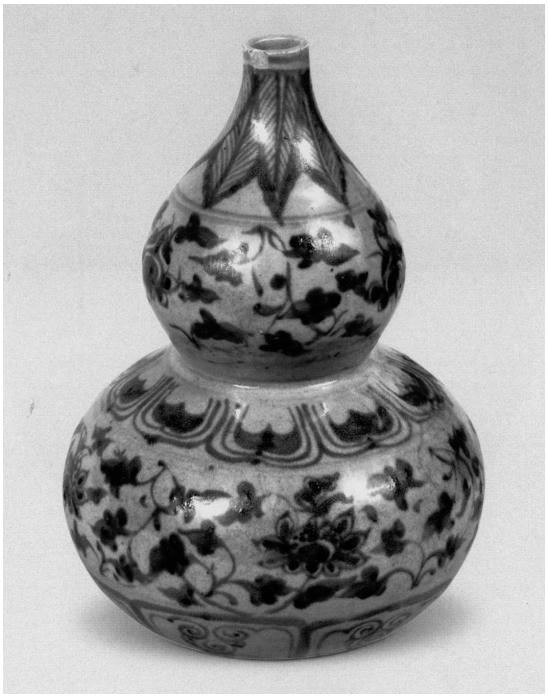


圖15 雲南青花葫蘆瓶 劍川中科山出土
大理州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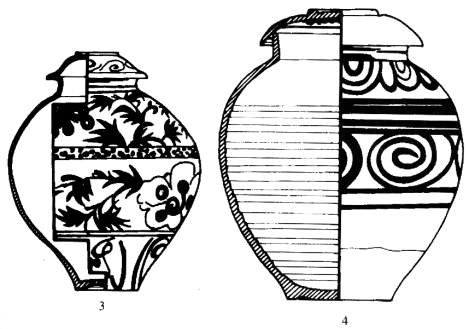


圖16 雲南青花觚形瓶 蒙自瓦渣墓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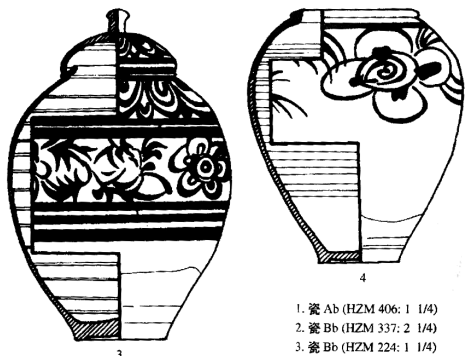
圖17 雲南青花牡丹紋罐
雲南大理鳳儀縣大豐樂出土
大理市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瓷 Ab (HZM 376: 1 1/6)　2. 瓷 Ba (HZM 295: 1 1/6)
3. 瓷 Bb (HZM 577:1 1/6)　4. 瓷 Bb (HZM 326: 2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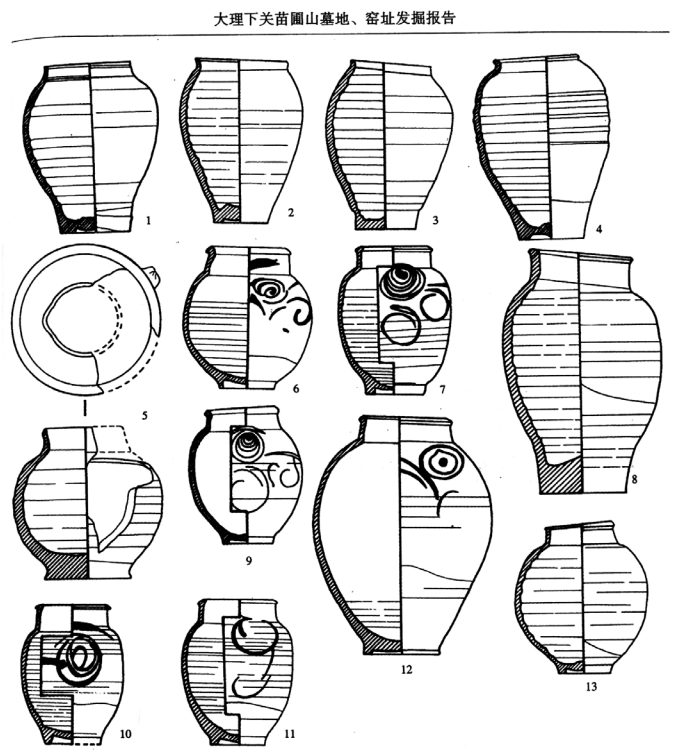
图三　火葬墓中出土的瓷葬具



1. 瓷 Ab (HZM 406: 1 1/4)
2. 瓷 Bb (HZM 337: 2 1/4)
3. 瓷 Bb (HZM 224: 1 1/4)
4. 瓷 Ba (HZM 511: 1 1/4)

图二　火葬墓中出土的瓷葬具

圖18　雲南青花罐　大理大豐樂墓地出土



大理下关苗圃山墓地、窑址发掘报告

图一二　瓷葬具及随葬品

1，12. 瓷葬罐 HZM25：1，19：1（1/8）；随葬品：2. HZM12：1；3. HZM21：D；
4. HZM22：C（1/8）；5. M8：1（1/4）；6. M6：1；
7. M9：1（1/8）；8. HZM21：A：3（1/4）；9. M2：6；
10. M3：1；11. M10：1；13. M1：2（1/8）

圖19　雲南青花罐　大理下關苗圃山墓地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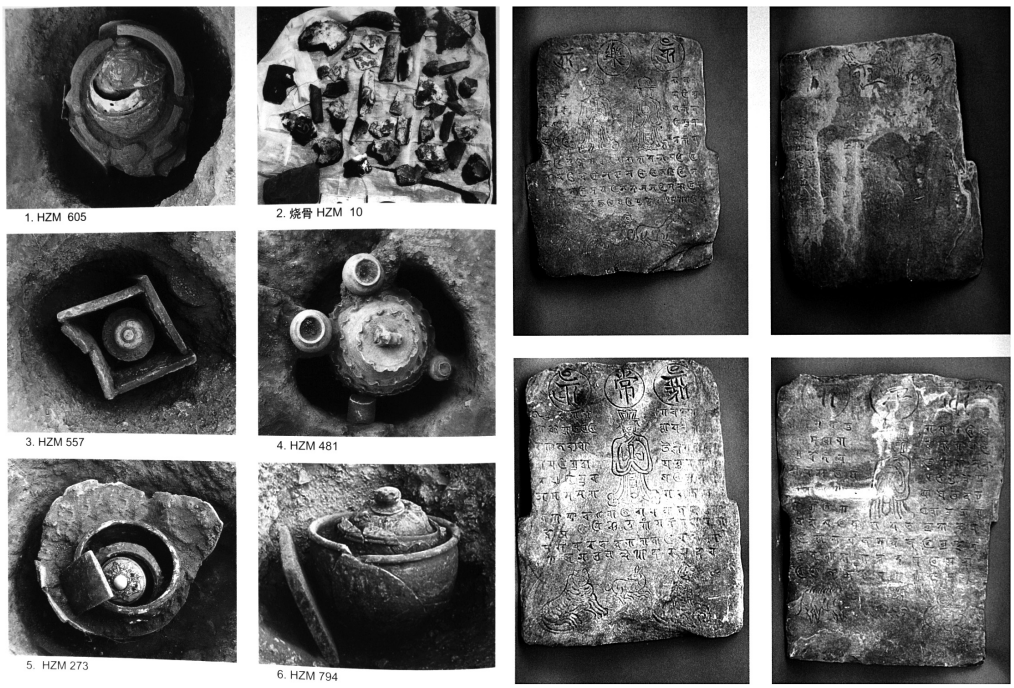


圖20　大理大豐樂火葬墓出土情況



圖21A　大理大豐樂出土鉛釉火葬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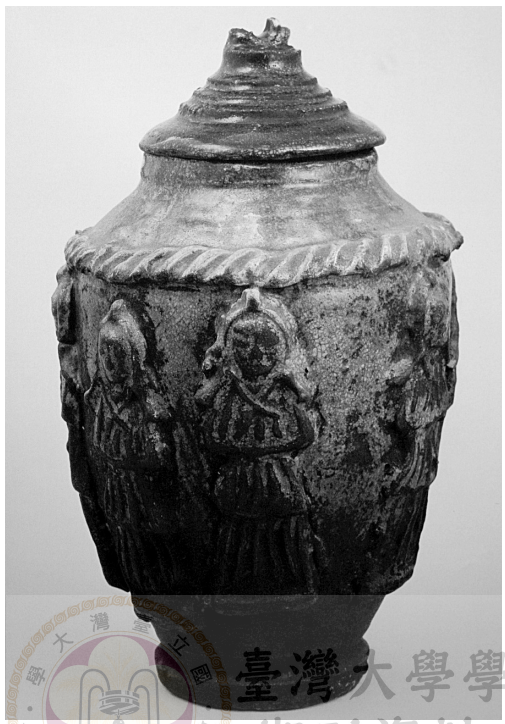


圖21B　青瓷貼塑人俑火葬罐
大理白族自治州出土
高28.4cm雲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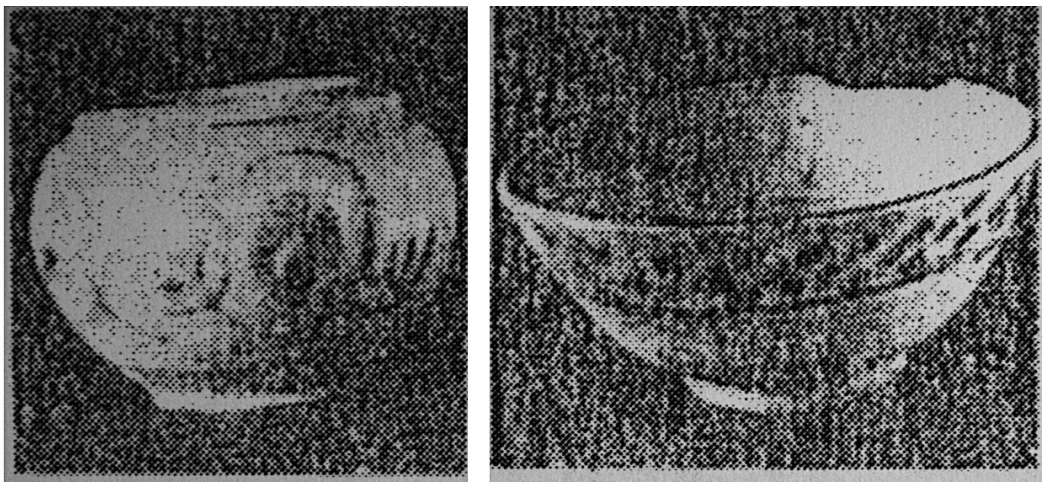


圖22　雲南青花小罐及碗　雲南大理蒼山玉局峰明代石室墓出土



圖23　雲南青瓷及青花瓷 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墓葬群出土
（另圖版一 一2、8為景德鎮青花瓷；1為越南青花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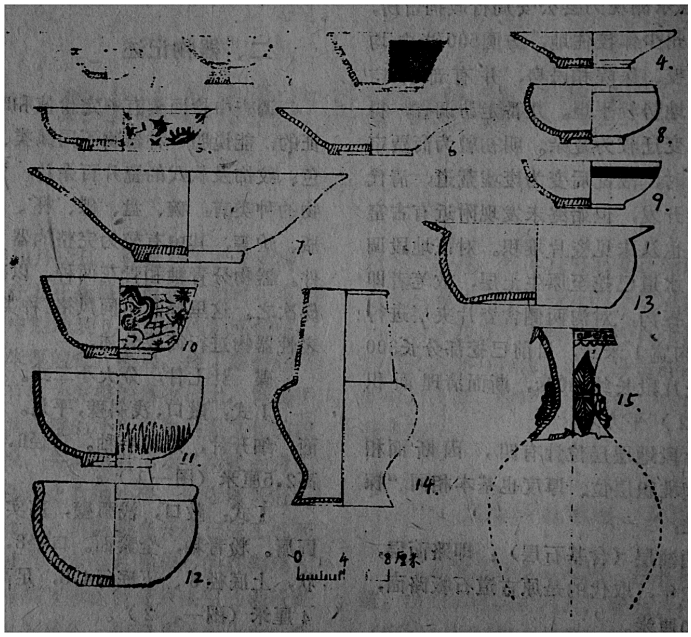


圖24 雲南陶瓷破片 建水城北遺址出土



圖25 龍泉青瓷荷葉蓋罐 通高25.5cm
雲南嵩明縣華家村木高墓出土 雲南省考古研究所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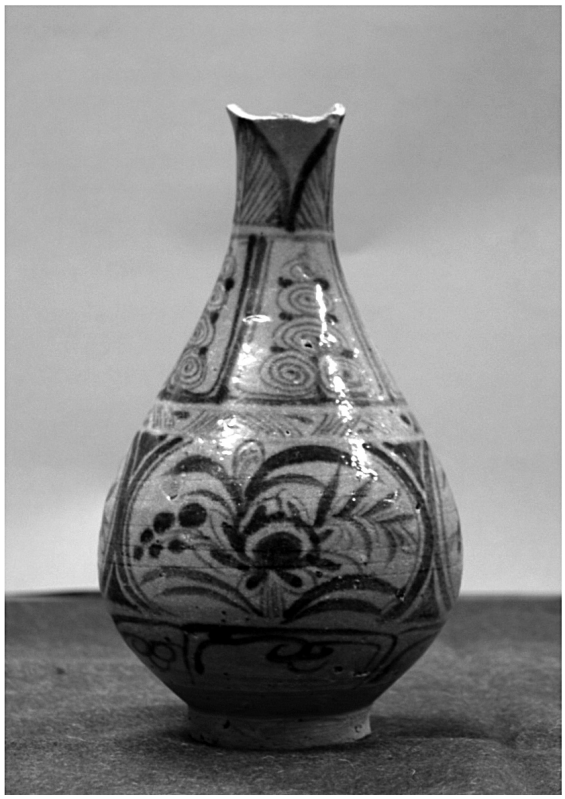


圖26A　雲南青花玉壺春瓶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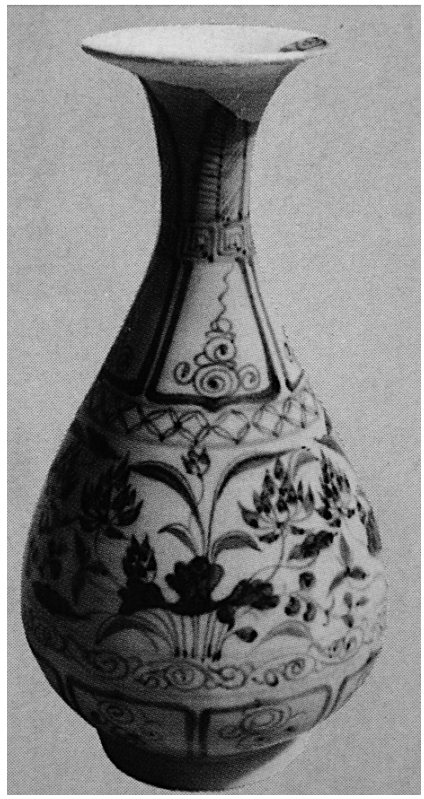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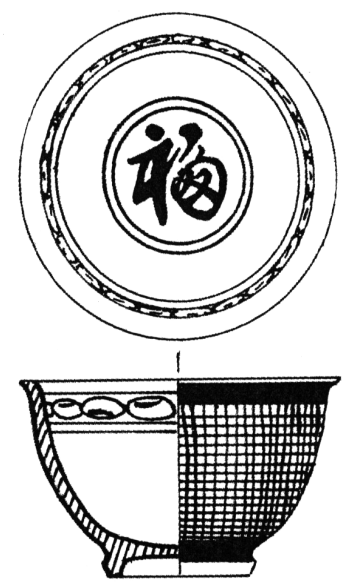


圖26B　景德鎮青花玉壺春瓶
江西上饒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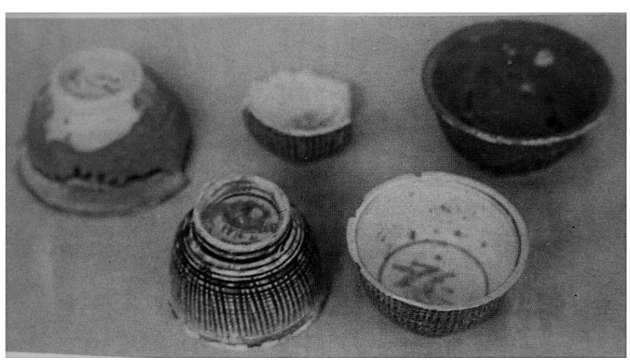


圖27A　越南青花杯（外褐釉）　箇舊王林寨小滿坡出土
圖27B　越南北部Chu Dau窯址出土標本（上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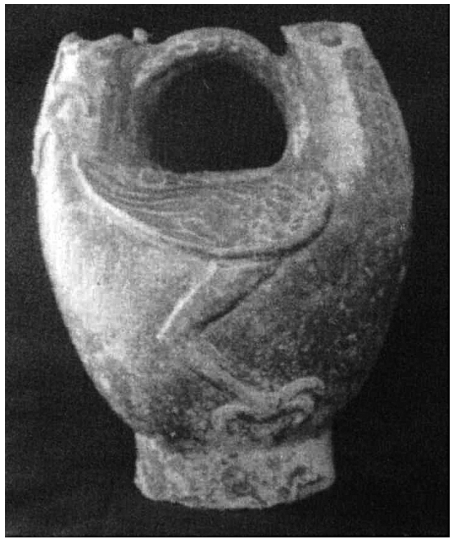


圖28A 青瓷鳥形執壺
雲南大理市博物館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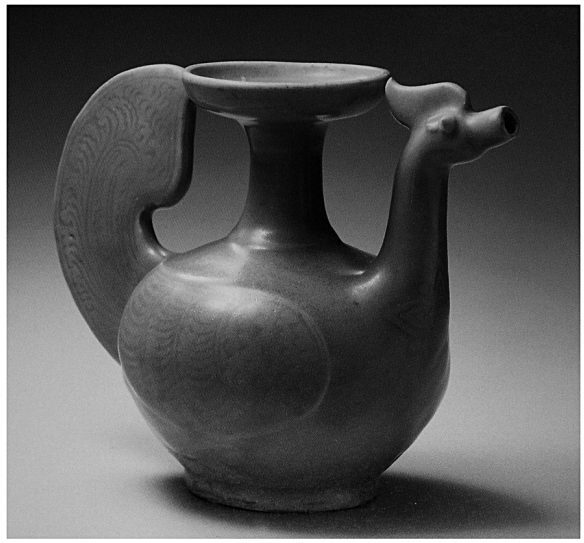


圖28B 泰國鳥形執壺 日本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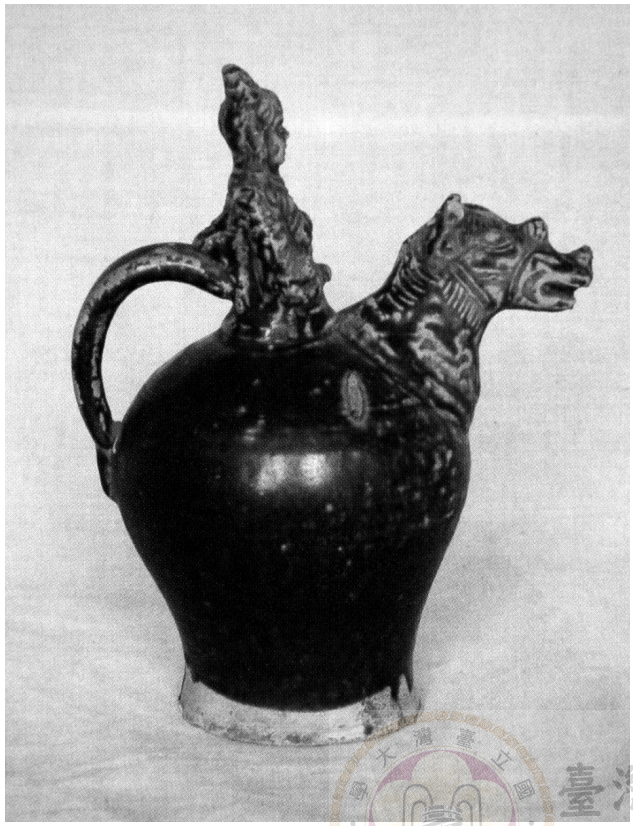


圖29 褐釉騎馬人物壺 祿豐碧城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0A　雲南青瓷印劃花碗（殘片）
口徑13.5cm　雲南省博物館藏



圖30B　龍泉窯青瓷碗
口徑32.5cm　浙江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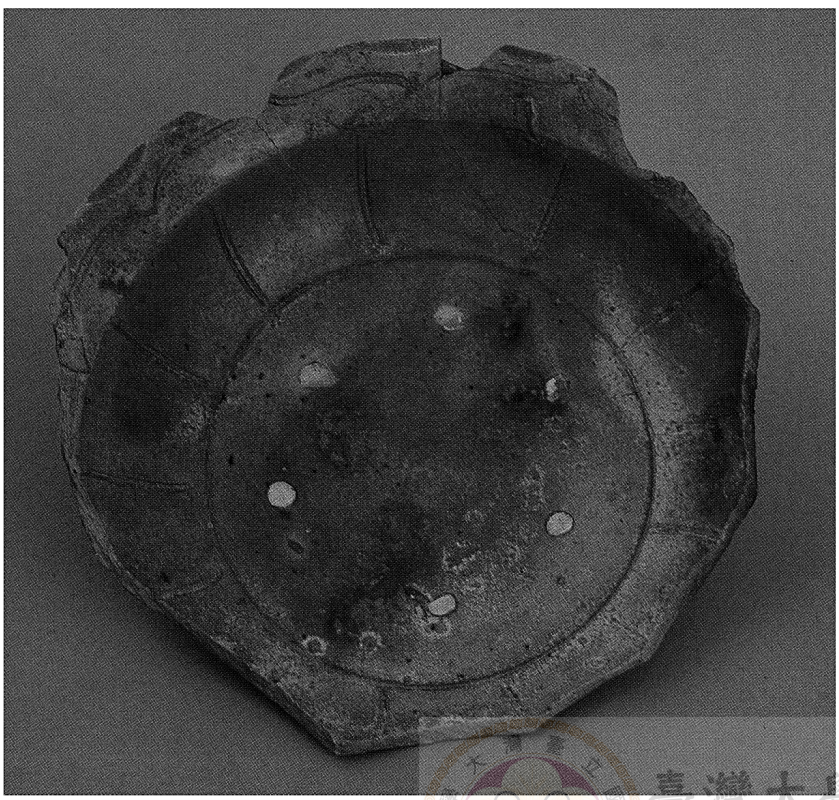


圖31　雲南青瓷盤破片　雲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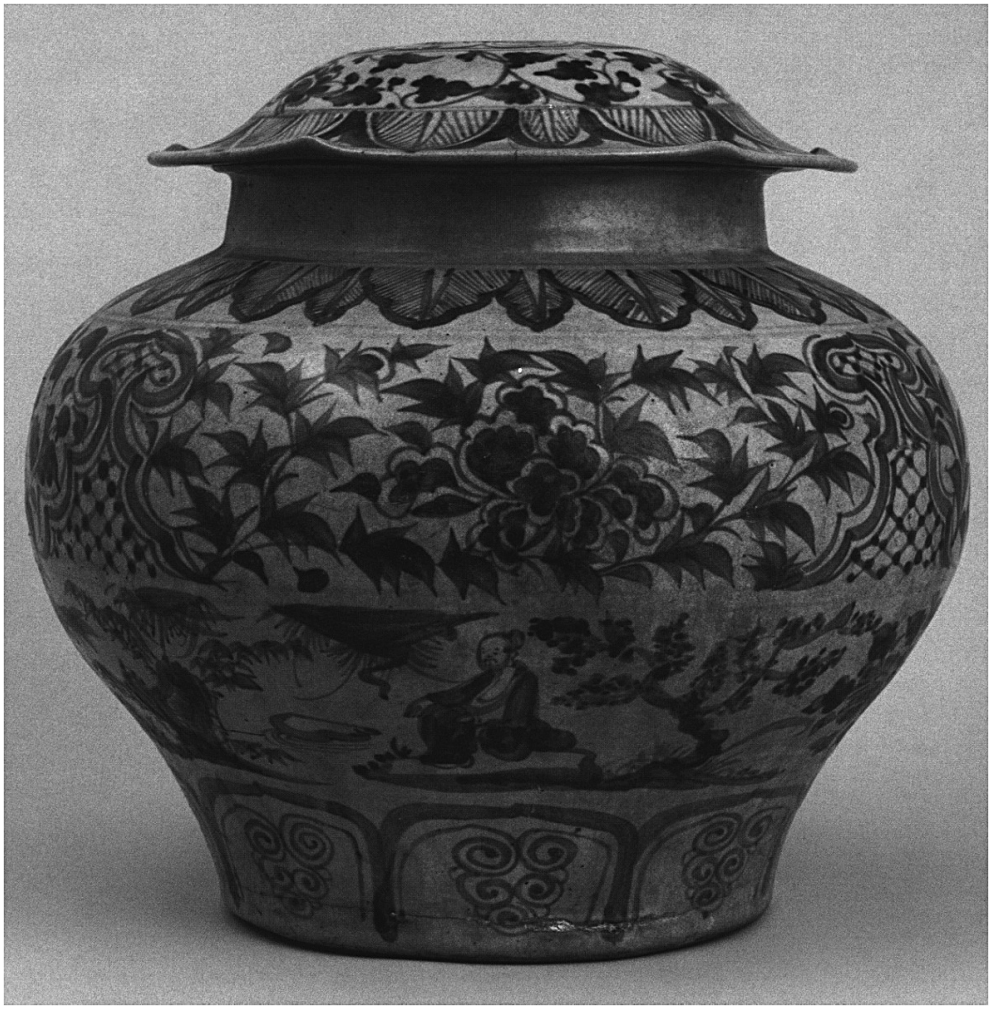






圖32 雲南青花花卉人物罐 總高28.4cm 口徑18.5cm 祿豐石龍黑井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3A　雲南青花花卉人物罐　祿豐石龍黑井出土



圖33B　雲南青花花卉人物紋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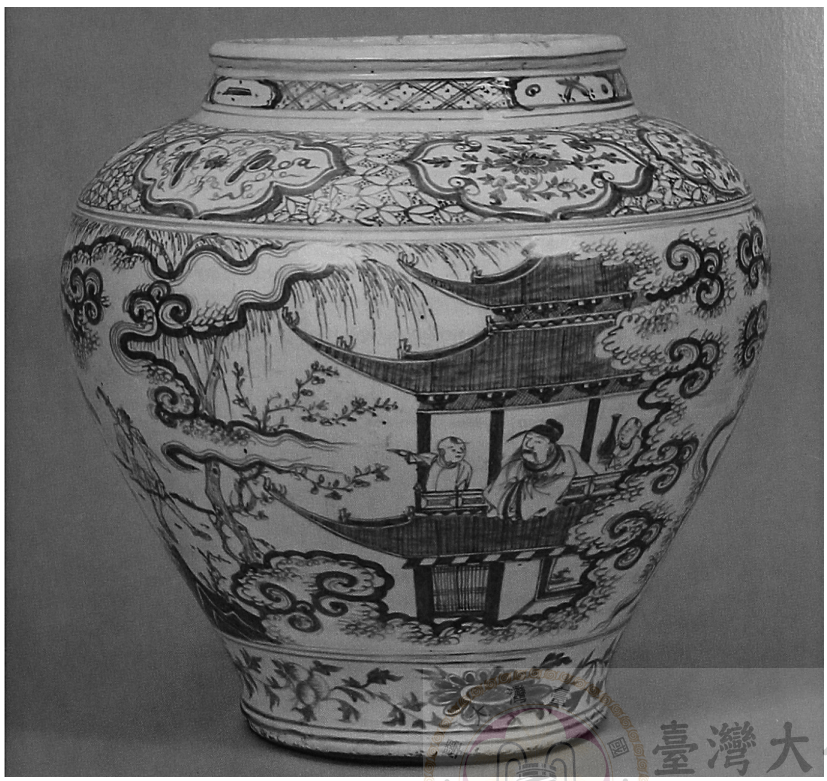


圖34　景德鎮青花人物罐　十五世紀　日本私人收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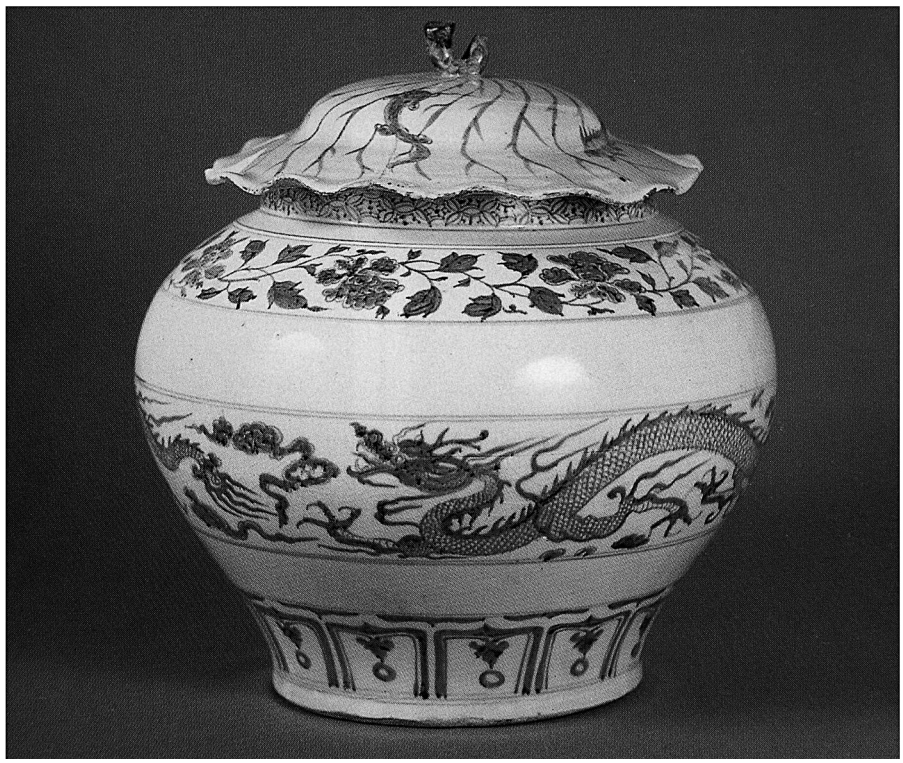


圖35 景德鎮青花荷葉蓋罐 元代 江西高安出土 高安縣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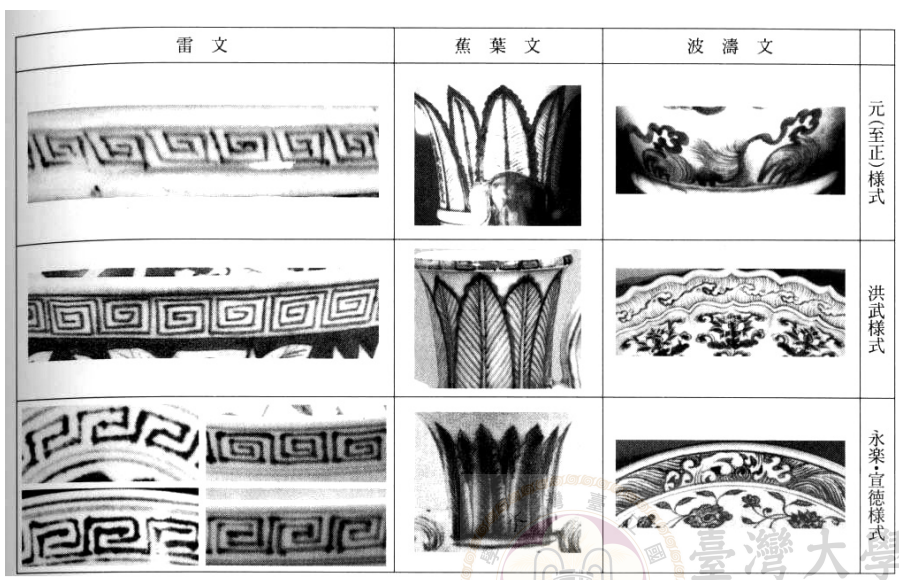


圖36 景德鎮青花 元樣式到明初樣式的演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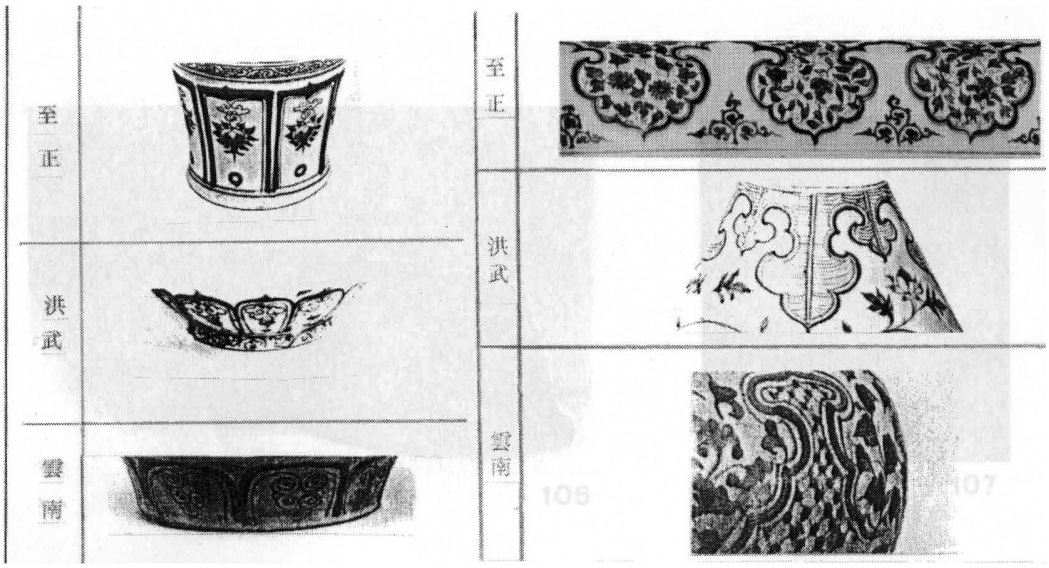


圖37　景德鎮元至正樣式　洪武樣式與雲南青花變形蓮瓣與雲肩紋樣式比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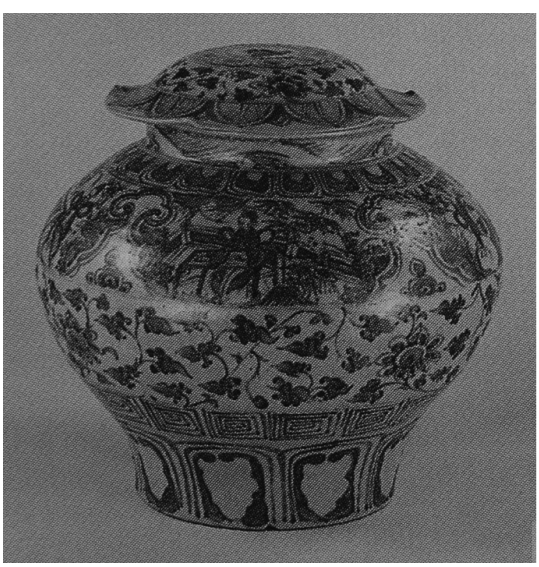


圖38　雲南青花花卉人物罐　祿豐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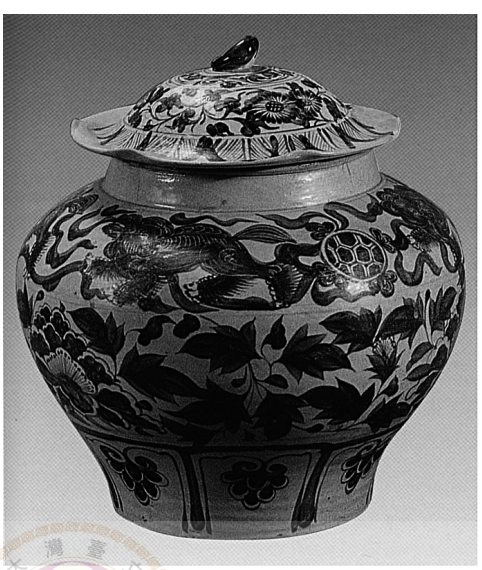


圖39　雲南青花獅戲紋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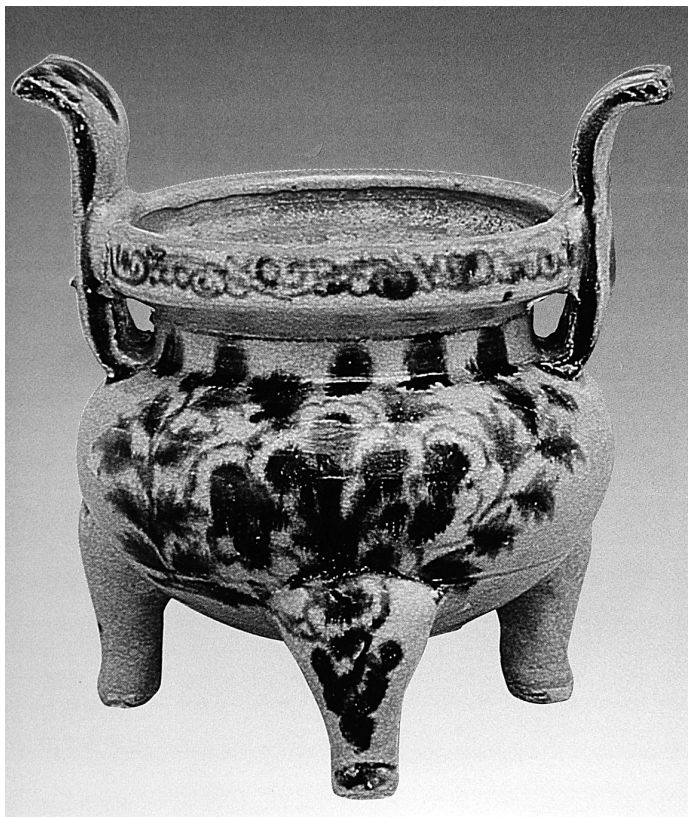


圖40 雲南青花瓷香爐



圖41 雲南青花破片 雲南省建水縣碗窯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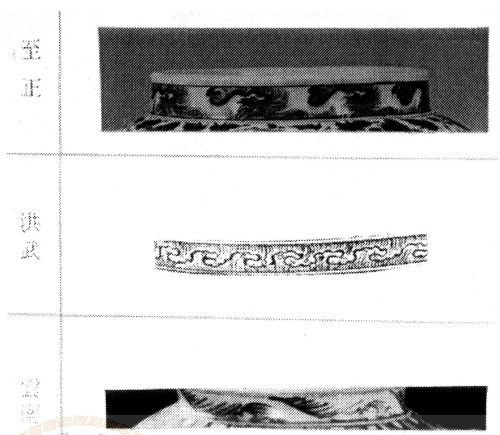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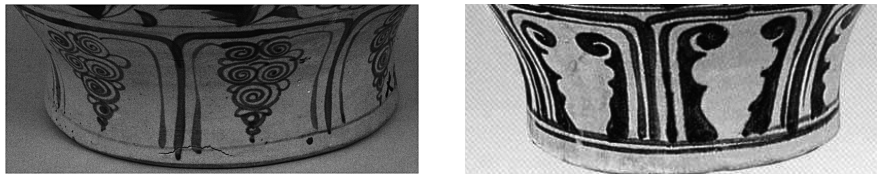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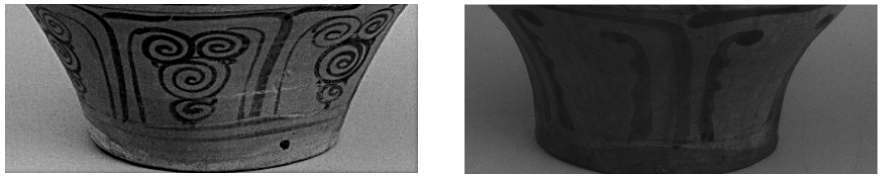


圖42 景德鎮元至正樣式
洪武樣式與雲南青花波浪紋樣式的比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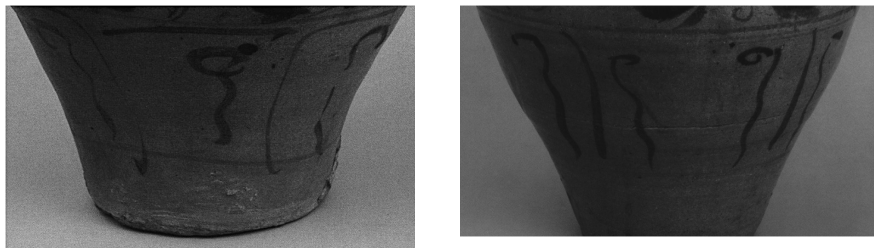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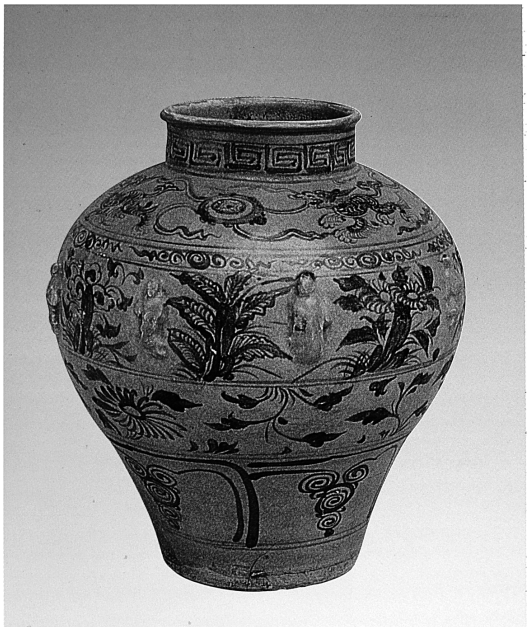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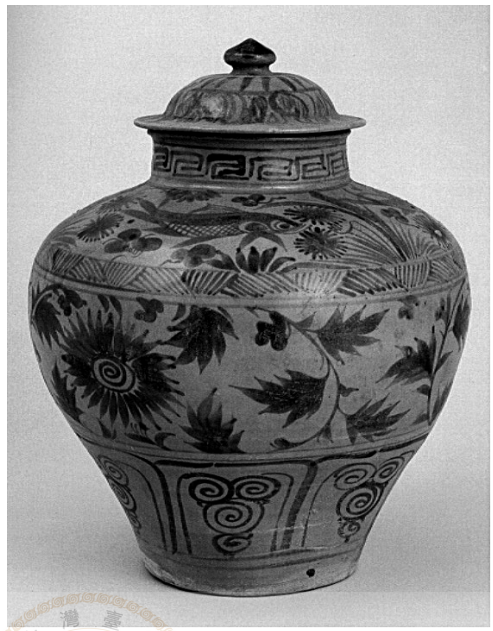

第二階段

圖43　雲南青花變形蓮瓣的演變


圖44　雲南貼塑人物青花獅戲紋罐


圖45　雲南青花花卉魚藻紋
總高32.0cm　口徑14.3cm
雲南省博物館藏

臺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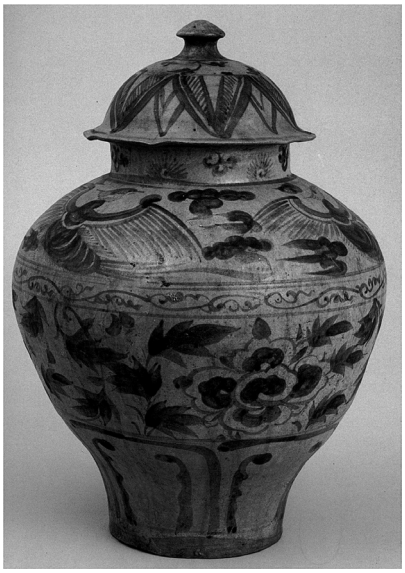


圖46A 雲南青花飛鳳牡丹紋罐 雲南省博物館藏



圖46B 雲南青花飛鳳人物紋罐



圖47 雲南青花牡丹紋瓶 高28.0cm 雲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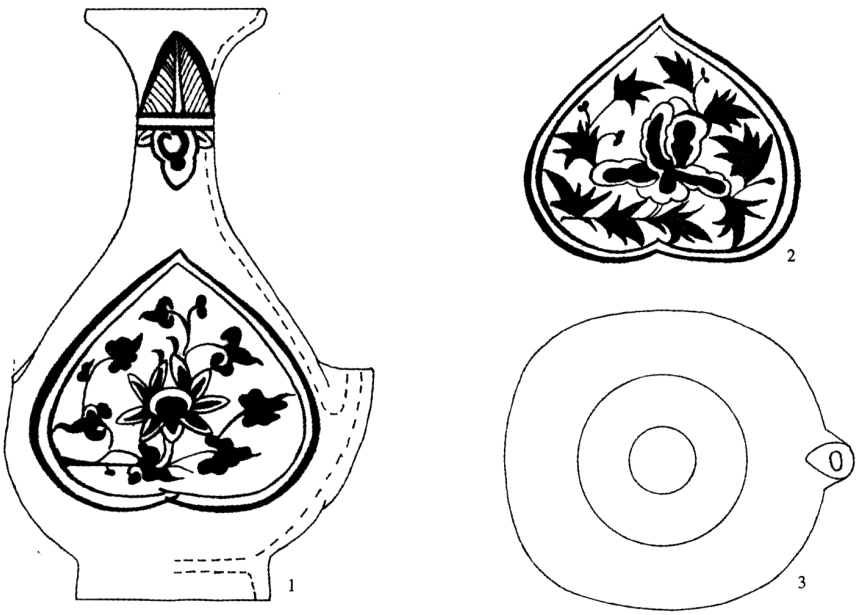


圖48　雲南青花執壺殘件



圖49　雲南青花飛鳳牡丹紋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0 景德鎮飛鳳紋盤
土耳其 托布卡比沙萊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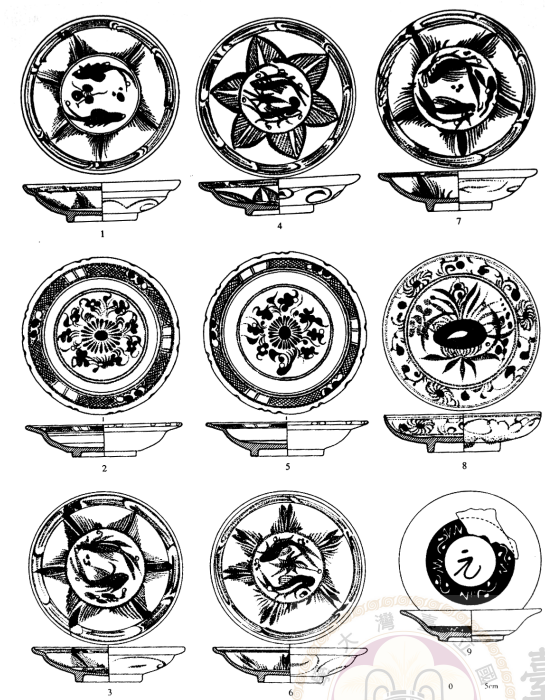


圖51 蒙自瓦渣地墓地出土青花瓷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2　景德鎮青花瓷盤　景泰四年墓（1453）出土　口徑13.7cm　景德鎮陶瓷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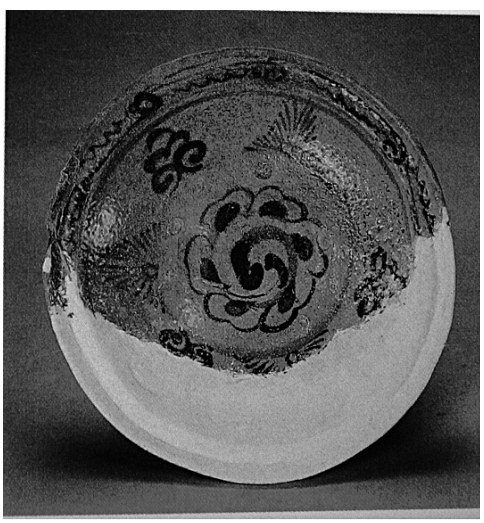


圖53A　雲南青花瓷盤
大理大豐樂墓地　HZM577出土



圖53B　雲南青花月華文碗　雲南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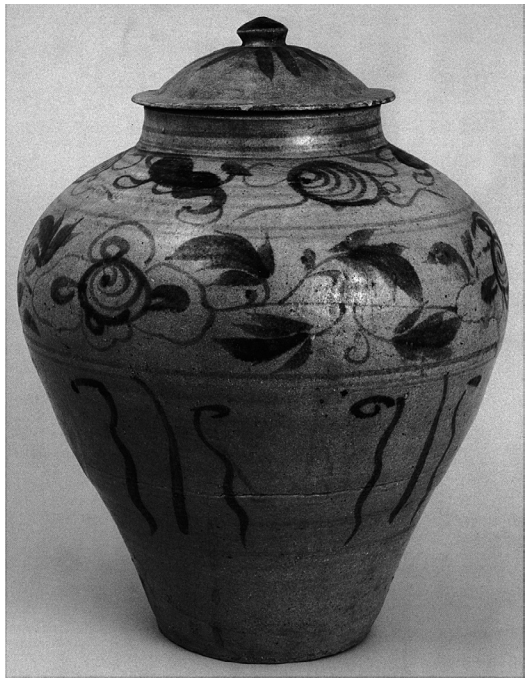


圖54A 雲南青花獅戲紋罐 總高33.0cm 口徑13.6cm 雲南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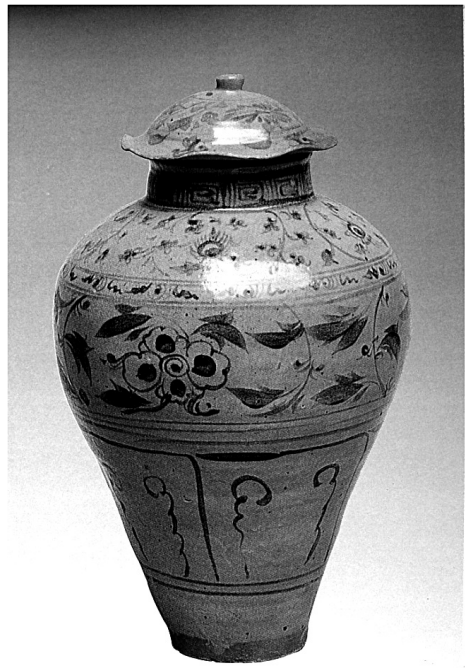


圖54B 雲南青花瓷牡丹紋罐



圖55 雲南青花獅戲紋罐 總高32.0cm 雲南省博物館藏



圖56 雲南青花獅戲紋罐與魚藻紋罐 蒙自瓦渣地墓地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7A　雲南青花罐 瀘西和尚塔墓葬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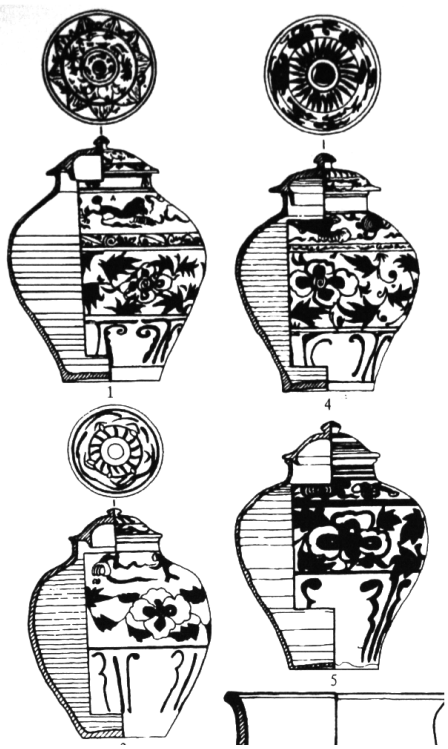


圖57B　雲南青花罐 瀘西和尚塔墓葬出土



圖58　雲南青花碗　高6.5cm 口徑13.2cm　雲南省騰衝縣文化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9 雲南青花大罐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圖60 雲南青花瓶 王林寨小滿坡M54及M42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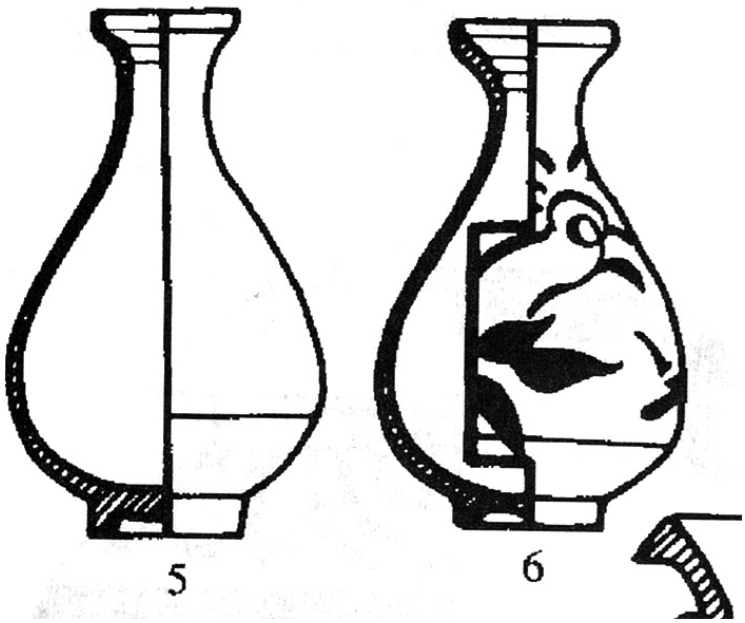


圖61　雲南青花玉壺春瓶　大理大豐樂墓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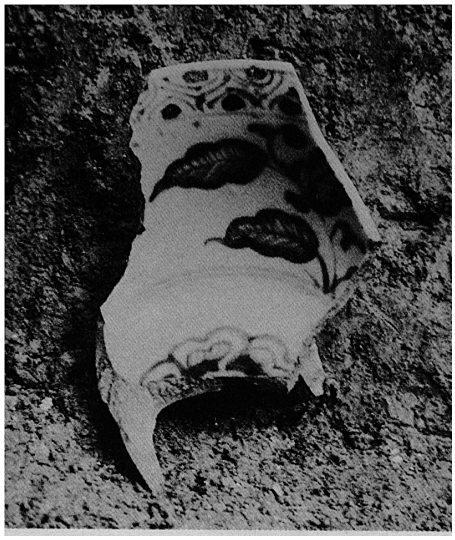


圖62A　建水窯青花碗殘片
昇龍城（河內）出土



圖62B　雲南大理州大理市蒼山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3 越南青花盤 十四世紀晚期到十五世紀初期



圖64 日本德川家族收藏越南青花龍文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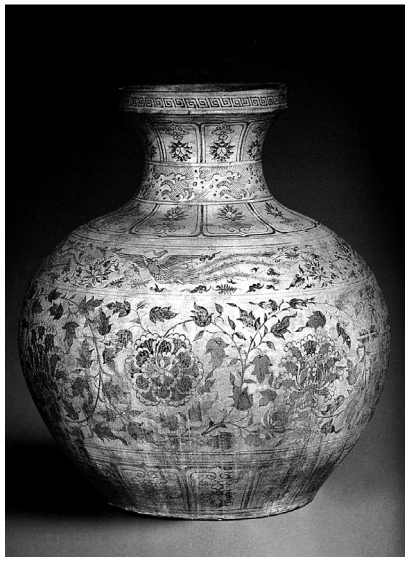


圖65A 越南青花瓷大罐 十五世紀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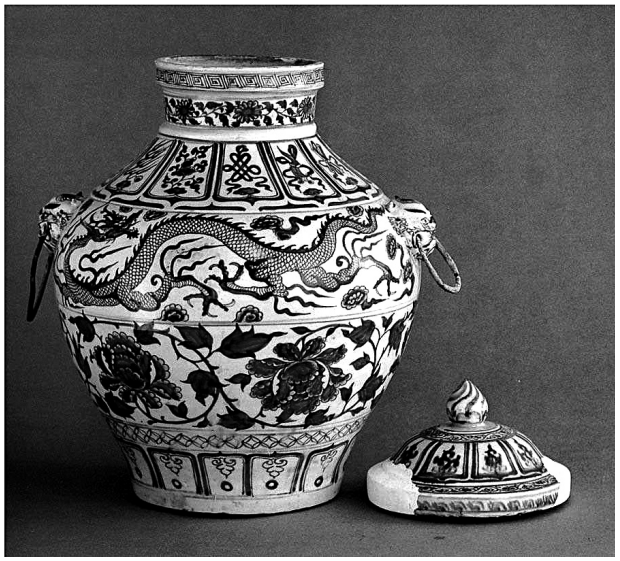


圖65B　景德鎮元青花大罐
十四世紀中期 江西高安窖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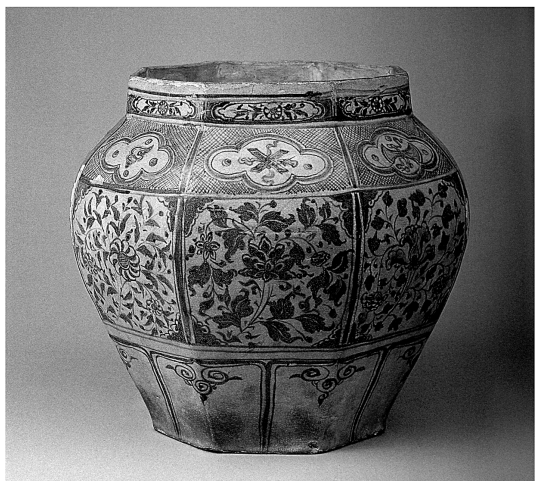


圖66A　越南青花八角壺 十五世紀前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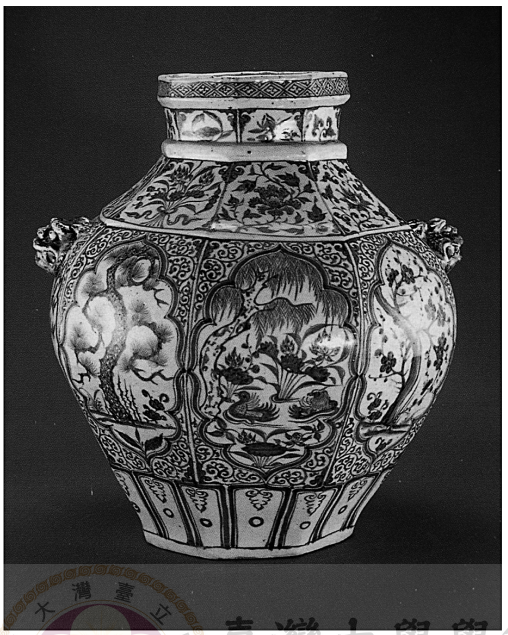


圖66B　元青花八稜大罐　遼寧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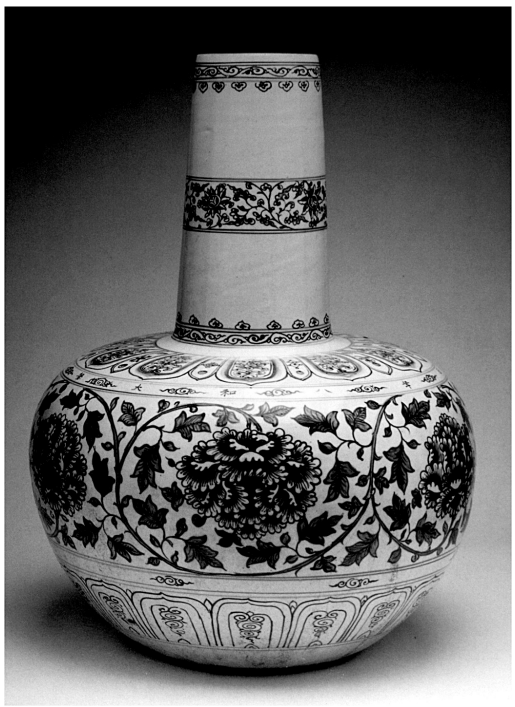


圖67　太和八年銘（1450）越南青花瓷長頸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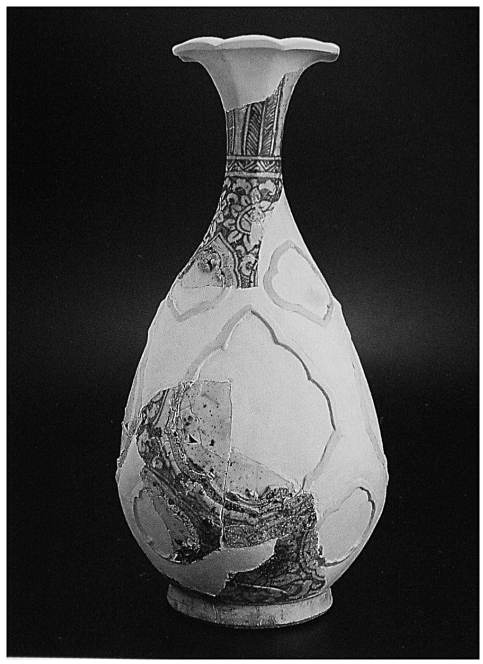


圖68　越南青花玉壺春瓶殘件
沖繩首里城京の内遺址出土



圖69　越南青花獅戲紋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期刊資料庫



圖70　青花菊紋盤　十五世紀後半　口徑21.0cm　雲南省博物館藏



圖71　雲南青花八稜罐　十五世紀前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2A　雲南青花建水窯魚藻紋盤　十五世紀後半



圖72B　雲南青花玉溪窯魚藻紋盤　十五世紀後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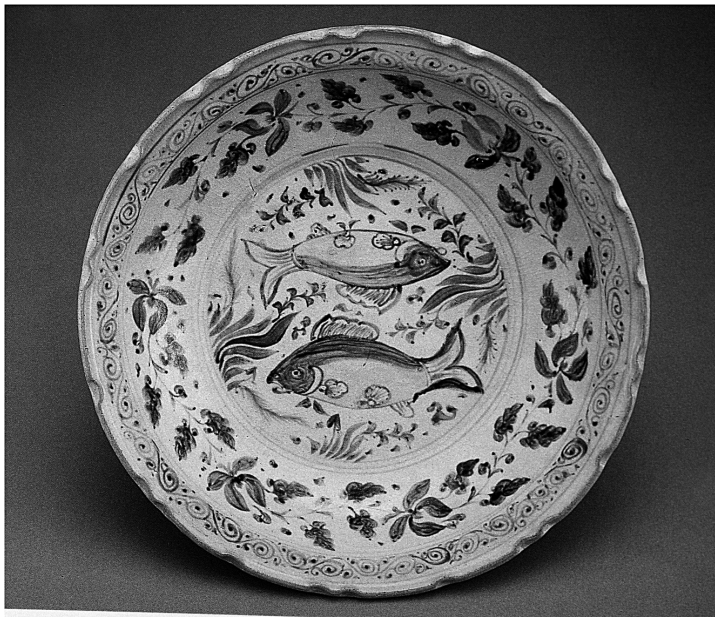


圖73　越南青花魚藻紋大盤 十五世紀前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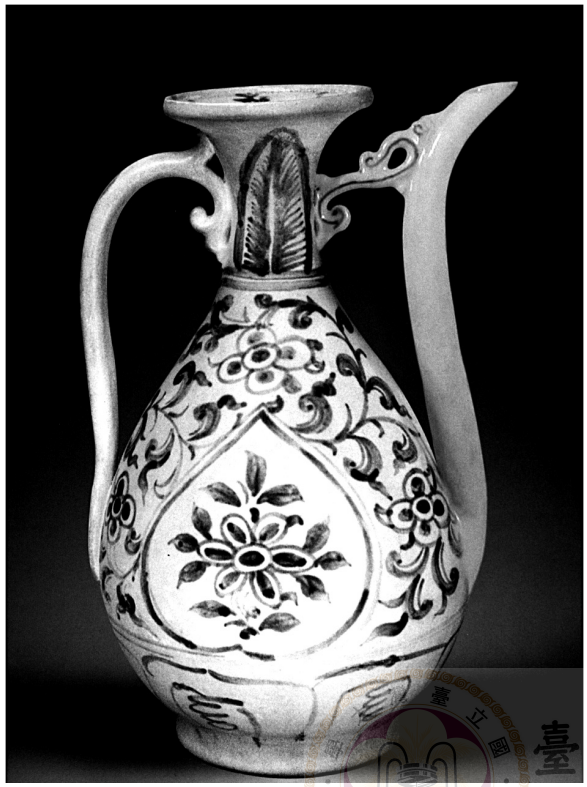


圖74　越南青花牡丹紋執壺　十五世紀中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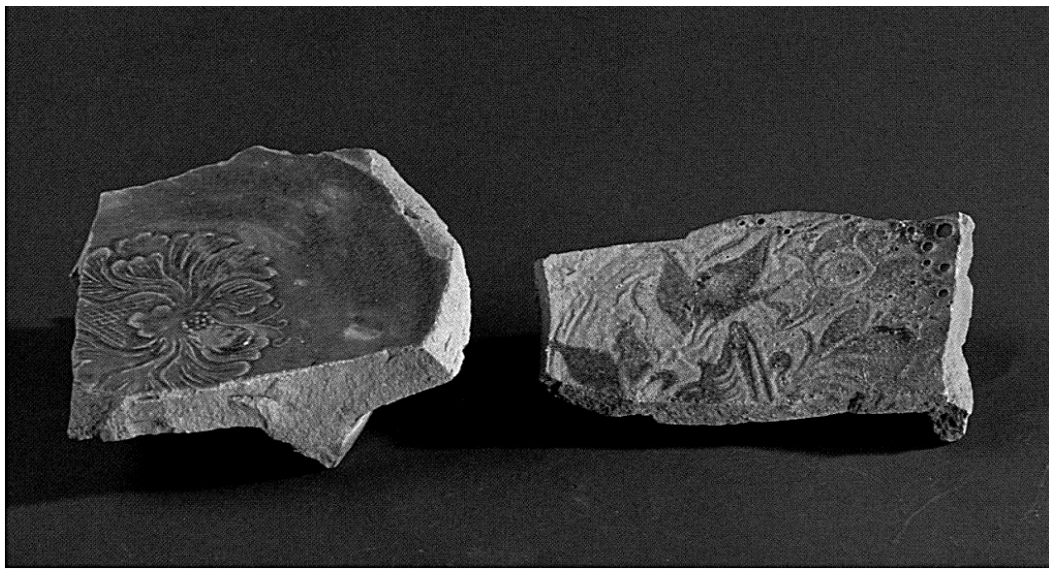


圖75A　青瓷印花破片　十五世紀前半　雲南省博物館藏



圖75B　越南 Van Yen 窯址出土各種破片　十三到十四世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